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Q.C., J.P. (副主席)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財政司麥高樂議員，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范徐麗泰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國寶議員，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M.B.E.,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J.P.

陳偉業議員

陳坤耀議員

鄭海泉議員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慧卿議員

梁錦濠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麥列菲菲議員，O.B.E., J.P.

文世昌議員

吳明欽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

缺席者：

李柱銘議員，Q.C.,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羅錦生先生

議員動議**致謝動議****恢復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提出的動議辯論**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現實往往比想象更為奇特。此刻，我們就對主席致謝的動議進行辯論，而主席卻不在場；儘管動議措辭是向主席致謝，但我們應為本港的福祉對其演辭徹底作出批評。

通貨膨脹是人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但是據悉財政司將在下星期三致答辭時才闡釋政府當局打擊通脹的策略，若我們對政府當局撥款進行政府計劃的策略一無所知，又如何進行辯論？

不過，主席已給予我們一項有關對抗通脹的線索 — 即建議考慮擴大有管制地輸入外地勞工的計劃。輸入勞工是一個敏感題目，往往觸怒那些關注本港工人利益的人士。毫無疑問，該等人士會對有關建議的部份內容視而不見，即「但只限於勞工短缺最嚴重的經濟部份」。根據估計，若至一九九五年仍未解決勞工短缺問題，通脹率將最少躍升 15%。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現發出一份對抗通脹的文件，而我是該會的會員。我們將提出特別為維護本港勞工生計而制訂的計劃，而以我們之見，該計劃亦適合本港的情況。該項計劃特別提出全面就業及讓工資穩步增加，目的是控制本港經濟結構轉變的影響，而經濟結構轉變是導致通脹的主因。若繼續容許工資大幅上升，致使一切收益均為通脹吞噬，對任何人均沒有好處，亦一定損害低收入人士的利益。我衷心希望當局會就該等建議的優點詳加考慮。

副主席（譯文）：公眾席沒有遵守禮儀的規定。我請公眾席那些人士坐下，因為假如他們不自願坐下，我得安排採取所需的措施。請坐下。黃匡源議員，請繼續。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我從事的國際稅務顧問工作，令我得以密切接觸世界各大經濟體系的情況。每次我返抵本港，都暗自慶幸本港經濟發展蓬勃，人人都有職業，而市場亦欣欣向榮。短期而言，本港經濟的前景已獲得確認，其他民主國家也未能如此，我們現正從中受惠。在若干程度上，我們所遇到的問題並不過於複雜。香港現時採用的是簡單的課稅制度，部份人士希望更改現行的制度，以對付本港經濟現時暫時出現不均衡的情況。其他人士則希望將課稅制度用作均分財富的武器，但朝向這項目標而進行的工作將會減弱社會人士積極進取的上進心 — 這種情況在部份其他國家也極為明顯。

我認為並無可輕易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然而政府當局推行反通脹措施的決心並不足夠，只會導致本港的經濟自行改變其結構，因而會自食其果。為顧全大局起見，公務員已被迫接受略為低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13.9% 的薪酬調整，而這些指數的增幅亦極具疑問。就算是我們身為立法者，亦整體上認為應接納略為低一點的增幅。倘若不斷提高薪酬以對抗通脹，只會導致物價與薪酬惡性循環，永無休止。

上次在這會議廳就通脹問題展開辯論時，我曾呼籲各位立法者克盡本份，展示其對付通貨膨脹的認真態度。在此，我再一次促請本局同僚以身作則，相應作出犧牲，帶領香港渡過通脹危機。在此期間，我將會繼續支取自上次調整後所訂的津貼額，直至明年對立法者的津貼進行全面檢討之前，我不會考慮任何增加津貼的建議。

環顧導致通脹的各項因素，對於香港能夠承受多少基建工程而不需擱置市民所需要的其他服務，我深表關注。政府當局引用陳腔濫調，表示機場核心計劃的支出僅佔本港每年生產總值的 2%，這種說法似乎並無不妥，然而，對於香港現時已處於一個經濟全面發展及全民就業等因素，當局卻未有顧及。倘若實行如此規模龐大的基建工程計劃，定會輕易增加本地的需求以及使通脹問題加速惡化。據研究興建地下鐵路期間的資料顯示，有關當局在興建地下鐵路每耗用一元，便須在其他基建工程方面節省五角的開支。

香港必須迅速興建一個新機場，此點我毫不存疑。但問題是「如何迅速」？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就此提供一個答案，表明當局是否已考慮到將工程竣工限期定為一九九七年的優點和缺點，以及盡早完成市民極為需要的其他服務／計劃的能力。本港的污水排放整體策略似乎已蒙受影響，出口伸展至南中國海的海底排污渠的長度已由原訂的 16 公里縮減至 10 公里。我們切勿容許單一個規模龐大計劃的光芒掩蓋了其他有必要進行和可為本港帶來生機的其他各項計劃。現今在通脹問題嚴重之際，政府當局理應在財政方面實行嚴謹的控制。

因此之故，本局需要政府當局在這項龐大的計劃上肩負全責。同時亦須向機場管理階層灌注商界的知識，不僅委任本港部份最具才華的人士為機場管理局的成員，同時亦須將其本身的資源投入生產線上。以前我曾提出建議，認為香港政府應向本港市民集資，集資額可高達機場管理局發展公司 40% 的股東權益，此舉可確保本港將來的新機場是由一個以顧客服務為主的機場，並且極可能有利可圖。新機場將會面臨很多國際性的競爭，因此，專業的指引和監察亦不可或缺。相信上述提出的建議會在機場管理局的業務計劃中獲得公平的考慮。

副主席先生，主席曾論述直至一九九七年的憲制發展。以我之見，民主政制並不是指由多數派獨裁統治而罔顧少數人士的權益。制定人權法案的目的是要保障弱者的權益，並不是用作加強有勢力人士權力的寶劍。在此時刻，香港人便是屬於弱者，香港人在談判決定我們日後命運的會議桌上並不能擁有一席位。然而，我們仍可發聲表示意見，我們的意見是，對於那份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所爭取並已獲得行政局同意的協議，香港人不予接納。

基於若干基本原則，我們決不可作出妥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均已作出承諾，規定香港可設立重要性等同英國樞密院且可獨立運作的終審法院，且在有需要時可聘用具國際地位深諳普通法的權威人士出任終審法院的成員。這是本港法制的基礎，以保障弱少人士免受權力極大但會順從有關方面意願的立法機關或政府當局善變措施的影響。

反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所達成的協議，亦即意味對機場管理局的成員比例引起另一項信心危機。立法機關是一個極具權力和盡忠職守的機構，我們對此問題的立場堅定不移，這是重要的基礎。然而，我們是否應該盲目地彷效英國的樞密院，讓成員主要由本地人士組成的終審法院在香港聆訊有關的案件？是否僅是採取這項措施就可以保證公義得以維持？我認為必須從多方面再加思索，才可以達致既定的目的。為何有關終審法院的程序和原則不可以確定的方式表達和載於文件之上，以及制訂適當的法例以待立法局通過？這是否只是一種數字遊戲？對於日後將會向本局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我本人定會竭盡所能，詳加研究，以確保條例草案中各項基本要素均屬妥善。一俟我們能夠界定原擬保存的事項，將會明白問題的關鍵是司法獨立的原則已受到危害，而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

我擔心本港經濟架構現正進行的轉變，以及其對香港政府財政收入將會帶來何種影響。對於那些同時在中港兩地設廠的企業，中國當局一向並不特別積極向他們行使課稅的權利，但這亦只屬遲早問題而矣，因為國內基本設施及福利發展均需款項，這項需求將會促使其徵稅部門尋求更多的稅收，現時對於各項服務尤其是向國際客戶提供的服務，將其產地來源列為本地並不容易，有關方面只需在如何提供這些服務方面小心策劃，便可逃出以香港地區為基地的稅網。

在此令人關注的時刻，我要求政府當局審查其長遠的預測，容許有關的安排得以穩步進行，從而避免這些架構轉變所隱藏的危險，同時對這些經濟活動引用各種可帶來財政收益的方案。這可能有必要檢討本港的課稅制度以及與中國之間的雙重課稅事項。我們需要清楚的指示，了解日後的情況將會如何運作。只有這樣才可知悉是否有必要作出改變，以保障香港人的福利及生活方式。

稅務專業人士已要求我提出意見，認為政府當局在決定或公佈任何有關課稅政策的修訂事項之前，理應預早徵詢他們的意見。稅務專業人士表示，他們均為富責任感的專業人士，定會提出公正持平的意見。

除上文所提及的終審法院外，香港必須與倫敦和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據悉北京當局並不承認本局為代表香港人民意見的法定機構，我對此深感痛惜。現有跡象顯示，英國政府亦以相同態度對待本局，即使我們已不再是唯命是從當局意願的委任議員。透過直選途徑進入本局的議員肯定有權代表其選民發言，由於他們有必要向其選民負責，因此可確保他們不會順從當局的意旨。至於透過間選產生的議員，他們須向其所屬功能組別負責，因此亦不會向有關當局屈服。即使是由當局委任的議員，現在亦會憑其良知而發表意見。

時至今日，立法局已具備為香港市民發言的條件，而時間將會證明我們能否明智地履行這項職責，以及為香港的整體利益而行事。「港人治港」的意義是香港人必須大力保障自己的權益，並奮起爭取機會。我們切莫捲入無聊的內部爭吵，因為這樣會向力圖分化我們

的共同敵人提供各種機會。當大家認為香港人是適合自我管治之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為香港管治者的地位才會獲得承認。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鄭海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新一屆的立法局已產生，香港已邁進一個嶄新的時代。儘管本港沒有西方模式的立法機關，但民主進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然而，我們必須緊記，實行民主政制只是達致目標的途徑。我們應以建立及維持公義、自由和繁榮的社會為最終目標。

過去 40 年以來，儘管在形式上香港缺乏一個民主政制，我們仍能在頗大程度上達致為政的目標，這是因為香港人具備真正的民主精神。香港是現今世界上最自由的社會之一，亦擁有備受本地居民和海外人士同樣信賴及尊崇的法律制度。此外，香港已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財經商業中心，各項基本設施均屬優良。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而言，香港在亞洲地區的排名高踞第二位。事實上，根據某些學術研究的結果，在調整有關稅項和價格後，香港人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佔全球第 10 位，如此輝煌表現，香港人足以自豪。

儘管如此，這並不表示我們的發展盡是一帆風順 —— 事實上，我們遭遇不少困難。然而，在追尋罪魁禍首和謀求解決辦法之前，我們必須緊記香港如何從一塊荒蕪之地轉變為財經商業中心，香港的自由市場財經制度（即使未臻至善至美），實在已為本港提供了正確的發展途徑。

毋需贅述，通貨膨脹和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是本港最難處理的經濟問題。香港人憑着努力工作和進取創業的精神，生活水平獲得提高，倘若上述問題無法解決，不但會使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亦會對本港社會的穩定構成威脅。

有關通貨膨脹的討論已不絕於耳。通貨膨脹是一項政府當局和輿論界必須坦誠處理的問題，須讓市民明白事情的真相。首先，世上無任何人可以提出一個簡單直接、萬無一失或舒適安逸的補救措施。冀求一個立竿見影或輕而易舉的解決方案，誠屬虛談妄想。使港元不再與美元掛鈎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港元與一籃子貨幣掛鈎也不是可行之道，而本港金融業內許多人士亦抱有相同的見解。我們須了解導致目前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勞工及土地供應嚴重短缺，加上物業市場投機炒賣風氣的推波助瀾（假如物業格價也包括在消費物價指數之內）。

當本港的經濟蓬勃發展時，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滿足了本港對工人的需求，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一九八〇年。其時，當局採取十分有效的措施阻截中國非法入境者來港，當時我們尙未能預知該項措施對經濟的影響 —— 10 年後，其後果呈現，本港面臨工人嚴重短缺的問題。

顯而易見，尋求訂定一個監管妥善的輸入勞工計劃，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誠然勞工界的發言人必會表示深切憂慮，我身為僱員一份子，也能體會勞工界的觀點。然而，我們必須坦白承認，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工資和生活質素得以提升，是由於獲得當時從中國抵港的工人的助力，遂使本港經濟疾速增長，整個社會更趨富裕。今時今日，我們須尋求方法，使這美景重現。倘若不然，以下的情況將會出現 — 經濟增長長期放緩，各行各業難以如常增長，社會繁榮停步不前，而通貨膨脹則會持續存在。不過，我須強調，儘管如此，我們不應使香港本身的工人處於不利情況。凡不遵照當局所訂條件輸入勞工的僱主，必須依法嚴懲。對於必須轉業的工人，有關當局應提供適當的訓練。此外，那些仍未為其僱員提供退休保障的僱主，應為其員工提供這方面的福利。

雖然香港的經濟發展已趨成熟，但仍有大量工人未能享有退休福利的保障。我們不應視長期服務金及高齡津貼為最終解決方法。長期服務金並非為此目的而訂立。但鑑於現擬加入若干修訂，使之成為一種退休保障計劃，因而使長期服務金的問題變得頗為複雜。

同樣，高齡津貼問題也出現同樣弊端，一方面，這種津貼金額太少，難以滿足一些沒有長俸的人士的經濟需要，另一方面，隨著日後本港人口老化，港人對照顧老人的需求及期望更趨殷切時，這種津貼將會構成一項甚為龐大的開支。

為各僱員設立一種必須參與的退休保障計劃，將是無可避免。以我之見，為僱員設想的僱主不應因為此計劃的推行而感到驚恐。長遠而言，引進退休福利計劃以取代長期服務金計劃，不會影響工資成本總額，因為日後在調整工資時，退休福利計劃亦為考慮因素。若能分期實行，我並不認為會有礙香港的競爭能力。

另一項我們須盡快對付的問題就是物業市場的炒賣投機活動。為遏止炒樓而實行的抽籤制度未能達到當局原訂目的，其優點僅在於讓每個人皆有均等機會從事炒賣投機活動而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當局迅速增加土地的供應，並由銀行界進一步收緊其貸款政策，目前已實行此等政策，我謹促請銀行界同業，倘物業價格節節上升，便應進一步收緊其按揭貸款政策。這並非干預，而是純為本港利益而行的政策。

我不知道是否有快速辦法可解決此等情況及其他經濟問題，也許本港會有一位深諳此道的經濟學家，倘若有此人才，這位專家尚待我們物色。

我現想談及另一項問題，由於並無較佳的表達方法，我姑且形容香港在這問題上已佇立於一個分水嶺。除非政府能將其承諾付諸實行，否則本港會面臨真正危機，一方面本港經濟朝著正確方向積極邁進，另一方面本港的環境卻剛好朝反方向逐步走下坡。

我們不能再忍受這種各走極端狀況，過去 30 年來，我們為本港締造了迅速增長的經濟環境，在未來的 30 年，我們應設法使本港的經濟增長與改善本港環境的工作同步並肩地進行。

我並不是說本港的環境從未獲改善，確有一些改善是顯著可見的，本港的空氣較前清潔，主要是由於當局禁止使用含硫量高的燃油所致。本港部份海灘較前清潔。政府已嘗試減低使用氣壓錘撞擊及住宅區交通頻繁所導致的噪音，這方面的努力沒有白費，確已令我們的耳根稍覺清靜。

然而，以上涉及的問題還不算嚴重。香港的海水日益污濁，在本港海港部分範圍內出現可能被列為世界上污染情況最惡劣的水域，對香港而言，殊不光彩，為此，我想談論一個令人困惱的問題，就是建議中的新污水收集系統。

總督在其施政報告表示，政府當局將在未來五年斥資 80 億港元對付環境污染問題，其中 39 億港元將用作處理污水排放問題。然而，根據最新的估計，當局仍需籌措一筆款額高達 161 億港元的龐大經費，才能支付整套污水處理計劃的開支。

這項支出非常龐大，毋庸置疑，政府當局定會發現有多項同樣重要而應預留撥款的工程。在此等工程中，部分是確有必要，其他則並非如此必要。以我之見，重新建設污水收集系統是當前要務，並應列為首要項目處理。誠然，當局應研究其他籌措經費的方法 — 而我認為私人機構亦必須在這工作上負起任務 — 但建設污水收集系統的計劃必須付諸實行。

隨著時代的進展，政府當局應由處理危機的工作方式轉為制訂統籌策略以推行其政務。當局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發表的白皮書曾承諾動用 200 億港元建設一套全面的污水收集系統，然而，該套計劃已宣佈暫時擱置。在總督表示改善環境為當局首要任務之一的數天後，有關方面發表此項公佈，令人懷疑總督的施政方針是否獲得政府當局全面支持。

政府當局草擬「跨越 21 世紀 — 為傷殘人士而訂定的措施」綠皮書的工作已有良好的進展。

當局適當地將為傷殘人士提供「均等機會」的原則定為該綠皮書的主要工作目標，此項目標亦是聯合國國際傷殘人士 10 年（一九八三年至九二年）的三大工作目標之一。

希望當局不僅能在該份綠皮書鑑定一切在實際建設、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有違「完全平等及全面參與」目標的重大障礙，並建議一套周詳的計劃，消除此等障礙。有關措施不應只適用於政府事務，亦應同時適用於公共機構及非政府團體的服務。

當局或有需要採取立法措施，不僅針對原有法例，附屬法例諸如附例及規例、官契條款、合約、專利權等亦應包括在內。在檢討此等措施時，我促請政府當局及本局同僚要求提供服務的部門或組織對需要特別服務人士的具體需要多加注意，並建議作出適當的規定，以確保傷殘人士不會被忽視。這些規定的服務絕不昂貴。

為傷殘人士制訂的措施涉及多個決策科及政府部門的職責範圍，此外，亦涉及百多個公共及非政府組織的服務範圍。政府當局應設立一個中央小組，負責監察及研究制訂整體措施的計劃。自從「群策群力協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書」於一九七七年發表以來，康復發展計劃協調委員會一直已負起這項工作。該白皮書亦提議增設康復專員的職位。有關當局制訂的綠皮書應檢討此中央小組的工作、其優點及缺點，並研究該小組如何承擔日益繁複的工作及面對下一世紀的挑戰。

副主席先生，有待處理的事情尚多，惟財政資源總是有限，資源的需要將會引起爭議。希望政府當局與立法局能同心協力，將各項在本局提出的建議付諸實踐，讓夥伴關係得以儘快確實地建立。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鄭慕智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歷史性的新一屆立法局會期開始時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到政府當局、立法局與中國之間的各種夥伴關係。過去 15 年我都在合夥事務所工作，我深信夥伴之間要合作成功，必須絕對信任。而這份信任只有在互相接受、尊重和諒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此外，夥伴之間亦必須樂於坦誠溝通，接受多數人的意見及為整體利益而通力合作。我期望可以在總督所指的夥伴關係中實踐我的角色，並與不同團體合作。

我要與本局其他議員一起表揚總督的施政報告。這份施政報告為香港勾畫出一個和平、進步和蓬勃的將來。我很渴望與各位議員切實研究總督所提出各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及原則。對於幫助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計劃，我尤感關注，並會朝着這個目標，積極工作。

有些問題是相當深入的，但另一些則直接關乎社會民生問題，後者包括如何透過教育改善本港的社會、如何照顧老人及對抗通貨膨脹等。我今天特別提到這些問題，是想確保當日後本局討論廣泛的經濟事項時，這些問題不會被置諸次要位置。換言之，一方面我們必須維持本港經濟健全，令本港的成就更進一步，但另一方面卻切勿失去遠見和偏離宗旨。經濟發展是達致目標的關鍵途徑，是決定發展步伐的要素，但我們的目標並非只為致富或為致富而已，而是要使到社會上所有人，不論老幼或環境好壞，都有機會改善自己、家人以至整體社會的生活質素。若我們能緊記此點，則相信本屆立法局必能具備足夠動力，衝出政治姿態，為廣大市民謀求福利。

香港現正處於歷史過程中的關鍵時刻。我深信今日就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 不必再等到某一約定日期才去面對命運。立法局在政制中的角色正不斷演變，同樣，立法局議員亦必須朝着為公眾服務的目標演進。市民會對本局議員集體工作的成果感到欣慰，亦會因為本局無所建樹而抱怨和失望。我們切勿作繭自縛，陷於官僚作風和無休止的爭辯中而致踟躕不前。我們象徵着一個更美好的香港。希望大家切勿質疑彼此的動機或忠誠，並能明白到智慧與正義並非任何人的專利。作為本港邁向民主自由的基礎，我們應將言論自由和理智的意見交流視作與選票同樣重要。我希望在市民眼中，本局會愈益成為積極領導力的象徵，而非一個爭論不休的議會。我們必須盡量聆聽市民的意願，審慎衡量社會的需要，為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

總督已為我們訂下周詳的計劃，我們現在便須捲起衣袖，着手擬訂正確而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法，將計劃付諸實行。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並非單靠舉起手指測試風向可以辦到。我們必須果斷，及負起領導群眾的責任。要取得市民的信任，我們必須放下彼此的埋怨去迎接面前的挑戰。

年輕一代會繼承我們面對的挑戰，至於是繼承較好、較差抑或是不變的標準，則有待分曉。當然，我們必須積極謀求增長和改進，但同時亦必須培育年輕一代在面對將來的時候，要不斷進取和豐富自己的智慧。本港的學校十分嚴格，課程非常繁重。這點對本港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然而，我們亦應在不影響授課的情況下，令我們的學校更加生氣勃勃。我們需要創新的意念去為孩子們締造一個不單只有嚴峻紀律和沉重功課的學習環境。我相信年輕一代的語文能力仍有改善的餘地，他們的創作潛力仍有待發掘。創意、改革和新意念，是面對未來挑戰的重要財產。我們不能單在憲制上演變。章則上字句的更改，並不能像魔術般改變我們的社會。我們必須從小引導孩子們培養正確的觀念。當日後他們懂得自己創作、遊戲和享受生命中最寶貴的自由時，便會體會到我們現在邁向新制度的重大意義。否則，他們將無法感受到新舊政制的分別，以致對日後的發展漠不關心。我們不希望再次見到這種冷漠的態度。我們必須在學校中引導年輕一代認識到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說過本局應關注直接影響市民生活的問題，而我認為教育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我很感謝當局亦同樣對教育問題表示關注，更希望本局能夠團結一致，辦好這項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投資。

人類的知識和智慧是一代傳一代地建立起來。在這過程中，老年人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釐定價值觀的時候，我們切勿忽略老人對社會的貢獻，任由他們為社會所輕視及遺忘。當我們年事漸長，亦會將我們的經驗與下一代分享。現今的老年人有時會抱怨未被善用或未能在迅速的現代化發展中佔一席位。我們必須先認識過去才能開拓將來。這個定律並非任何科技、發展或財富可以改變。我們應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幫助老人肯定其對社會的價值，使他們繼續成為社會上有生產力和有貢獻的一份子。全賴這些長者，傳統、經驗和智慧才得以流傳下來。我們有責任令他們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得以繼續。這不是單靠財政撥款可以辦到，而是需要我們以創新的意念，積極地應付面前各種難題。

困擾我們多時的通貨膨脹仍然會是社會人士非常關注的問題。雖然最近公布的數字顯示通脹率有下降趨勢，但不容否認，本港的通脹率依然過高。當局建議根據一項嚴格的計劃有限地輸入外地勞工，以解決部份行業勞工嚴重短缺的問題，從而壓抑通脹。但其他問題又如何呢？我謹促請當局，特別是研究通脹問題的專責小組深入探討問題的真正成因，以便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政府決定限制開支以對抗通脹，實在值得嘉許。倘政府是透過提高公營部門生產力而達致節約的目的，理應值得支持，但我們不能亦不應容許政府削減任何公共服務的質與量。

同樣，當局亦應致力研究如何增加收入，以資助各項發展計劃。政府不應容許有責任課稅的人士逃稅。我們都知道本港社會的財政負擔非常沉重，而這個擔子卻落在一小部份市民身上。我絕非暗示應擴大稅網，而是應確保沒有人可以繼續逃稅。

最後，我謹呼籲各位從政治的糾纏中踏出一步，好去想想我們的責任究竟有多重。別人會以本局的表現去測度香港及中國推行民主發展的前途。我們這個小小的議會，現正受到世界各國的注視，受到中國的注視。而最重要的，就是本港市民亦會留意我們的表現，並對我們充滿期待和冀望。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不要令他們失望。我們說過的話，以後沒有人會記得，但我們幹出來的成績，卻不會被遺忘。以上所提各點，其他不少議員都提出

過，總督施政報告亦有全面論及。在未來一年，本局將會就這些事項加以研究和辯論。相信我們必能找到方法，讓兒童過著更適合兒童的生活，亦令社會感受到本局議員都是負責任的成年人。我樂於關注的事項並不限於以上幾點。我更樂於與政府或本局任何人及團體合作，因為他們都與我一樣，衷心盼望迅速推行有效的政策，改善市民的生活。希望正如很多議員說過，各位都願意為本港的將來而撥開障礙。希望我們的討論會帶來解決問題的辦法而非帶來僵局。讓我們都互相尊重和維持尊嚴，令這個肩負重任的民主論壇為人所稱羨。而最重要的，是希望我們能充份善用推動香港繁榮的那一份幹勁和創造力去開展工作。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對本港事務作出了很全面的描繪，謹此致謝。我期待與各位議員共同努力，積極關注市民的生活，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建東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多謝總督向我們發表施政報告。總督有關立法局前景的說話，我尤其歡迎，香港確實正進入關鍵時刻，我們身為立法局議員須於此際作出重大貢獻。要作出貢獻，最佳的途徑是議員群策群力，願意以開放和坦誠的態度共同努力，達致共識。由市民直接選出的代表，在香港歷史上首次能全面參與立法局的工作。我希望我們立法局議員能以未來四年的工作表現，向香港市民、中國政府以及全世界顯示，民主改革能取得成功，而這方面的進一步循序漸進轉變，對香港和中國未來均有裨益。讓我們以行動來贏取中國政府的承認。

我很高興聽到總督表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將會加速，預期來年小組將會以新的動力，專心致志地進行工作。我知道在一九九七年前的餘下數年過渡期內，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我相信這方面亦會有合作精神。雙方必須互讓互諒，闡釋自己的意見和聽取對方的意見。我堅信聯絡小組的會談若要取得成功，關鍵是雙方願意同心協力，使意見趨於一致。雖然總督就聯絡小組會談的進展向我們作出保證，但我仍關注到香港市民的意見並沒有經常獲得全面考慮。我明白聯絡小組的職責並無規定小組在進行商議時須正式諮詢一般市民，包括本局議員的意見。然而，我殷切希望政府會向我們保證，小組商議任何問題時，香港市民的利益和關注事項均會獲充份考慮。對於終審法院的處理方式，我感到失望，希望聯絡小組日後能以行動證明，小組確實已全面考慮香港市民的意見。

我希望簡略談談經濟問題。我們的前途依賴經濟，這事實絕不容忽視。香港日後如要繁榮興盛，最基本的要素是本港的經濟繼續朝氣勃勃。在中國答允的「一國兩制」制度下，我們一定要明白，香港必須對中國的經濟起關鍵作用。要做到這點，我們在九七年以後，必須繼續保持一直以來令香港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進取精神。若辦不到，恐怕准許香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推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論據難再成立。

基於這原因，我相信對本港社會進行任何改革時，經濟因素必須獲優先考慮。此外，我同意總督的說法，經濟若不持續增長，當局難以增加撥款改善社會服務、福利及教育質素。因此，我們必須齊心協力，促使本港經濟持續增長，這樣社會整體最終才能更趨富足。

本港經濟在短期至中期而言能否保持健全，令人擔憂的事項之一是美國威脅要取消中國最優惠國地位。美國如取消中國最優惠國地位，對香港極為不利。為保障我們本身的利益，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協助解決問題，並消除任何危及中國最優惠國地位的障礙。

香港現正規劃的發展，或可稱得上是全世界最雄心萬丈的計劃。興建新港口及機場對香港未來的繁榮至為重要。這些龐大計劃除會增加通貨膨脹壓力外，我們確實亦沒有足夠人手，使工程能在政府計劃擬定的時間內竣工。

輸入勞工問題引人爭議，但我相信如果計劃得以密切管制，進一步輸入選定行業勞工不但不會危害本地工人的利益，且會符合本港市民的整體利益。我們需要進行基建計劃，促進經濟增長，我們亦需要額外勞工，進行這些龐大的建築工程。如果我們未能從現有資源中增加勞工數目，我們並無他法，惟有輸入外地勞工。

通貨膨脹問題依然嚴重。雖然最近統計數字顯示通脹率輕微下跌，但仍然較我們大部份貿易夥伴國的通脹率高出兩倍以上。其他國家似乎正著手解決通脹問題，我們則顯然沒有。香港再不能讓這種不平衡情況持續下去。通脹問題顯然備受社會不太富裕一群深切關注，同時亦會嚴重損害本港經濟。如果我們未能迅速和競爭對手、主顧國、及世界其他國家趨於同一步伐，我們的競爭能力就會受到嚴重削弱。昨天，我細心聆聽本局同僚提出他們認為導致本港通貨膨脹的成因，相信部份分析是正確的。

對於成立小組找出通脹成因及尋求解決方法，我深表歡迎，並促請政府採取積極措施，迅速解決這問題。預料有關行動會令社會某些人士感到不快。因此，希望當局在落實選定解決措施前，會全面諮詢本局的意見。

本港的未來除依賴健全的經濟體系外，維持治安亦非常重要。兩者並非互不關連，因為我相信經濟衰退會導致治安相應日趨惡劣。我歡迎總督向我們保證不會讓治安水準下降，但我希望政府會向我們透露更多具體資料，闡釋會採取何種措施維持本港治安。我尤其希望知道，政府會制訂何種應變計劃，應付經濟衰退時出現的問題。近日持械行劫案劇增，令人擔憂。這類劫案在此刻本港經濟尚屬健全時已有所激增，令人尤其憂慮。如果本港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經濟前景黯淡，情況又會如何？我明白政府須限制公共開支，以斥資進行各項基建計劃，然而，我希望政府能保證會向執法機構提供足夠資源，好使本港治安不單得以維持，更進而得到實質改善。

最後，我重複最初提出的論點。未來發展有賴善意態度和衷誠合作。本局若要使香港市民產生信心，首先必須令他們認為立法局議員處事持正不阿。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文光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作為一個教學界功能組別的代表，對於今年的《施政報告》，尤其是有關教育部份，是非常失望的。

首先，是《施政報告》中，極度輕視教育在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發展中的位置，《報告》中文本只有六句共 110 個字是涉及教育的，原文是：「由現在至一九九五年，本港高等教育的一年級學額由 14000 個以下增至 20000 個以上。特別由於我們決心要在擴展學額時維持國際認可的水準，這項成就將會是很不簡單的，也需要各有關方面作出不少努力才能達致」。另外還有一句是：「我們一直不斷改善中小學教育的質素」。

從這僅有的六句中，我們看到了政府在教育事業上的不平衡和偏差。

第一，是高等教育的發展過速，與預科教育失去平衡。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一項重要的成就，這是必須肯定的。但在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卻沒有提供足夠的預科生。今年的專上學院新生，入學平均成績普遍下降，甚至個別院系收生出現困難，這是高等教育和預科教育失去平衡的一個警號，表示未來高等教育可能出現的危機，就是大學質素下降。這樣的結果，與社會人士對大學畢業生的期望背道而馳，與《施政報告》中希望大學在擴展學額時維持國際認可水準的目標背道而馳，這是我們從《施政報告》中看到的第一個偏差。

第二，是專上教育的發展衝擊了師範教育的發展。由於專上教育的學位大增，使教育學院失去了吸引力。今年，申請入讀教育學院的人數，由去年的 6176 人下降至 4399 人，人數下跌了近三成，如果專上學院的收生水平已大幅下降，那麼，教育學院的新生水平當會更低。副主席先生，教育學院是培養未來教師的地方，面對收生人數和成績均下降的困境，我們又怎能期望未來基礎教育有優秀的教師呢？沒有優秀的教師，又怎能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呢？在《施政報告》中，對教育學院的前途和地位，師資的培育和訓練，完全沒有觸及，這是我們從《施政報告》中看到的第二個偏差。

第三，是高等教育與中小學教育資源受到消減的同時，更出現資源分配的不平衡。更坦白的說，是當高等教育根據社會的需要而擴張，中小學極需要新的資源來提高教育質素的時候，政府卻要在未來幾年緊縮教育部門的開支。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要發展高等教育，必然地佔用了中小學的教育經費。去年，專上教育佔總教育開支的 29.2%，今年上升至 31%，而中小學教育開支卻被削減 4.5%。在這裏必須說明，我們完全贊成高等教育的擴張，也知道這樣的擴張勢在必行，但政府必須要另撥資源，而不應犧牲了中小學教育。此外，政府更應在未來數年，密切檢討高等教育的擴張，如有可以節約的地方，則轉撥入中小學。眾所週知，中小學是基礎教育，基礎教育不穩，建築於其上的高等教育，正如浮沙上的堡壘，是絕不鞏固的。這個做法顯然違背了《施政報告》中「不斷改善中小學教育質素」的目標。這是我們從《施政報告》中看到的第三個偏差。

第四，也是最令人感到不平的，是《施政報告》中完全徹底地忽視了幼兒教育，忽視了幼兒的學習權利，忽視了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承擔。儘管 99% 的適齡兒童都在接受幼稚園教育，儘管絕大部份幼稚園教師都忍受着極微薄的待遇，儘管很多幼稚園都在困難的環境中求取生存，然而政府卻毫不加以援手，視幼兒教育如無物。兩年來，幼兒教育經費只佔全港教育經費的 0.75%，連一個百分點也佔不上，這不單是可憐，更是可哀，是香港教育的悲哀。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幼兒教育」四個字根本沒有出現過，這對於那些勤勤懇懇，竭盡心力，為幼兒教育獻出青春汗水的教育工作者來說，公平嗎？合理嗎？這是我們從《施政報告》中看到的第四個偏差。

要糾正這四個偏差，最關鍵的地方是：政府必須視教育為未來社會發展的一項優先而必須的投資。香港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地方，工商業發展有賴人才。現在，高等教育的擴張，佔用了三分之一的教育經費，而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人才正推動着香港的工商業發展。因此，工商界是否需要對本港的教育，有着更大的承擔？例如多付出 1% 的利得稅，用在教育的投資上，用在培育人才的事業上，而最終的得益者，將是工商界和香港社會，將是我們的下一代，這應該是一個極有意義的投資。

此外，必須指出《施政報告》中的機場和有關的基建計劃，對社會和民生的影響已經開始顯露出來。由於機場核心計劃耗費龐大，政府部門的服務，包括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教育、醫療和福利等社會服務，均受到削減。由機場核心計劃所帶動的通貨膨脹和輸入勞工問題日益嚴重，升斗市民雖付出勞力，但生活質素卻不能相應提高，甚至下降，這將影響香港社會的穩定。面對未來困難的局面，政府部門有責任採取措施，包括凍結公共事業加價，遏抑過熱的炒樓活動等，使通脹得以紓緩。此外，亦要停止輸入勞工，使香港工人，能夠分享香港經濟繁榮的成果。

最後，副主席先生，由於我還有時間，我想就昨日部份議員對港同盟的批評作出回應。昨日，港同盟在辯論中遭受到很多的批評：有人說，港同盟在九月直選中的表現，是造成現時中方不承認立法局地位的一個因素；有人說，由於我們監察政府，言論大大打擊了公務員的士氣；有人說，我們帶有色眼鏡去看人，或故意醜化對方來提高自己的聲望等等。

聽到這些批評，我的心裏很平靜，沒有憤怒。我總覺得，在一個來自不同背景的議會裏，不同的意見是絕對正常的，因此，我不打算用同樣重量的，戰鬥性的語言作出回應。我唯一要說的，是希望在座的同事明白，時代已經變了，請看看已經變化了的蘇聯和東歐，請看看蓄勢待變的中國，就可以看到香港的變化，不過是國際大氣候中的一道暖流。這個變化是什麼呢？就是民主開放的潮流，在這潮流下，任何政府都必須要向人民負責，受人民監察，正因為這個改變，才不會重蹈歷史的覆轍，讓獨裁的人、專橫的人去主宰人民的命運。

其實，香港人是能適應這個轉變的，香港人是接受這個轉變的。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個民意調查，說 43% 的市民認為民主派在選舉裏的成功增強了他們對前途的信心，而持相反意見的人只有 10%，這就是民意，民意希望未來的政制走向民主的開放。因此不要過於敵視港同盟其他民主派的同事。最恰當的做法，是不要誇大這些力量，也不要刻意貶抑其代表性，只要將其意見視為民意的其中一部份，擇其善者而從之，心裏便會舒服得多。

也不要以為港同盟會敵視政府的官員，人的崗位各有不同，但內心是平等的，我們對一些官員心中也有敬意。我只想舉一個例，在上星期三的會議上，我看到黃錢其濂的答辯文件，貼滿不同色彩的標貼時，我的心裏非常感動，我知道許多官員都準備充足，但希望下次他們也有同樣的準備，請容許我在這裏向她表示尊敬。

副主席先生，我又要扮回我的角色了，作為一個教學界的代表，對於這份在教育問題上充滿偏差的《施政報告》，我是極為不滿的，我希望這不滿的聲音，能引起立法局和廣大市民的關注，做成壓力，使政府改正偏差，造福下一代。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詹培忠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對中港關係方面作出很詳細的申述，亦對未來的中港關係，更清楚地引導港人的意向，但總督應更明確的表達九七年後香港並非獨立，一切應以中國的意向為主要決策，而一切文件對中國政府、政策無損害及無抵觸時才有效力。否則，引起爭論時對香港市民並沒有什麼好處，特別是，我們應了解目前的政治表達方式，對手是那一方面，以免在一些不同見解問題上引起對抗，總督更應該在未來的日子裡，讓市民更了解中國對香港九七年後的主權國觀念，以及對香港管治權的意向。

關於香港內部的通貨膨脹問題，事實上，通脹、交通擠塞、社會治安差、娼妓等問題，都是進步、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問題，如果沒有上述四類問題，該等城市就沒有資格自稱發達。香港的通脹問題其實非常嚴重，大家都了解關於通貨膨脹的六大因素：衣、食、住、行、電及通訊。衣在香港沒有問題。食方面，副食品得到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固定供應，沒有問題。存下來是住、行、電及通訊。本人認為行、電及通訊方面，政府首先應該將該等專利權的允許利潤，從13.5%至16%降低至8%至9%，這是因為：第一，世界性的利率已下降。第二，部份專利公司已有兼營其他業務。第三，該等專利公司在過去已得到港人很多好處，現在忍讓一下，亦不為過。否則，政府可以將專利權再公開標投。的士牌可以繼續發出，無須限制，只視乎路面的負荷量而定。至於住方面，無可否認，住宅樓宇的漲幅是相當驚人，但本人卻要提醒政府，最好不要干預，理由如下：第一，香港缺乏資源，政府從來極少資助私人企業，在八三、八四年地產低潮時，很多地產公司在破產邊緣掙扎，甚至破產，政府何嘗有伸出同情之手呢？第二，香港的成功除了地理環境外，就是企業的制度及從業的自由，此點可以從香港的成就與世界其他自由國家或地區作一比較，便得出結果，同時亦可以從證監會及聯交所對部份有相當升幅股票的調查干預，影響到整體成交額及部份二、三線股的下跌結果得到證明。簡單一句話，干預是失敗的。第三，香港地產的畸形發展是部份銀行所做成，因為只有新樓宇，銀行才接受按揭較高成數及手續快捷，容易被接納。故此，關於住方面，本人主張，第一，政府全面凍結重估物業價值，換一句話說，不能增加差餉及物業稅，以免一些業主乘機加租。第二，多拍賣一些住宅用地，以阻地價漲風，同時未來特區政府亦可得多一些儲備。第三，容許大部份工業類樓宇補地價後轉為住宅樓宇。至於工資上漲，關係到通脹問題，本人主張在特殊的情況下，例如：未來飛機場的興建等，政府可安排輸入勞工，以兩年合約為限，期滿要返回原地，不可續約。這樣，一方面可解決勞工問題，另一方面不會影響本地勞工就業機會，亦不會將香港的生活水平拖低，影響市民消費力。當然對付通貨膨脹並沒有特效藥，但如果能參考執行上述部份措施，相信有一定的效果。

提到機場，政府可以將未來的「赤鱲角機場」改名為「香港機場」或「香港新機場」，這個名稱更為實際，因為對外國人來說，「赤鱲角」三個字較難解釋。

副主席先生，本人來自金融服務界。相信政府有關官員對這方面操作亦比較陌生，但本人認為在九七年後金融服務將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到時的外交及外國政治問題，全由中國直接管轄，金融及金融服務在香港將有特出表現的機會，故此，無論在九七年前或九七年後都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一如本人在前面所說，香港政府極少資助獨立行業，故此，不應利用行政手段干預金融服務界，特別是聯合交易所的行政。我們應了解香港的證

券業今年恰巧達到一百周年，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作出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不容許及不同意證監會利用證監條例第 50 條，不合理的耀武揚威、嚴重干預人權、干預公司法、干預選舉法。希望有關當局應立刻注意，以免令作為世界性金融中心的香港，蒙上不可磨滅的污點。本人主張應該讓金融服務界有更自律的發展機會，包括聯合交易所，金銀貿易場，期貨交易所及保險業。特別是證監會，不能隨便調查股票的交易情況，這樣根本上已是行政干預正常操作，干涉人權法，嚴重違反了香港政府的不干預政策，除非能證明有關交易嫌疑涉及內幕交易，則當別論。為了香港自由的可貴，市民的人權及從業的自由，本人嚴正反對證監會的部份無理措施，希望政府密切注意。此外，由於香港證券業日趨國際性，會利用中央結算及自動對盤交易，將來有些銀行會參與業務交易，自然有利益關係或利益衝突，為了確保聯交所在正常情況下操作，避免其他行政干預起見，政府部門更應合理維護法例的完整，即是行業操作的自由，除非證明違例或違法才可干預。

既然政府希望香港聯合交易所能夠成為世界知名交易所之一，當然亦希望聯交所有足夠條件與世界其他交易所競爭，新加坡及倫敦交易所將相繼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稅。在這種壓力下，希望政府應先一步籌備，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稅，這樣才不會令香港聯交所落後於其他世界性交易所，才不影響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關於憲制方面，總督在施政報告中，亦有談及九一直選及九五立法局將全部由選舉產生。事實上，本屆所謂九一直選是香港二區，九龍三區，新界四區，故此，應該稱為「分別直選」才合理，雖然有部份人是不同意，因為並不是全港普選。同時功能團體選舉亦是直選，只有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才稱為間選。立法局議員們應知道他們除了原有的工作外，只能代表市民及立法局向港府或英國政府表達他們的意見，而不能直接向其他國家政府或地區政府表達意見。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談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其實在過去數年中，中國各省，特別是廣東省為香港提供了後勤基地，在轉口方面亦年年大幅提升。在中國開放政策的主導下，香港未來的經濟還是欣欣向榮的。只是作為香港主要出口國的美國，對中國最優惠稅的問題，最為困擾，事實上，最優惠稅並非美援，根本上對兩國或兩地人民都息息相關，我們應提高警惕，為未來國際間的不合理指摘及對待而作出預備，同時對美國的「301」方案亦要密切注意，因為這兩條方案將直接影響香港的經濟前途。

本港的地產業亦直接影響內部發展及增長，城市發展規劃的原意是很好的，但如果給部門任何成員太大的法律權力，不但對本港整體發展沒有好處，而且嚴重阻礙一切工程的配套，有關當局應予留意。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事件是值得港府官員們反省的重要事件之一。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一如對銀行一樣重要，如果存戶沒有信心，位居香港第一的匯豐銀行，一旦發生擠提時亦應付不了。雖然港府官員引咎辭職的例子不多，但他們更應有警惕性、責任感。例如：「國商事件」前後二天，前言不對後語的說法，無論對市民及存戶甚至政府的威信，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因為大股東阿布札比從沒有為「國商」提供任何保證。希望政府對有關官員的做法要嚴格監督，才不會引發市民的信心問題。

副主席先生，本人更借此機會代表體育界，表達關注業餘體育總會及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主席任期問題。在一個民主及公平競爭的社會，我們應否容許及支持一個不民主的制度？政府方面雖只是支持個人比賽項目的經費，但廣大市民有權知道我們的公帑是否花得合理，花得恰當，政府不能以私人組織內部問題，回答市民的質詢。

至於有關治安、越南船民、社會福利、公共建設、交通等問題將由其他議員表達。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贊成動議。

黃宏發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我發言支持李鵬飛首席議員提出向督憲致謝的動議。我不會長篇大論，只集中討論憲制發展。

副主席先生，本屆立法局令人觸目的發展，莫過於會議將不由督憲，而由副主席閣下主持。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但我要指出，這只是一個開始，仍嫌不足。第一，督憲仍為主席，而閣下只為副主席。第二，閣下是由督憲委任為副主席，而非由議員互選產生的。在未來一、兩年內，必定要進一步改由本局議員互選主席及副主席。在此，我要提出英國國會下議院互選議長的幾項優良傳統，供大家參考。第一，互選先經醞釀，人選須為熟悉議會運作及為各黨派認可或起碼不反對者。第二，議長不參予黨派政治，若屬某黨，仍須遠離黨務及政務。第三，當選議長後，下屆若成功保持議員席位，則自動連選連任議長。副主席先生，以閣下法律長才，富立法局經驗，不屬任何黨派，為人公允持平，一旦改制，自然是得到各議員的支持，擔當主席。故此，我率先宣表我支持閣下出任主席。(有些避嫌，亦是「擦鞋」。)

副主席先生，容許我略論督憲提及但只強調夥伴關係、協作精神而未加詳論的議會運作體制及行政立法關係。本局各位可敬同僚現正檢討研究，以期在本年度六個月內，建立一個在本局下正式的委員會制度，以取代現行內務會下非正式的體制。在此，我要指出在香港的議會制（有別於總統制）政治制度下，議會即立法局的角色是透過立法和監察來制約政府，施政的主動通常是屬於政府的，例如政府的提案應優先處理，這並不表示議員不能有提案，更不表示政府的提案必定會獲得通過，我們可以修改或甚至不通過。又例如公共開支只容許政府提出，當然這也不表示一定獲本局批准。在這議會制的政治制度下，立法局不同美國國會與總統之間那種相互制衡的總統制度，各有主動。立法局也不比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在法理上為超級政府。我們的立法局不是超級政府，這是我們在設計委員會制度時不可忘卻的大前提。各位可敬同僚間現有不同意見，但似乎把焦點放錯在兩局內務會及其 16 個常設小組的去存問題上。我建議將這焦點正確地放在以下問題上。第一，我們應想想，究竟只應設一系列的委員會，而這些委員會同時兼顧監察政府施政及審議條例草案；抑或設兩系列委員會，其中一個系列是監察政府施政，另一系列審議條例？第二，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究竟由一讀或甚至一讀未開始之前已印在憲報上、甚至乎醞釀時期已經開始，抑或在本局二讀動議通過後才交給委員會進行工作呢？第三是否亦應研究現時南亞洲英聯邦國家，如印度及斯里蘭卡漸興起的協作委員會體制，成員包括各黨派議員，亦包括有關部長及／或行政局成員呢？

副主席先生，督憲施政報告內提到全面檢討選舉制度及有意設立一個獨立的選舉事務委員會，對此我深表歡迎。在此，我要指出在這檢討內，最必須考慮和處理的並不是拉票、開支、政黨、宣傳板及橫額等雖重要但並非最基要的問題，而是以下三個與選舉必須普及和平等兩項原則有關的問題。第一，現存制度下，直選的 18 個議席分為九個雙席選區，取決方式為較多數者當選，即任何兩位得票較其他候選人為多的候選人，即使其票數不到一半也可當選。在這制度下，某一大黨派在只得到總票數的半數，甚至少於半數，也可得到三分之二或超過半數的議席，這就是政治學者說的「扭曲」現象。這次港同盟是大贏家、18 席中得 12 席（不是 16 席），但下次那一個是大贏家呢？可能是乳鴿黨。再者，這制度是否公平呢？是否給予每一選民平等地影響選舉結果的機會呢？第二，現存功能組別選舉的問題更大，投票權並不普及，不是人人有權投票，一旦被劃為一個選舉組別時，不論該功能組別內的人數多寡，一律只給予一席或兩席（即有些變化），這安排是否符合平等原則呢？第三，我知道民協可能想告政府，稍後，馮檢基議員可以一提的是，一九九五年由選舉委員會產生的 10 席，也面對着一些與功能組別選舉類似的問題。若選舉委員會由四類人士組成，各佔四分之一，即工商四分之一、專業四分之一、社團四分之一、政界四分之一，那麼，能否符合普及及平等兩項原則呢？因為似乎大部份四分之三全是功能組別的。副主席先生，我在此籲請政府及本局各位可敬的同僚共同關注以上的三大問題。

副主席先生，最後容許我在此再次期望閣下能早日「坐正」，被稱為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馮檢基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九一年總督施政報告，是近年最缺乏進取性的。當前市民最關心的兩大問題，第一是高通脹，第二是基本建設對民生的影響，令人失望的是總督將高通脹歸咎於勞工短缺，而對基建的交代，可以說是「瞪大眼說一個大笑話」，我想就以下的問題，提出我的意見。

基建問題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一方面說機場港口的興建不會犧牲市民日常生活的利益，不過在其他段落卻又暗示政府在資源分配上要遷就基建計劃，又要市民犧牲去過緊日子，報告的第 51 段說「在有需要時將某一計劃的資源撥供另一計劃使用，以反映優先次序上的改變」。而在第 62 段又提及在過去，香港市民亦會作出過很大的犧牲，去營造本港的經濟和發展基礎建設，過去已有先例。這是否意味着面對未來龐大的建設，市民都要準備過幾年緊日子。不過，政府從來沒有具體地，更沒有詳細地向市民交代基建預算的細節安排，沒有公開諮詢市民意見，更沒有讓市民有選擇的餘地，去決定要如何犧牲來換取一個美麗的玫瑰園。

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應就基建項目與公共開支的分配比例，公開諮詢市民意見。本人並且警告政府，切勿透過開徵任何形式的銷售稅或增加間接稅去平衡政府的開支，免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福利問題

施政報告亦顯示政府的社會福利觀念是一個大倒退，在資源分配的比例上，作出對小市民不利的打算。單單回顧過去三兩年的社會福利政策，我對政府的反覆無常感到困惑。一九八九年的施政報告，總督說：「設立了一個全面的保障網，確保本港所有市民的生活水準，不會低於基本的生活水平」。(65段)可見八九年所提倡的一套社會保障制度的福利觀，到了九〇年可謂更上一層樓，總督除了強調為無依的人設立一個社會保障網之外，還提到「越來越需要的，往往是專業輔導而非經濟援助」(54段)去配合社會及人口結構的發展，標誌着一個突破了救濟式的保障而邁進一個進步的福利概念。九〇年總督更自豪地指出：「這是今日的福利服務和過往服務的重要分野」。(54段)

言猶在耳，可惜今年的施政報告，並沒有承接前一年的方向，亦沒有詳細提出重要的社會政策，只是用數十字輕輕帶過執行社會福利白皮書的建議。令人最不安的是總督在第3段，用了「保赤安貧」這類字眼。對赤貧的照顧，我們大家都知道是五、六十年代救濟式的觀念，從向前望突然急轉為向後退，令我不能夠不懷疑政府是要準備進行一個大型基建而犧牲在社會福利上的承擔。總督雖然說：「政府當局並沒有把提高本港社會福利質素和增加社會服務種類的工作，視作一項奢侈品」。又說：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性，絕不低於在港口設施或新道路系統上所作的投資」。(64段)不過從最基本的概念上的倒退，已經令這些承諾變得空洞。

高通脹問題

過去一年，大部份小市民薪金的增幅，都追不上高的通脹，而個人各項的免稅額調整，就更輕微得可憐，加上加薪的幅度又追不上，其實是收入下降，而交的稅就越多。

從總督的施政報告，小市民現在已經過着緊日子，我相信將來會更緊。

- (1) 面對增加輸入勞工，人工自然不會加，甚至飯碗都不保。
- (2) 通脹成因複雜，只從輸入勞工方面着手，我很明顯看到未來的通脹會繼續高企。
- (3) 政府還說市民要準備接受政府削減用作改善公共及福利的開支。
- (4) 最後，我相信，稅除了要照交之外，可能要交得更多。

香港市民是否有選擇呢？有甚麼選擇呢？我懷疑政府沒有考慮過這種種的問題，又或者是早有預謀，不過不告訴市民知道。

本人強烈要求政府不要再作出空洞的承諾。應該實事求是，向市民具體交代機場計劃的融資安排，切實估計對民生的影響，由市民作出抉擇。

另外，整個基建其實為大企業帶來龐大的投資機會，到新機場落成，又會提高香港經濟發展的潛力，遠景光明，對商家，間接對市民都有好處。既然同坐一條船，為何在現在過緊日子的關頭，政府只偏偏選中小市民去犧牲，又要小市民扮演如此壯烈的角色呢？本人看不到為何不可以增加公司利得稅，或者發行債券，去分擔基建的代價？

衛生福利問題

在衛生福利問題上，總督對醫院管理局的成立充滿期望，以此為改善醫療服務的仙丹，能夠將帆布床變成歷史陳蹟，好像很美滿。這是隱藏了美好新現象的代價，政府其實是將醫療服務進一步私營化，提出了「用者自付」的形式，去減少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最近政府診所正試驗用病人的病歷紀錄去改善服務質素，就是因為沒有財政資源的配合，而被逼減少應診的數量，大大影響市民到政府診所求診的安排。

因此本人敦促政府提供額外資源，使基層健康服務小組報告書的建議，得以及早實施。要真正提高市民的健康，政府必須承擔改善基層健康服務的開支，配合完善的社康護理服務，以及有效地建立一個分區化的社區基層健康服務網，使人人健康的願望得以實現。衛生福利司曾提及進行全面的醫療政策檢討。本人期望檢討可以盡速完成，進一步保障市民健康。

房屋問題

香港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出色的房屋計劃，港府一直都引以為榮，當政府太自豪的時候，可能會緬懷麥理浩時代所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氣魄，不過一提到錢，就無法討論到這個可讓中、下階層有一個安樂居所的偉大構想，認為是大包袱。無怪乎近年的房屋政策都明顯地推卸責任，與市民需要脫節。譬如：居屋樓價與私人樓宇樓價掛鈎遠超乎中、下階層所能負擔。質素差而價錢貴，居民對出售公屋計劃反應冷淡。至於，實行「富戶」租金政策，更引起怨聲載道。上年度，政府拒絕注資房委會，令到房委會未來要靠進一步出售公屋及居屋去牟利，才可自負盈虧。政府一向自誇為最偉大最出色的房屋計劃，去了那處呢？可能我們要將這個最出色，最偉大的形容詞，留待日後去形容、去歌頌我們的玫瑰園。

本人認為政府必須修正房屋政策的方向，房屋是市民的必需品，如情況需要，政府必須在財政上支持房委會，使出售公屋、居屋等計劃能夠切合普羅市民的需要，對於多年來擾民的富戶政策，房委會應該在是次檢討中，認真聽取民意，立刻糾正一九八七年通過的「長遠房屋策略」內採納以「私人樓宇做主導」的策略，因而限制了政府在公營房屋的建設和擴展。在私人樓宇的樓價高漲情況下，房屋單位需求遠超過供應，政府必須重新檢討「私人樓宇主導」這個罔顧中、下階層利益的政策，並且須要立刻增撥土地給房委會及私人發展商，興建更多房屋，以解決房屋問題的需要。

政制發展方面

有關政制發展，雖然施政報告一再保證在一九九五年有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議員由直選產生，以及取消委任議員制度，並再表示會於適當時機與中方討論，加快直選的步伐。不過

本人覺得並不足夠，第一、本人認為到九五年，立法局應有不少於 50% 的議席由直選產生，只有這個比例才能符合九七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

第二、已通過的人權法案確立了人人有平等政治權利。功能團體選舉所做成的不公平，實在應該檢討。

如果香港真的不能夠取消這種不公平的選舉制度，至少我們亦應修改選舉法例，使合乎民主原則。例如：將「一會／公司一票」的規矩改為由指定登記的個人選民去投票，以避免一個人同時控制多票的情況。此外，登記選民亦只可在功能組別或地區選舉中選擇其一投票，如此才可以保障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則。最後，在九五年用以取代委任制度的大選舉團，本人認為必須釐訂一系列的選舉法則，去界定大選舉團的產生方法，提名過程及投票方式，使其更合乎民主精神。

中、英、港關係

至於中、英、港關係，中、英雙方在處理香港事務上，都令港人失望，它是不斷的打擊港人對前途的信心。英國方面，一直都忽視民意，單以英國利益着想。以基建計劃來說一直沒有諮詢民意，亦沒有公開全盤計劃。最近與中方簽署的終審庭協議，也沒有諮詢立法局，亦沒有諮詢法律界的意見。而中國方面，一方面漠視立法局的質變，當引入直選以後，其實立法局已經是一個越來越具備代表民意的機構，不過中方只拘泥於抽象的原則，不直接與立法局議員接觸；另一方面，事事又以體現中國主權為藉口，在重大的香港事務上，只與英方談判。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如果中英雙方、特別是中方現在仍然不尊重香港民意，不尊重香港民意的代表，我相信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危機，是無法改善的。香港政府應敦促英國在未來，就香港事務與中方磋商時，要增加透明度，讓立法局的直選議員列席，加強港人的信心。

為促進順利過渡，我覺得立法局議員亦應就香港事務，主動與中方接觸，反映港人意願。只有透過接觸，才可以彼此學習及在政治、經濟上合作，從而縮短中港兩方面的距離，這樣才能為九五年立法局直通車的銜接做好準備。

作為一個撤退中的英國政府，應盡速做好整體的政務本地化工作，而以港人意願為決策依歸。在處理中、港關係上，本人認為港人要不亢不卑，既無須恐共、抗共亦不必媚共、迎共。

結論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中、英、港關係在變、政制在變，經濟未許樂觀，基建增加我們的壓力，資源有限，越來越多的問題等待我們解決，如何可以按緩急輕重去改善資源限制呢？我認為讓市民有份參與，有機會決定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問題及前途，才是令香港成功應付挑戰的方向。

副主席先生，總督曾提及在中港關係、立法及行政機關上，是應該建立一個夥伴關係，我認為我們應該增加多一個關係，便是研究立法局內議員們的夥伴關係。從此次的立法局辯論，我們要研究應如何協調立法局的議員，建立一個真正可以監察行政機關的角色，從而改善市民的生活呢？我想希望向各位同事衷心的說一句，一個四分五裂的立法局是無辦法保障市民的福利，無法監察行政機關的。我自己是「新丁」，我加入立法局，我對立法局有期望，我很不希望見到立法局四分五裂，我希望各位同僚可以分享我的良好願望。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夏永豪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總督施政報告說：「我們一直不斷改善中小學教育的質素」。這句說話令我感到非常鼓舞。然而，使我覺得失望的卻是，施政報告並未就達到該項目標，提出具體的方案。

我完全同意，要貫徹今年和去年施政報告的精神，教育方面的施政方針便不應再以量為重點，而應側重於質素的提高。本港市民廣泛抱有一個看法，認為香港的教育質素已在下降。我們經常聽到僱主訴苦，批評甫出校門投入社會工作的莘莘學子，非但不能寫出通順的文字，連普通知識也相當貧乏。專上院校對此亦有類似的微言，抱怨入讀高等課程的學員，越來越多未具足夠的根基，使此等院校的教學工作非常吃力。

政府官員最慣常提出的一個辯護理由，就是學生的學業水準其實並無下降，問題在於學生人數較昔日為多，以致從比例上來看，成績優良的學生便似乎比以往稀少。我不希望在今午花費太長時間去辯論上述論據是否正確的問題。我只想指出，重要的是廣大市民既認定學生的學業水準已走下坡，便顯示社會人士不滿目前的水準。任何尊重民意的政府，都必應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

教師是促使教育質素獲得真正提高的關鍵因素。教育是一門極度勞工密集的行業。教職員的薪酬，在一間典型學校的運作開支中所佔的比例，往往超逾八成。然而，教育人員的前途卻頗為灰暗，以致教員士氣低落，抱怨訓練不足、升職機會差和缺乏專業發展，以及教師大量流失的情況，時有所聞。

讓我們單看一下小學層面的師資訓練情況。這個層面的師資似乎最為匱乏。時至今日，一名中五畢業生只有數科考獲合格成績，仍可進入教育學院攻讀，在完成三年師訓課程後，便能取得一張非學位資格的證書，然後投身教育界，以教學作為終身事業。

這種情況在 20 年前還可以接受，因為當時香港在教育方面主要側重於量的發展，對教師的要求不如今日之高和複雜。但現時香港卻不可以再接受此種情況。

茲簡單列舉幾點，以說明我持上述看法的理由：

首先，香港愈來愈趨繁榮，因而引發多項社會問題。但此等為繁榮付出的代價，卻有時為人所忽略。

家庭方面所承受的諸般壓力，例如雙親均要外出工作、父母離異、色情引誘、毒品、三合會，自殺及兒童離家出走等，均會減低學童在課室內的學習效率。因此，必須加強師資訓練，使教師具備處理此類新問題的能力。

第二，今日的教師必須學習新的技巧，以便懂得如何掌握活動教學法、運用最現代的教具和使用其他很多先進的設備和方法。

第三，由於現代經濟的發展倚重良好的溝通技能，因此教師必須精通中英兩種語文的運用。

第四，在資訊和知識不斷激增的社會裡，教師在各門學問及個人選科方面的知識必須與時併進。

第五，由於實行普及教育和隨機派位辦法，同一課室內的學童在能力方面出現較大的差距，教師必須有應付此種情況的新技能。

其他工業經濟地區均已承認社會對教師的種種額外要求，並且作出反應，改善師資的訓練。即使小學教師，亦必須由大學畢業生擔任，使其與別類專門行業人士同享平等的地位。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下定決心，致力提高新入行和現職教師的學歷，使其起碼達到學士學位資格。

改善所有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的訓練只是半個解決方法。另外半個解決方法在於如何挽留受過訓練的教師，使其安於其業。如果你的目標是求富貴的話，那麼投身教學行業定然不能令你如願以償，這是普遍公認的事實，因為教學是一種神聖的職業，選擇此種職業作為終身事業的人士，只能希望獲得物質以外的滿足。

然而，教師和其家眷也需要應付伙食開支，他們與其他同等職業的人士均有相同的期望，因此，教師的薪酬福利決不能及不應較同等行業的人員遜色。

年復一年，教師不斷在每隔一定時間便與教育署舉行的協商會議席上，表達他們的不滿，例如他們既無醫療福利、也無牙科福利、亦無房屋福利，唯一只有一個條件比人差的退休計劃。然而，在工業學院及專上院校服務的教師，則可以獲享全部的福利。我到如今仍不明白，為何在其他學校任職的教師卻要受到次等的待遇。

當局在近期決定醫院管理局僱員的薪酬條件時，曾暗示亦會向教師提供類似的條件。有關醫院管理局僱員的方案，已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公布，並於同年七月獲得進一步改善。但教師方面的安排又如何呢？

政府當局早已辭窮理屈，再無推延此項工作的藉口，總督答應會將提高本港學校教育質素列作優先執行的工作。上項諾言使我感到鼓舞。我希望教師不用苦候太久便可得見曙光。

要認真談論提高教育質素這個問題，就不能不考慮其牽涉的額外資源。我在上文所述有關提高師資訓練及改善教師福利條件等幾點，都需要增加開支始能辦到。近來一些批評，指出專上教育的急劇擴展，妨礙了學校教育的正常成長，認為必須使兩者的發展回復平衡。

我完全同意，各個教育層面之間的發展應該維持一個健康的對比；我也同意，現行的專上教育擴展計劃應該稍作修改和加以輕微的調整。雖然如此，我卻希望政府當局不致被迫大幅削減在專上教育方面的開支。在每間院校刪減寥寥幾個課程所能慳省的開支，決不會達到所需的數額。

無論如何，我認為不同層面的教育互相爭逐同一個金餅，各自設法從中分取更大份的餅塊，並非可以帶來有益效果的做法。關於本港需要擴展專上教育的問題，以前有人已提出過充份的理由，我不想在此再作贅述。我只想指出，施政報告所定目標，此即到一九九五年為止提供第一年專上課程學位 2 萬個，在基本上是正確的路向。

現在所必需的是小心的監察，務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運用。有人關心專上院校會降低入學資格以便填滿學位空缺，而這些空缺是始料不到的。我希望這情形不會發生，而各專上院校會極力維持入學的水準。

要尋求所需數量的資源，政府必要在「限量金餅」以外動腦筋。總督在施政報告表示，在未來六年，機場核心計劃將會吸去 2% 的本地生產總值。因此，改善教育方面將不大可能獲得額外的資源供應。

鑑於教育是一項需經長時間才可見效果的投資，我建議政府考慮採用延後付款的方法，為改善教育的工作籌措經費。現時專上教育的擴展規模，以香港來說，實屬史無前例的龐大，並且贏得很多其他國家的讚賞，但是此方面對香港所帶來的利益，卻最少要遲至赤鱲角機場啓用了一段時間後，始會完全顯現出來。因此，我盼望本港可以利用貸款辦法，應付未來數年的需要，使香港教育不致因為暫時缺乏經費，而無法獲得正常的發展。

還有六年時間，英國便要結束在港行使了 155 年的治權。作為臨別的贈禮，又有甚麼比留下一個生機勃勃的教育制度更具紀念意義呢？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何敏嘉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我的發言會集中在我所屬功能選區的衛生事務及我在港同盟負責的人力及勞工政策。今年施政報告中醫療方面的內容，確實是比去年提及的三項，即摒棄公共援助觀念，改變收費結構，檢討基層健康服務簡單得多！

今年的施政報告，只是匯報了「醫管局」的進展和總督對它的極高期望。

另外施政報告亦宣傳了基層健康服務的檢討和有關的幾個項目。最令我驚奇的是，竟將「管制吸煙及勸諭市民切勿吸煙」列為當前急務之一。其實在醫療衛生事務種種問題當中，吸煙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優先次序呢？看到這項目在施政報告出現後，更令我懷疑政府究竟是憑甚麼準則去訂定各項衛生政策的優先次序。其實，談到當前急務，相信很多市民都會同意大有其他問題，例如護士人手的嚴重短缺，已導致各項新服務不能開展，而新醫院亦未能如期啓用。有關這些與衛生息息相關的問題，施政報告中竟然隻字不提。

上星期當我在這裏開會時，政府聲稱已做了很多改善措施。我必須在此指出，做了一些未奏效的措施，絕對不等於將事情辦妥了，市民亦不會接受這個交代。至於政府說到能夠做的都已經做了這類論調，本人對這個仍然管治香港的政府，竟有這種放軟手腳，不面對問題的態度，感到非常失望。副主席先生，我以上的發言是針對政府的態度，並非對任何官員的不敬。

我要指出港府從未實實在在地針對問題的根源去檢討護士短缺的成因，現在提出輸入外地護士，但全無長遠措施配合。我恐怕這個措施，就會像我們慣見的臨時病床和臨時房屋區，變成一個長期的「臨時措施」。

此外，輸入護士亦可能導致一些負面反應，如使流失加劇，入行人數繼續下降。我必須在此敬告政府：我們可能要付出巨大甚至難以補償的代價。其實政府應立即成立專責委員會去研究護士短缺的問題，然後提出具體和長遠的解決方案。本人提醒政府，千萬不要藉人手不足為理由，將答應了市民的醫療服務，乘機收回。

談到醫管局，總督對其有極高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把醫管局描繪成一個可以解救本港各種醫院服務問題的靈丹妙藥、將醫院管理局等同服務質素的改善、將消除帆布床等同於問題的解決，並假設所有的醫院服務問題都可以由醫管局一掃而空。與此同時，政府對醫管局的財政承擔，卻似有收緊跡象，這種做法，不論對市民或對醫管局都是極不公平的。

收緊財政承擔，是當年我和很多民間團體反對醫管局成立原因之一。醫管局的成立到今天已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我期望政府能全力支持醫管局的改革，而在財政方面的支持，尤其重要。假若今次醫管局的改革失敗，對香港的市民將會是一場莫大的災難。

在基層健康服務方面，報告書用了很多篇幅討論基層醫療服務，其中亦重點地提到將門診服務外判給私人執業醫生承辦，這無疑是意圖誤導市民相信改善質素是與外判門診有一個必然關係。

施政報告中，並無提到醫療政策檢討問題，但這項檢討卻可算是近年醫療衛生事務中最重要的一項。自一九七四年政府發表醫療白皮書後，已有 17 年沒有再作檢討。將要檢討的醫療政策是一個跨越九十年代的藍本，我很希望今次的檢討會是一個真正的、全面的檢討。關於範圍方面應包括醫生、護士及各醫療專業職系的人力供應和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應清楚界定各行業在這體系內應扮演的角色，基層健康服務的政策、醫院服務政策、收費政策等。

這裏我想特別指出收費政策的問題。雖然在臨時醫院管理局報告書和基層健康服務報告書內，都有明顯提到成本收回和不準備負擔有能力者。我很希望這兩份報告書並非偷步：收費政策的檢討，希望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檢討，而不會受到兩報告書的概念所影響，然後醫管局及衛生署跟從這政策而實行。我們很希望不要在用者身上收回成本，否則又是另一次向夾心階層人士打劫。

在人力及勞工方面，我希望針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的措施提出一些意見。施政報告裏提到，通貨膨脹是勞工短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全未提及通脹的其他任何成因。這個說法明顯把通脹完全歸咎於勞工短缺，眾所週知，我們現在的嚴重通脹，乃因政府對很多炒賣活動管制不力，加上容許各公共事業的加價與間接稅的增加。

從數據方面來看，政府亦未能在施政報告簡介會中提出有力的數據去指出現時通脹的成因。究竟有多少百分比是真真正正來自勞工短缺，有那些是佔通脹百分比更大的項目呢？又可否先針對那些項目着手呢？在缺乏足夠數據的情況下，我相信很多人都無法接受施政報告裏第 46 段將通脹完全歸咎勞工短缺的論點。

第 47 段所提到的擴大輸入勞工，將只限於「勞工短缺最嚴重的經濟部份」，但是當政策科向本局作簡介時，明顯地亦未有清楚數據顯示那一些行業是「最短缺嚴重」的一部份，當然更不能明確指出那一個行業內確切短缺的情況。在政策科未有具體數據之前，施政報告已明確地顯示要擴大輸入外地勞工，這顯然又是另一次的偷步行爲。所以，本人強烈要求在未有充份數據，以及未對輸入勞工政策作全面檢討前，絕對不應繼續擴大輸入外地勞工。

在檢討範圍方面，應先就現時本港勞動力市場的情況進行一些檢討，例如仔細研究現在我們就業率的趨勢、工資增長及各行業職位具體空缺情況。就檢討範圍方面，我希望提出以下一些建議：第一，當局應進行一些全港性的人力調查，因為勞工短缺問題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所以我們須要分辨出各個行業的實際情況，這些調查應該是仔細的，甚至要將焦點放到某個特定的行業內，找出該行業內那些職位及工種最短缺勞工。第二，應立即積極研究為某些工人提供再訓練的機會，幫助工人轉業，使他們能適應本港工商業的轉型，避免「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這個做法，可以繼續動員本地一些未動員的勞動力，使輸入外地勞工的政策無需擴大，使政策不致脫離本港的實際情況，

同時亦可避免壓低本地勞工的工資及剝削他們的就業機會。鑑於一直以來無良僱主剝削的情況，政府便更加應該監察，包括增加勞工處的人手去視察工人的住宿及其他工作條件，在需要時，亦應有效地對這些僱主，進行檢控。在行政上，當接受僱主申請輸入外地勞工時，僱主須證明他在本地真正無法找到適當的勞工。此等行政上及法例上的安排將有助本港工人權益的改善。

我期望政府能正視這些政策對社會造成的不滿及不安，並能夠實事求是地進行檢討和改善。

最後，我想提醒政府不要以輸入外地人手的方法，來代替長遠政策。副主席先生，港同盟的 14 位議員已經準備好隨時支持政府作任何改善民生的政策，我們不希望見到政府以拖延的手法，去捱過過渡期的最後五年零八個月。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黃震遐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不知是否因為政府對玫瑰色彩情有獨鍾，今年的施政報告，仍然彌漫着玫瑰園的浪漫情調，以報喜不報憂的心態來描述香港的經濟。因此，施政報告不但對香港今年預測四個百分點的增長率表示滿意，而且認為只要輸入勞工，就可輕易解決通脹問題。

可惜大多數市民沒有戴上玫瑰色的眼鏡，因此無緣看見總督身上的新衫，只見到令人擔憂的事實。

事實是：預測的四個百分點增長率，遠遠低於八九年以前，十年來平均有 6.6% 的增長率。

事實是：香港的經濟發展，與亞洲其他三小龍比較，通貨膨脹率是最高的，但經濟增長卻是最低。

事實是：通貨膨脹不但影響了市民的生活質素，更削弱了香港在商業貿易、及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能力和吸引力。

事實是：如果現在都不能控制通脹，請問到明年機場工程一開始，香港怎會不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將亞洲變成拉丁美洲呢？

政府應該面對事實，採取果斷有效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以一套全面而連貫的經濟政策，來遏抑通脹，同時刺激經濟增長。可惜，我們無法從施政報告見到這種認識和決心。

香港的通脹成因複雜，包括公用事業的利潤管制計劃，不利於引導企業控制成本減低加價幅度，加幅結果往往超越通脹。高地價政策，使樓價和租金狂升，在經營成本不斷上漲

之下，物價又如何減低？間接稅的大幅上升，被動的利率政策，由於經濟轉型，人口老化，和因政治問題而移民所帶來的人力資源短缺，都是原因。

面對着如此複雜的成因，施政報告除了控制公共支出外，只考慮以輸入勞工來解決通貨膨脹，明顯是將問題過份簡化。

更嚴重的是：將通脹責任推在勞工身上。其實，打擊通脹，大集團和政府都應負起責任，怎可以要求小市民單方面付出代價，以遏抑工資上升來對付通脹。

我在此特別指出，工資增長並不見得是通脹的主因。八六至九〇年間，名義上工資開始較通脹率增長略為迅速。但撇除通脹因素，五年內整個製造業的實際工資只增長了九個百分點。其實工資在經營成本的比例，只佔製造業總成本 16%、零售業 22%、金融業 30%，薪金增長率只能有限度影響整體物價水平。

而且，八七至九〇年間，南韓的工資增長比香港上升很多，台灣的工資則和香港增長相似，而兩地的通脹率比香港低。

事實上，過去十年，香港的市場勞動生產力為 5%，遠高於實質工資 1.7% 的平均增長率，單位產品的勞力成本事實是在下降中。我亦想提醒政府，輸入勞工可能暫時減輕人手短缺、遏抑工資，但同時輸入的勞工消費亦會增加香港對貨物及服務的需求，又會帶來勞工不足的情況，因此，對解決通脹作用多大多久是有爭論性的。

我們相信，政府打擊通貨膨脹，實在刻不容緩，政府應該採取一套較全面的政策，包括短期和長期的解決策略。

這些措施包括：

- (一) 繼續限制政府部門的服務費增長。
- (二) 將公用事業的加價幅度，限制在通脹率之下，並且開放公用事業市場，增加競爭，使收費降低及服務改善。
- (三) 相對私營部門，應控制公共支出的增長率。
- (四) 放棄高地價政策，增加土地供應，徵收資產增值稅，從而穩定樓價和租金。
- (五) 至於人力短缺問題，目前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不足五成。政府應該經過提供社區支援服務，立例保障平等就業權，提供訓練措施，充份利用潛在的本地勞動人力。
- (六) 從八七至今，香港已有近 30 萬人口移民，每年都不見了三至四個百分點的專業技術及行政人員。香港政府應該重視政治信心問題對人力資源的壓力，與其只講輸入勞工，為何不加強港人治港的條件，從而減少人才外流，增加回流？

在此同時，過去多年，個人入息免稅額一直都未曾跟隨通脹率調整。因此每年都有更多低收入人士因通脹而跌入稅網。今年就有 20 萬人受影響。我們認為政府是應該每年都按照通脹率調整免稅額，減少通脹對市民的損害。

至於經濟增長問題，除了設立工業技術發展局之外，政府仍然是「三記板斧」。不離輸入勞工，似乎輸入勞工是百病可除的仙丹靈藥。香港面對着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包括關貿多邊協定的續約問題，反傾銷稅問題，各大洲的貿易堡壘等，香港的出口已面對許多困難，但施政報告竟然隻字不提，實在令人詫異。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加強在國際間的游說工作，減少保護主義對香港的衝擊。

我們亦應注意到共產政權的崩潰，蘇聯和東歐已經出現重要的新市場。南美國家的經濟改善也給我們提供新的機會，這些國際大氣候的改變，都可為香港帶來新的財富。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全力協助開拓這些市場。

同時，香港和中國南方經濟合作日益緊密，政府是應該研究香港在今後華南經濟中要扮演甚麼戰略的角色，從而加強中港的科研聯繫，生產分工，資金往來等的經濟合作。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加強香港生產力，培訓人力。鼓勵研究發展，增加產品多元化。

對於設立工業技術發展局，我們是原則上支持及贊同的。但是資助個別公司的科研及產品發展計劃，會否演變成對這些公司派發免費午餐？其他國家前車可鑑，必需密切關注。

最後，我要指出，任何刺激經濟成長的規劃和遏抑通貨膨脹的政策，都難以馬上收效。因此政府必須高瞻遠矚，及早擬定穩定持久的政策。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可以因為通脹略為改善，就掉以輕心。若果三年前政府能夠正視通脹的嚴重性，對正在萌芽的問題，採取一套果斷的措施來解決，自然是「病向淺中醫」，不會演變成今天的局面。

香港面對的問題其實很多，諸如人口老化，至今政府仍未有意訂定一套完善的退休計劃，將來自然會加重市民的負擔；越遲應付，問題也將越難解決，付出代價亦更為高昂。而欠缺完善的房屋政策，更令市民難以安居，亦是醞釀市民對社會不滿的源頭。

至於醫療資源多年不足，亦是對市民的健康和經濟構成威脅。

有些人批評說我們民主派增加福利開支，大派免費午餐。我想指出如果工資下降，儲蓄力削弱，自然有更多人會需要和依賴公共福利。減少公共福利的支出，最好的方法就是真正讓小市民富起來。我忠告政府不要為一時之便，以打擊通脹為名，劫貧濟富，而為未來留下沉重的包袱。

以上種種問題，本人在此強調，並非在算政府的舊帳，而是懇切盼望政府能夠在制訂政策的同時，以長久的社會發展為前提，作出更全面，更深遠的考慮。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並對施政報告中種種不足深表遺憾。

葉錫安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當我站起來發表我在本局的第一篇演辭時，我心裏抱着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在我當立法局議員的任內，香港將會踏上體現自主和「港人治港」此項構思的道路。要達致這個目標，中國和香港實有必要建立互相諒解、信任和尊重的關係。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此種關係必須建基於雙方務須嚴格遵守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條文和精神之上。此外，我還要強調「互相」一詞，因為這必須是一條雙向的道路。中國應該準備容納港人的意見，即使此等意見與其看法有很大的出入，亦不應視之為一種對抗。我打算坦誠地以友善和合作的精神吐出我的心聲，而且希望有關方面亦能夠以同樣的精神接受我的說話。

設立終審法院以取代英國樞密院對香港來說是重大的一步，但總督於本局發表施政報告時，卻顯然未有提及英國與中國就此方面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達成的協議，實在使我感到詫異。

中英聯合聲明就日後維持香港的信心及保障香港繼續繁榮穩定方面，訂定了多項措施。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規定除了以終審法院取代英國樞密院外，香港的司法制度將會維持不變。

基於主權的移交，香港司法制度與英國樞密院的連繫必須中斷。然而，由於香港會根據「一國兩制」的構想，保留普通法的制度，故此中英聯合聲明作出明智的規定，訂明香港法院可以汲取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所積累的智慧和經驗，以便維繫本地和國際人士對本港的信心。

因此，中英聯合聲明訂定：「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而終審法院卻有權「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此等條文旨在使人對本港各個層面，特別是最高層面的司法制度抱有信心。此等條文保證獲邀請參加審判的海外知名法官的份量，將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補本港司法制度在與英國樞密院割斷連繫後所出現的缺口。

根據政府所提供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的五年期間，由英國樞密院聆訊的香港上訴案件共有 41 宗，其中上訴得值的案件共佔 19 宗。換而言之，香港上訴庭的裁決有 46.34% 被推翻。我引述此等數字並非要貶低本港上訴庭威嚴，而是說明兩層上訴程序的重要性，以及強調樞密院的功用。由此可見，樞密院實應由一個地位與其不相伯仲的法院取代，而不宜由只是換了名稱的現行上訴庭所取代。

此外，賦予終審法院權力，使其認為有需要時，可以邀請海外法官參加審判，可以加強司法獨立，因為此等法官將不會受到任何政治壓力的影響。再者，邀請國際知名法官參加審判的權力是由法院而非行政機關所擁有。

有關的邀請權是一項不受任何條件限制的權力。法院顯然可以自行酌情決定何時邀請海外法官參加審判，以及各宗案件所需此類法官的數目。若在此方面向法院施加限制，便是干預其獨立性及權力。此外，基本法第八十三條確認香港在決定各級法院的組織和職權方面所擁有的明確自主權，亦將會因此而受到削減。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提出的建議，限制了終審法院此方面的權力，使其最多可以邀請一名海外法官。鑑於終審法院至少會繼續運作至二〇四七年為止，因此，很難明白何以有人竟可於現時測定未來 56 年內絕不會有邀請多過一名海外法官的需要。然而，這卻恰好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協議所設想的情況。

邀請海外法官的權力，是基本法第八十二條明確賦予終審法院的一項權力，不能透過政府之間的協議予以修改。基本法只能夠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何況，基本法業已訂明：「……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三部份規定，終審法院所擁有邀請海外法官的權力，屬於該等基本方針政策的一部份，因此，這項權力已獲得最有力的明文保證。

英國就公布中英聯合聲明時所發表的白皮書，曾提出一點頗為正確的見解，表示：「法院是香港法律制度的中心，而香港的法律制度在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上起重大作用。」

任何缺乏健全法律制度的國家均不能長久吸引外國投資者到來投資。中國所以在過去 10 年積極整理國內的法律，正是為了這個原因。倘若我們容許這根維繫社會繁榮的支柱任遭砍削，那麼，我們將會因為自己本身的軟弱而造成一個危險的先例，禍及我們其他受保障的權利。

這並非如一些人所指稱，是純粹由律師界所挑起的法律問題。這是關乎司法質素、司法獨立和自治的問題，而這一切都是自由民主社會所應有的基本條件，也是香港已獲承諾可以擁得的條件。凡屬本港市民都應該關切和維護此等權益。

我深切期望本局在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內務會議席上所發表的意見，能夠打動中英兩國，使他們重新考慮其對終審法院所持的立場。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

不過，倘若問題未能依照上述原則解決，那麼，我認為本局應該考慮本港應否主動成立一個將會最少運作至一九九七年的終審法院。只要英國及香港政府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容許的靈活處事辦法，成立其認為在組織和職權上均屬恰當的終審法院，則作出此等安排不見得會有任何憲制上的障礙。

本局有責任決定應該通過那些最能反映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內容及精神的法律。這是一項我們不能推卸的責任。根據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內務會議所作出的表決來看，我堅信各議員對此項重大問題的立場不會動搖。

總督曾經表示，本局議員必須耐心和謹慎地提出他們的意見，而且應以同樣的耐性和謹慎態度聽取對方的意見。

我深信本局絕大部份議員都會歡迎與中國官員進行此種形式的對話。遺憾的是中國拒絕承認本局，致使此種對話難以實現。

我謹此促請中國承認現時本港社會的民選和委任領袖，以便彼此可以開始建立互諒、互信和互重的關係。這種關係是香港日後成功所賴的一項基要因素。

副主席先生，人權法案雖在今年六月八日才開始生效，但各方面已深深感受到其影響，尤以法律界所負責管理的法律輔導計劃為然。

政府在人權法案通過前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建議應該擴大法律輔導計劃，以符合人權法案有關提供法律代表的規定。

在本年六月八日前，此項計劃只為所有青少年犯罪案件及成人法庭所審訊的九項特定罪行案件當事人提供法律代表。儘管通知時間短促，此項計劃已由本年六月九日開始為裁判司署的全部刑事罪行案件當事人提供當值律師服務。

根據原先估計，擴展此類服務將導致此項計劃所處理的個案數量在第一年內增加300%。然而，隨著當局於本月中旬就此項擴展服務進行宣傳後，上項計劃所處理的個案數目在僅僅四天內已跳升300%，而且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目前參與此項計劃的職員和律師的工作負擔相當沉重，但他們在如此壓力下仍奮勇應付工作。此項擴展服務能夠迅速引起被告人士熱烈反應，可見人權法案確在發揮解決一項實際需要的作用。政府有責任為法律輔導計劃提供足夠的資助，使其能夠應付目前所面對的大量工作，以確保此方面的需要在日後得到真正的解決。

在人權法案提交立法局通過的期間，本局曾考慮成立一個人權事務委員會，但不獲政府贊同。根據其他地區所得的經驗顯示，人權事務委員會對促進人權相當重要。此等委員會的功用包括教育市民、蒐集資料、審查現行及新訂法例、處理有關侵犯人權的投訴及以調停方式解決此等投訴。相比之下，調停方式是較在法院進行訴訟更為便宜、快捷和有效的解決糾紛方法。我促請政府汲取其他地區所累積的經驗，並重新考慮是否值得成立一個人權事務委員會，以便使人權法案能夠獲得徹底執行。

副主席先生，法律援助（修訂）條例已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獲總督同意制定，但至今尚未訂定正式生效日期。該條例旨在使政府於一九九〇年三月所公布的建議得以實施。該項建議擬對法律援助的申請資格限額作出改善，並由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起生效。然而，政府的緊縮開支計劃，加上人權法案的通過，使到原來預定撥予法律援助的款項需要用於履行人權法案內所規定的政府責任，在裁判司署提供法律代表服務。

當局上一次於一九八六年提高法律援助的申請資格限額，作為「施高特報告書」完成前的一項臨時措施。然而，時至今日，單是薪酬的增長已使許多人士失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對大部份市民來說，他們都須依賴法律援助，才可使到求取公道這項權利由理論變成事實。不過，單是根據人權法案規定，為刑事個案的當事人提供法律代表服務，而忽略了其他有資格在民事法院爭取合法權利及賠償的人士在這方面的權利，實不足夠。我促請政府盡快實施該項法律援助（修訂）條例。

法律界長久以來一直倡議成立一個獨立機構管理法律援助事務。正確的做法是法律援助署應該在實質及形象上均脫離政府獨立。為了維持公正，那些要在刑事法院答辯或需向政府討索法律賠償的人士，就不應由政府部門擔任其代表。這實際上是「施高特報告書」的一項建議，該份報告的總結認為法律援助署應該脫離政府部門的總體制。我們現已看到一些政府部門開始脫離政府架構。我相信現已是解決法律援助這項問題的時候。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五時

副主席（譯文）：本局現在小休 15 分鐘。

下午五時二十四分

副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告恢復。

林鉅津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儘管剛用過了茶點，我依然相信到了這個時刻，發言愈簡短的議員愈受歡迎。因此，我已將演辭縮短，就這兩天以來匆匆談及的事項，在兩方面提出新的意見。

憲制發展

總督在為時一小時的發言裏，先後 13 次呼籲本局合作，顯然對日後未必能輕易取得合作感到不安，究其原因，必然因為本局是由民選及委任議員構成的新組合。關於此點，我希望首先談談我對剛結束的直接選舉的一些觀察，然後提出補救建議：

- (1) 在競選期間，市民因為無法分辨候選人之間孰優孰劣，顯得無所適從。若干候選人提出自己及政府均無可能實踐的承諾，舉例而言，有候選人承諾提高利得稅，以用於社會福利，然而此舉卻違反政府機制長期以來對資源分配所採的原則。選民困難於取捨而感到氣餒。
- (2) 投票率只佔登記選民的 39% 及整體人口的 13%。我認為大多數人對選舉及／或候選人都並不熱心。

- (3) 投票率偏低是自願及非隨機性質。從統計學角度看來，確有可能出現選擇上的誤差。那些追求民主的選民，在投票時自然選取較為開明的民主人士。因此，剛結束的直接選舉的結果，只能反映願意投票的是哪類人士，而這類人士的數目着實甚小。
- (4) 在投票後的數日內，有一個團體由極孚眾望一變為大失人心，顯示了公眾在投票期間並無堅定或成熟的看法。

因此，在剛結束的立法局議員直接選舉，存在着不明朗、欠缺成熟、無所適從及偏頗選擇的情況，難怪政府對選舉結果感到不安。

副主席先生，民主是好的制度，但若相信民主是完美無瑕或至高無上的政府制度實屬幼稚的想法。放眼世界，不少民主政體行事不擇手段，造成極大災難。斯里蘭卡的情況就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該國以僧加羅人佔多數的民選政府，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陰謀對付佔少數的泰米爾人，導致連年內戰，至今未有止息。

如果香港希望有良好的民主制度，香港人便需要在政治上充份成熟，在深思熟慮後對候選人作出判斷。在選民未獲提供充份資料的情況下展開民主選舉，此舉實在令人擔心。因此，當局仍需進行大量的公民教育及公共關係工作。但令我感到可惜的是，以我觀察所得，直到今時今日，政府所做的工作只及於進行臨時的游說使其政策獲得通過，有時即使與公眾強烈的反對意見背道而馳亦在所不惜。

因此，我認為本港不單需要擬議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以確保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選舉，也許更需要負責公共關係及公眾教育的委員會，而且須採取密集、持續及專業的方法工作。現時可能是動員區議會及街坊組織的適當時機。此舉旨在使選民的投入熱情趨於成熟，以作出明智判斷。但願到了一九九五年秋季，政府因要面對不合作的立法局而感到的不安會減少。「憧憬未來乃人之常情」。

與中國的關係

香港與中國息息相關，已是不爭的事實。所謂：「一滴蜜糖比一加侖膽汁吸引更多蜜蜂」，合作比對抗得到更好的成果。總督曾呼籲，與中國交往的時候必須耐心和體諒。我對此亦有同感。但我有時難免感到，香港人實在深切體會中國已急不及待要插手本港的事務。我必須提出一些觀感：

近日每項與中國交涉的重大事項上，我察覺中國都進一步爭取對本港事務有更大的控制。我知道中國此舉是貫徹其堅持的中央控制政策。本港的繁榮有賴一項與中央控制相反的事實，即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由於中國對此關鍵要點缺乏具體瞭解，所以可能在無意之間對本港造成損害。如果中國希望在一九九七年取得一個繁榮的香港，便需要維持本港的放任制度。

我明白現在談及的是試圖改變一個十分自傲及敏感的世界大國的處事方式。我抱歉指出，直至現時為止，英國、香港和中國之間的來往，徒令本港政府受到愈來愈強大的掣肘，而並未出現任何可見的跡象顯示中國瞭解本港得以維持繁榮或安定的方法。剛在上個星期，中國的領導層曾強調司法屬主權問題。本局的一位同僚指出，本港沒有司法獨立，便不是值得留戀的地方。香港人堅持「兩制」，中國卻着手建立「一國」。副主席先生，中央規劃將扼殺本港的活力。本港極需協助中國的決策人從本港的角度看待本港事務。中國的領導人須與香港人一起經歷本港及國際上發生的所有事件。他們需要像我們一樣，直接及親身去感受大眾的喜怒哀樂。為達致此目的，政府應設法安排中國的領導人在港居住若干日子。此舉至少對港澳辦公室的高層人員有所幫助。這個方法的成功，已有先例可援。本港不是曾有一位名符其實的前任駐港中國領事，以香港的方式對本港的事件作出反應嗎？

副主席先生，換句話說，政府應盡力讓香港人的管治者從國內來港居住，使他們既可透過中央管制者的眼睛看待中國，亦須透過另一隻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眼睛看待香港。簡單地說，為達致「一國兩制」的目的，本港需要「一個領導，兩隻眼睛」。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鉅成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作為香港民主同盟醫療衛生界的發言人，我會首先在這方面發言。

一個良好的醫療衛生服務應該包括下列各點：

- (1) 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這服務，而服務的成本應由社會平均地分擔；
- (2) 服務質素達到現代的標準，並能隨着科技進步而不斷改善；
- (3) 有效率的運用資源；
- (4) 控制醫療衛生服務的支出在一個社會能夠負擔的水平內；及
- (5) 病者可以自由選擇醫生或醫療服務。

港同盟十分關注香港市民的健康，因此歡迎政府任何改善醫療衛生服務的措施，但是現時的服務，較我們所期望仍有一段距離。

在資源方面，政府的醫療衛生開支應予提高，政府醫療衛生服務開支和本港生產總值的比例：九〇至九一年是 1.8%、九一至九二年是 2.0%、九二至九三年是 2.1%、九三至九四年是 2.1%。這些數字較八年前的一些發展國家還差很多，例如澳洲的 4.9%、加拿大的 6.2%、日本的 5.0%、英國的 5.5%、美國的 4.5%。香

港醫療衛生服務上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如醫院病床不足、人手短缺、病者需要輪候一段長時期才能獲得治療、缺乏先進的醫療科技和設備、不足夠的在職進修等等，都是資源不足而引致的。香港的醫療衛生政策是典型的殖民地政府政策，以最少的支出，提供最基本的服務。政府屢次保證不會因有人窮而不能醫病，但請政府明確地回答怎樣叫做窮？一些收入稍稍高過貧窮線的人又會否得到幫助呢？所謂「病向淺中醫」，不論從醫生或病者的角度，病人最需要的是「及時的治療」。現實的情形是，窮人患上癌症，也要耐心輪候，忍受一段長時間的精神折磨和肉體痛苦，才能進入公立醫院治療。難怪有些病人說：「有錢就有命、有錢就認命。」

對醫院管理局成員及職員所作的努力，本人極為欽佩，並極力支持。至於設立醫院管理局是否改善現在香港醫院服務的最佳方法，則要拭目以待。現時只有四成多的政府醫院員工轉職醫院管理局。但另一方面，一些補助醫院員工轉職醫管局又被拒絕，對被摒諸門外的員工是一種歧視，也增加日後管理和行政上的複雜性。六年前我在本局發言時曾呼籲政府不要歧視規模較小的補助醫院。六年後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情況並沒有改善。這群被歧視者包括牙科醫生、健康教育專業人士、善終服務職員，都是一所完善醫院應有的專業人士。醫管局應擺脫官僚主義的作風，彈性處理一些特別個案，及早改善舊制度下不合理的政策。

最近，我接到一些醫生的投訴，包括瑪嘉烈醫院老人科 20 多名醫生的簽名信，指出一些對他們不公平之處。一位醫院管理局的委員，同時也是我們立法局同事在一個研討會上，聲稱公立醫院病人不明白，也不關心他們每人每日都用去納稅人 1,000 多元，我不同意他的講法，如果病人有錢的話，我相信公共醫院病人都會很快入住私家醫院。一位同事又說醫院職員並不了解每增加一張病床，每年便要多用近 50 萬元。他更說：「生命只是一種十分昂貴的商品……；醫學與其他科學、藝術、或商業並無分別……；醫學專業人士無須交代而隨意使用資源的時代已過去，專業人士不再應該單靠救活病人作為支持論據，財政科是值得讚許，因為該科知道要用錢然後才能節省金錢」。作為醫管局的成員，這位先生的言論令人十分失望，亦充分表現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缺點。

每人對生命和金錢都有不同的價值觀，我絕對反對把生命當作商品。倘若這位醫管局委員的論點是正確的話，行將在本局通過的禁止買賣人體器官法例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如果只靠效率是絕不能改善醫院的低服務質素。改善效率並非一定需要醫管局，過往兩年內伊利沙伯醫院的臨時病床已減少了六成，急症室的輪候時間也已大大減少。

成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和推行基層健康護理都要資源，基層健康護理每年需用超過 1 億 8,600 萬元，增加職員 550 人。因此，我請求有關的政府官員告訴我們，在財政上、人力上和時間上，如何落實這些計劃？醫療服務是一項公共服務，是市民的基本權利，總督在施政報告第 64 段澄清政府並沒有把提高社會服務質素和增加服務種類的工作，視作奢侈品。因此，港同盟反對政府以「用者付款」或「收回成本」方式作為公共醫療服務收費的準則。醫療服務的成本高，加上本港缺乏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基層人士入息普遍偏低，以黃大仙區為例，根據九〇年的政府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受薪市民，月入是低於 7,000 元，超過一半的市民月薪是低過 5,000 元。低收入加上高通脹，市民又怎能應付日益高漲的醫療收費？醫管局宣稱在醫療服務質素未有顯著改善之前，不

會加價，港同盟並不同意這原則，因為改善醫療服務是每個有責任心的政府應做的工作，而不應用作加價的條件。政府應盡量維持現行的低收費，或只可酌量增加收費，但需要以不影響市民生活質素為原則。有關推行醫療保險，必須審慎從事，盡量減少第三者的剝削，使市民得到合理的照顧。現行的學童保健服務的存在價值，引來不少爭議，學童保健服務質素未能達到理想水平，政府有一定的責任，因為學童保健諮詢委員會過往兩年作出的一些收費建議，未為政府接納。

我建議政府應加強老人醫療服務，以應付本港日益老化的人口，並且制定一套完整的醫療衛生政策，保障市民健康。

總督在施政報告內打起「保赤安貧」的旗號。我還以為他是我的助選團成員！因為我競選的口號是「捍衛基層人士權益」而更加積極保赤安貧。可惜，整份報告內並無反映出「保赤安貧」的具體行動。相反，推行房屋政策上的雙倍租金，出售公屋，將公屋售價與私人樓宇售價掛鉤，實行高地價政策，放縱「樓花」炒賣、容忍高通脹、反對設立中央公積金以及擴大輸入外地勞工。政府一方面說不會將社會服務視作奢侈品，但另一方面，在基本社會服務，例如房屋及醫療等，卻走向「用者付款」的方向，這都是違反基層人士的利益。

從行政局成員的組合來看，只有一個以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的代表。行政局是釐訂政策的主要機構，其組合應包括更多來自各界的民意代表，使政策能照顧到各階層的市民。我歡迎副主席先生退出行政局來主持本局的會議。這樣做，正如施政報告所說是要突出立法局明確而獨立的角色。行政局在釐訂政策的過程中，可能會出錯。一個獨立運作的立法局，可以避免在行政立法角色上的混淆，是會為市民提供更佳的保障。港同盟在爭取民主，改善民生的過程中，希望能廢除過時及不公平的政策。做成抗拒的不是港同盟，而是一些為了保存「既得利益」而不願改進的人，港同盟爭取的不是「免費午餐」，而是廣大市民應有的權益。我們重視工商各界人士對香港的貢獻，亦尊重他們的權益。我們港同盟爭取的，是各階層人士都能共同分享大家都有份創造的香港繁榮成果。

在中港關係上，總督向我們說，要耐心和謹慎。有人說「耐心」是當自身處於劣勢時候，無可奈何的等待心態，只要能忍受周圍所發生的不公平事物，例如侵犯人權，缺乏民主，妨礙司法等等而無動於中，就會變成一個耐心的成功人士。「耐心」本是一種美德，但當耐心是違背良心時，就極之不值得恭維了。為加強港人的信心和解除港人憂心會被暗中出賣的疑慮，政府可否提高中英聯絡小組的透明度呢？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同情及支持這動議。

劉千石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綜觀今年總督發表的施政報告，仍以強調經濟發展作為中心思想和施政目標。如果經濟發展的成功，可以令全港市民共享繁榮的成果，則無疑是值得大力推許的。正如總督在施政報告第 62 段提到：「我們致力追求經濟增長，目的並非為了改善經濟，

而是要利用所增加的財富改善全港家庭的生活水平，並為全體市民創造美好和安穩的生活方式」。

但我以為，最能量度經濟發展對大眾有益抑或有損，最清楚的指標是觀察市民的生活實況。至於總督單方面承諾會同時兼顧經濟增長及改善民生，則老實說，這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謊言。以下，我會就勞工及民生問題向政府陳述一些事實和意見，希望總督不要再次誤導市民及迴避問題。

一、輸入外地勞工及工人福利保障問題

我記得在尤德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他建議考慮研究設立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利弊，希望能為工人尋求退休保障。而八八年總督衛奕信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到不會輸入外地勞工，使工人在經濟好景時能夠分享繁榮的成果。但很可惜，總督在以後幾年卻一而再地數度放寬輸入外地勞工，及否決設立中央公積金計劃。令人更難以接受的，是總督今年將通脹問題的矛頭指向勞工短缺，繼而為大量輸入外地勞工找借口。這種做法對香港的打工仔極不公平，因為輸入外地勞工會令工人的議價能力下降，影響就業和工資，同時他們直接要承受通脹的壓力，在此雙重打擊之下，生活的質素何來改善？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施政報告向工人開刀已非首次。去年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呼籲遏抑工資，令香港工人在九一年的實質工資下降了 1.2%，但通脹卻上升至 13.9%，是十年來的最高峰。由此可以證明工人工資並非引起通脹的因素。而今年總督更變本加厲，借口通脹來輸入外地勞工，豈不是再重覆去年的錯誤，而根本沒有去找出通脹的真正元兇？

再者，輸入外地勞工只會影響香港的長遠經濟利益，因為這政策將會使香港更難走回自動化及高科技的道路。其實，香港目前並不是出現勞工短缺，而只是出現「就業流動淤塞現象」，亦即經濟轉型下製造業勞工不能有效地轉向服務性行業。我們缺乏一套健全的人力培訓計劃，使到本地勞工可以接受轉業培訓後再貢獻社會。當然目前是有製造業勞工轉往服務性行業，但只是使本來的技術勞工被迫轉做非技術工作，喪失了作為技術工人的地位及待遇。

另外，外地勞工被剝削的問題亦不容忽視。勞工處披露的 290 多宗有關僱主違例的事件，我相信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外地勞工為了飯碗，根本不敢出來作證。所以輸入外地勞工只是方便僱主可以剝削更多廉價工人，根本就絕不是為了解決所謂的勞工短缺問題。

很明顯地，輸入外工無論對本地工人或外地工人都是有害而無利，而總督抱著補償的心理，提到會有六項關於勞工福利及保障的改善，以為會令本地工人受惠。但其實，這些只是很輕微的技術性修訂，根本沒有任何結構性改變。何況這些修訂都是提出已久，一拖再拖的建議。對於與工人權益及福利有關的法例保障，則長期以來都停滯不前，至今仍缺乏獨立和清晰的整體勞工政策。就以退休保障為例，亞洲其他地區已採納強制式公積金計劃，但港府卻以長期服務金和老人服務來推卸責任，令到想繼續以香港為家的人變得毫無盼望，只怕老年時要「望天打卦」。

二、通脹及新機場對民生的影響

對於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沒有找出通脹的真正成因，反而對勞工階層落井下石，我感到非常遺憾。

其實，眾所週知，目前引起通脹的部份原因，是與港府的加稅加費政策，公共事業的加價，地產商多頭壟斷地產市道使到市民捱貴租及炒樓風熾熱，公屋富戶政策，居屋售價與私人樓宇掛鈎，以及各公營部門的服務邁向私營化，導致利潤要轉嫁在市民身上等有關，令中、下階層市民直接受到通脹的影響，使生活的壓力越來越沉重。

如果我們能正視市民的生活實況，將會發現越來越多市民抱怨生活艱難，而總督所想達致的經濟成果只是有少數的大財團及富裕階層最後得益。

面對即將要展開工程的新機場及基建計劃，我奇怪在過去幾年來，港府不斷向市民推銷，但如今要落實進行時，卻又刻意迴避。無庸置疑地，規模如此龐大的基建計劃，既會影響本港的經濟發展，又會加劇已相當嚴重的通脹問題，即使總督主觀地希望在推行這些計劃時，不會對市民的生活做成影響，但是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卻找不到任何論據足以證明總督是以市民生活質素的提高為大前提，更找不到任何建議和策略減少機場對民生的影響。

正好相反，為了要支持大型的基建計劃，港府將會採取措施緊縮各部門的財政開支，於是對社會福利的承擔將會逐步減少。換言之，又要先犧牲市民的利益，但到底要市民付出多少代價，施政報告又沒有清楚的交代，只是輕描淡寫地叫市民接受五、六十年代「保赤安貧」的福利政策。

這種倒退的觀念，只是港府一廂情願地以為香港人今日仍然需要施捨和接濟，而無視香港社會的進步，港人對應享有的社會權益和福利是有了新的需求。綜觀整份施政報告，根本沒有就影響民生的問題及福利政策作任何承擔，更遑論制訂長期的計劃和政策時，總督會以確保市民的生活將會得到改善放在首要的位置。

由於在上述勞工和民生兩大問題上，施政報告未能給我們提出可以接受的政策路向，所以，我想清楚地再提幾點建議，希望總督能詳加考慮：

一、勞工保障方面

1. 制定全面的人力資源政策，改善職業培訓制度配合香港經濟模式的轉變，協助製造業工人提高技術水平或轉往服務性行業。
2. 停止輸入外地勞工，先改善本地工人的就業及工資問題，並應立例確認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使勞方藉認可的工會，向資方爭取薪酬、待遇等權益和福利，以改善生活質素。

3. 將教育及人力統籌科分拆為兩科，人力司應改稱勞工司，專注制定長遠的勞工政策，以改善勞工保障為大前提，避免以財政撥款或權力不足為理由，拖延政策的執行及法例的修改。

4. 設立中央公積金，解決工人退休問題。

5. 應全面檢討現時的工業安全政策，包括檢討現有法例，加強檢控及增加罰款。而施政報告所提到有關工人健康與安全的保障，對改善職業意外並無實效，若要起真正阻嚇作用，應增加勞工處督察人員巡查的次數，及加強工業安全的宣傳。

二、遏止通脹、保障民生方面

1. 在制定財政預算案時，不能再向小市民開刀，避免增加直接影響民生的間接稅，及提高個人免稅額，以彌補通脹令實質工資減少的損失。

2. 限制影響低下層市民的各項政府服務加費，及限制公共事業的加價，直至利潤管制計劃期滿後再檢討加幅。其實，通脹或多或少是由於政府以及交通、能源等公共事業接連加價所導致。這種轉嫁式由市民絕對保證公共事業有高利潤收益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受利潤管制計劃監管的公共事業應該在這方面加以檢討，而地鐵及火車的收費調整，亦應該要有明確的監管制度去審批其加價的申請。

3. 尋求有效方法遏止樓價不斷上升，打破地產商的多頭壟斷及炒風熱熾的局面。政府應主動推出更多居屋，遏抑樓價，使真正用戶得益，而居屋售價應與成本掛鈎而非根據市場來調整價格。同時，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亦應有所提高，使中、下階層市民能夠安居樂業。

4. 詳細研究新機場及基建計劃對民生的影響，並以報告書的形式向市民公開交代有關的融資計劃，及將來可能要面對的各項影響，包括公布政府部門在考慮財政撥款時優先次序的原則，並徵詢市民意見。

最後，我想忠告政府，今日的港府正面臨信心危機，並受到很大的挑戰。這個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管治，只不過與鄰近地區情況更糟糕的政權相比，還未算是最壞的。所以香港市民只是抱著認命的心態，去接受準備撤退的跛腳鴨政府。我不希望今日香港政府之所以能如常運作，而不受衝擊，是因為我們別無選擇。畢竟，港府將來在推行政策時，仍需讓市民能夠盼望前景美好，生活有實質的改善，而並非怨聲載道，直至九七政權的轉移。

目前，我們的責任正是為建設美好的將來尋求可行辦法。我作為民選議員進入立法局，很清楚自己是民意的代表，要履行對選民的承諾，保障市民生活安穩及為他們提供有遠景的未來。所以我除了要將民意向立法局反映外，亦有責任監督政府的運作，確保在政策制定時，能照顧普羅大眾的利益，而不是偏袒某些既得利益的階層。

同時，我亦想藉此機會呼籲各位市民，請你們不要以為投票選出來的議員必然能為你們爭取到所有的權益，投票只是明確地表示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由於我們的政府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民選議員的工作其實是有很多的局限。現在，我們必須團結議會內外的所有進步力量，繼續努力不懈地抗爭，只有這樣，香港才能更有希望，而市民的權益才會得到真正保障。

我謹此陳辭，並對施政報告深表憤慨！

劉慧卿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我今天的發言，由於時間有限，所以只講述有關憲制發展的部份。因為我覺得憲制的發展對香港將來是很重要的。我會講及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方面所見到的問題。

其實，我過往五年都有留意總督的施政報告，而在這五年，我非常失望，因為我覺得英國從沒有向港人交代九七年的政府會是怎樣產生的？立法機關又會如何產生？這數年來，總督衛奕信亦沒有就上述事項向我們提出一個藍圖，因而給我一個感覺，就是港英政府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而許多香港人亦沒有面對這個問題。有些新聞界朋友或某些專業人士這樣形容我：副主席先生，我相信你也聽過「皇帝的新衣」這故事，他們說我就是故事中的小孩。許多人見到許多事情，心中了然，但不會說出來。由於香港許多人不想興波作浪，或希望保持安定繁榮，所以對許多事情都不願說出來，但我這個小孩子見到卻會「嘩」然一聲：「為什麼皇帝真的沒衣服穿？」當我說這話時，在許多市民心中，是會產生共鳴的。所以，我現在是以一位民選議員的身份發言，希望在未來四年間，仍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甚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當然我不是像剛才有些同事說要搞對抗，我希望最終做的事是為香港好。我本身已說過許多次，對於香港 500 餘萬市民無自決權，感到非常遺憾。所以，今次趁立法局首次有民選議員這機會，希望將說話記錄在案，讓日後各方面人士都知道，有人對中英政府不給予港人有自己決定前途的權利，感到非常遺憾。

現在我要談及我察覺行政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目前有許多傳聞，說總督再做一會就不幹了，如果這位總督不幹，英國政府會委任第二位總督。許多香港人對這點不會很擔憂，因為有跡可尋，港英政府統治香港這麼久，無論好、醜都已表露了，各方面已抱有信心；但對九七年行政長官的產生，由何人出任，則沒人知道。目前，或許有人正在進行游說工作，希望能任該職，因而前往北京到處「拉線」，但到底會是由何人出任？我們不知道。基本法內載明第一屆政府及行政首長的產生方法：一九九六年人大將會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而該會亦會成立一個由 400 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由工商業、專業、勞工及政界人士所組成。這類委員會，我們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已見過，該會將以協商或協商後提名推舉第一任行政長官，再呈報中央政府任命，九六年中國政府便會進行這事。問題是英國人只告訴我們這是中國的事，他們不加理會的。我當然不相信，因為要平穩過渡，中英政府一定會合作。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定必談及這事。問題是香港人是否有機會參與？

日後是否真的有個高度自治的政府？希望政府在答覆我們時（雖然是九一年度會期開始，但時間上已很遲）告訴我們在這方面有什麼部署和如何進行。同樣重要的，就是有關主要的官員（各位司級官員都坐在這裡），將來那幾位會作為我們的司級官員？根據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將來的司級官員是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政府任命。誰會出任呢？是否仍由這些人出任？當然不是，因為基本法說明，司級官員必須沒有外國居留權，且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亦即是中國的公民。坦白說，如果委任你們，提名你們，你們又是否願意接受？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否會多做兩年，在取得退休金後便離去？我們對很多事情仍不知，也不知有多少名司級官員自己是知道的，但我們卻很困擾及擔憂。

至於立法方面，我們是立法局議員，當然很注視。有關產生方法有幾位同事均已提過，不知道九五年會是怎樣，更遑論九七年！我們不知道英國政府是否會向中國政府爭取多些直選議席？基本法說只得 20 席，英國人給我們一個幻想，說希望多過 20 席。本人自始至終都贊成百分之百由直選產生，我相信香港市民是可做到的，因為他們政治意識是非常成熟。我真覺得遺憾的，是剛才有同事說有些市民仍未達到可接受百分之百的西方式民主階段。此外，還加上功能團體的九席，這又代表什麼？這個選舉委員會更令人非常疑惑，雖然基本法提到有個有 800 人的行政首長選舉委員會，是否該委員會又參選立法局的 10 席？如果是的話，九五年便要進行。為何政府現在仍遲遲未有交代？這個委員會又會否是委任制度的變相？這些都令人疑惑，是我們想立刻知道的。同時，有關立法權，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都說明，香港的立法機關是有立法權。但假如看看基本法第十七條所載，立法要在中央備案，如果備案時發覺與基本法不符合的話，則可將有關法律發回，發回時便立即失效。這樣對我們的立法權有多大的損害呢？而且，大家知道在基本法內有六條中國的法律是適用於香港。另外，基本法第十八條亦提到，將來香港如發生政府不能控制的動亂時，全國性的法律亦會實施於香港，那麼，我們究竟是否有立法權？英國人可以跟我們說「這些已在基本法訂下來了」。但英國人對香港由一九九七年起計的 50 年，是否完全沒有責任，而只用一句說話就將責任完全交給了基本法？那樣如何進行平穩的過渡？這些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另外，司法方面，我非常同意剛才和昨天有些同事提到，我們不滿意終審庭的組成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秘密決定的各種論調。相信大家記得，要提到在終審庭內聘請一些外國法官，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香港的法官數量不足，尤其希望終審庭可以有像樞密院一般的地位；另一個原因，是希望有些終審庭法官不會受政治壓力，這是個政治現實，但不是很多人想說，所以由我這個小孩子來說。我同意葉錫安議員剛才提到，如果真的不可以成立一個正式的中英聯合聲明所應允的終審庭，我寧願在最後這幾年間另成立一個正式的，然後到九七年時才看怎樣辦。如果成立一個非驢非馬的終審庭，倒不如不成立。副主席先生，與司法有關，甚至比終審庭更重要的，就是解釋權的問題。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都說，香港的終審權是在香港的終審庭，但亦說這個小憲法的解釋權是在人大常委，倘有什麼案件涉及中央或中央與香港有關的時候，法庭暫不能作裁判，須待人大常委解釋後，才按該解釋去辦。如果這樣，終審庭的終審權和司法獨立又何在呢？我不是司法界或法律界人士，副主席先生，但我相信你比更多人知道，許多司法界和法律界朋友對這前途很擔心。他們覺得現時的司法制度，將來可能蕩然無存。在這兩天內，許多同事都稱目前的政府為「夕陽政府」，對許多事都沒有很大期望，有些更覺「不說也罷」。我沒有這種心態，「夕陽政府」也好，什麼政府也好，我覺得這政府既然管理了香港 150 年，還有

數年便要撤退，就一定有責任向香港市民交代，將未來整個憲制的架構情況和如何演變至可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等告訴港人，並告知我們將來是要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只有在一個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制度下，才可令現時所享有的自由生活方式得以保持不變。

最後，我希望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商討事項前，應先行諮詢本局，我們未必要求其在外交上透露一些在協議內不想或不該透露的事，但商討之前，希望諮詢一下立法局議員對將要商討事項的意見，商討完畢後，亦不單是發表一個簡短通告便算，應請他們解釋作了甚麼決定，因為他們的決定不是英國人的將來，亦不是中國的將來，是500餘萬香港人的將來，我們是絕對有權知道的。最後我希望政府在短短的未來五年內，盡力履行一九八四年給我們的諾言 — 建立一個權力植根於香港，向香港人負責的政府。我亦希望是個可以保障我們自由的政府。

李家祥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政治既屬一門科學，亦是一門藝術；在管理公共財政與推行公共服務方面，政府宜根據專業方法及理性行事；至於在治理人民方面，政治則屬一門如何愛民的藝術。

互相合作的夥伴關係

關注人民的政府，會促進社會的穩定，立法局是一個議政的場所，在政府的管治過程中，得以發揮作用，大大提高關注的程度。

政府當局因應急劇轉變的需求，迅速採取所需行動，並致力爭取更高的辦事效率，誠屬目標正確。然而，立法局議員或會認為須對政府的施政發揮制衡作用，並請有關官員闡釋每一項措施。為了達致良好的均衡，雙方必須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建立互相合作的夥伴關係。本局議員切不可鼓勵對政府的施政採取不信任態度，若對政府行使權力加以無理的限制，則會降低效率、耗費更多公帑及擾亂既定的施政先後次序。我相信香港市民只是期望立法局議員發揮監察作用，而非扮演偵查員的角色。在邁向一九九七年間，我們唯有證明具備良好的質素，例如辦事主動進取、有方向原則，以負責任的態度發揮領導才能，立法局才能贏取公眾人士的敬重和信心，單靠針砭政府當局，並不能達致這個目標。另一方面，政府當局亦需切實執行反映立法局議員整體意願的法律及政策。

香港的經濟

香港是一個成功的經濟體系，政府毋須大費周章，以確保經濟欣欣向榮。其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公平競爭，以及實行法治的明確因素，在在符合投資者所需。事實上，總督對本港的中期經濟展望頗為樂觀，實屬正確的看法，此情況與過去兩年的悲觀展望成為強烈的對比。因此，我期望下一份財政預算案對財政收益的中期預測作有利的修訂。

香港人生財有道，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現在我們必須學習同樣優於管理自己所創造的龐大財富。在後一類財富管理方面，不是單憑努力和穩健的經濟原則便能成功，在長遠目標與照顧社會當前需要之間維持適當的均衡，乃是成功之鑰。

政府財政的管理

不論以任何入息標準來衡量，香港人均屬生活充裕。再者，在本港的就業人口中，有近 70% 只需繳納少量稅款，甚或毋須繳稅；反觀政府用以資助社會服務的開支，卻佔其經常開支逾 40%。大體而言，以此地區的尺度來看，本港低收入人士已獲極佳照顧。自八十年代經歷一段經濟飛躍期後，市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是有目共睹。在一九九〇年，自置居所的香港家庭，佔家庭總數的 42%，而在一九八一年，則只佔 28%。根據最近進行的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住戶開支統計，消費模式有明顯改變，市民在飲食、使用國際直通電話、購買電視機及照相機等消費性電子及光學產品方面的開支有所增加。

鑑於這些情況，實有充份理由改而賦予長遠投資更優先的次序，以維繫未來經濟增長。此外，要求有能力者在政府給予重大資助的服務上負擔較多費用，亦屬合理。不過，要履行這些目標，需要小心計劃及協調。在有限的時間內，本人只是擬就主要的社會服務收費政策表達意見，這些服務包括房屋、醫療、福利及教育。

收費政策的協調

本港的社會服務主要由政府及資助機構提供。因此，政府有責任釐定服務的收費及質素。由於這些是必須的服務，而私營機構亦未有提供同類服務，可資消費者比較其收費，絕大部份的低收入人士「被迫」使用這些標準的公眾服務。在實質壟斷的情況下，政府有責任去清楚釐訂收費政策。

總督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更多的選擇和較高的收入，意味着香港家庭在享用高於基本水平的服務時，須逐漸負擔更多費用。」其後，決策科司級官員在其他公開聲明（例如社會福利白皮書）亦重申這個原則。庫務司最近在向立法局議員作簡報時表示，他已要求所有決策科司級官員檢討收費，以減低服務成本。本人雖然同意所提的目標，但在落實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時，未經協調和沒有明確的工作目標，實在值得關注。一個很明顯的危險，就是每位決策科首長可能各自盡量提高收費，以減低有關服務的成本。而不理會其他決策科所採取的措施。若沒有適當的協調，政府可能很易忽略種種加費對於無力自保的家庭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作一個比較穩妥的假設，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普通的家庭在同一段期間內需要不同種類的社會服務。如能選擇，一個家庭可以作出合理的預算。典型的例子是賺取一般收入的家庭用家庭收入的 35% 繳付所置樓宇的按揭費，10% 用於全面醫療保險，10% 用在教育及福利服務，如支付多項學費及幼兒服務費等。上述開支佔家庭總收入的 55%，剩下的 45%，可用以應付食物、衣服、交通、電力及燃料等開支。這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假如能鑑定目標收入組別，在合理的基礎下，可以根據假設，測試家庭的應付開支能力。

本人促請中央政府小心制訂一致的收費政策（例如可委派中央政策研究組進行）。這項政策應向大眾公布，並應至少包括以下各方面：

- (1) 可否明確鑑定使用各類有關收費服務的目標組別；
- (2) 可否因應目標家庭目前的消費模式，按個別政策範疇釐定整體的收費上限，從而限制各類收費對該等家庭的生活水平引起的整體衝擊；

社會福利

儘管本港需有一個收費合理的補助社會服務網，以照顧低收入階層，目前接受社會保障的最低收入階層，約佔本港人口的 9%，他們大部份是無助的老人或極需金錢援助的人士。因此，社會人士應接受良心的驅使，進一步施以援手，使他們可優先分享社會的資源。

政府在社會福利白皮書已作出肯定的承擔，為這群低收入人士的基本需要提供必須的經常開支。然而，它卻任由獎券基金嚴重缺乏資金，而此一基金需撥款供同樣有需要的非經常開支之用。結果，為安置和照顧這些極需援手人士而提供的基本設施受到很大的延誤。

售賣獎券是慈善籌款，又是政府的收入來源。購買獎券既可行善，因而令人樂於光顧。不過，在獎券基金充份滿足慈善需要之前，關心市民的政府不宜與窮極而有需要的人爭奪這些資源分配。本人建議應調高自出售獎券所得總收入撥作獎券基金的百分比，由目前的 3.5% 增至 6.5%。這樣將有足夠的資金去提供即時所需。

傷殘人士

傷殘人士或許不是最貧困的一群，但基於另一項理由，卻亟需別人援助。他們應該與其他人一樣，在社會享有基本人權，有同等機會全面參與和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對於總督在施政報告以頗大篇幅向傷殘人士作出這項保證，以及即將公布的康復綠皮書對此會有詳細闡述，我深感欣興。

國際康復組織公佈的八十年代憲章，標誌著聯合國國際傷殘人士十年計劃的特徵。為了使此條已屆期滿憲章的精神得以在九十年代延續下去，本人建議政府設立自願式匯報制度，向市民報告有關計劃在預防殘疾、促進傷殘康復活動及創造條件使傷殘人士有全面及均等機會參與社會等方面的進展。

雖然傷殘人士是人數較少的重要組別，但他們不大可能在地區性選舉中取得傑出的成果。所以，我建議當局考慮在一九九五年，將傷殘人士列入功能組別，給予一個席位，使他們可選舉其代表進入立法局。

青年

另一個重要而值得特別關注的組別是青年。總督在施政報告中，並沒有提及青年事務，本人希望這並不表示政府滿足於目前的情況。

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人將於明年初在本局動議辯論「青年約章」。青年約章乃總督在八九年施政報告要求制訂。謹此希望，正在草擬的約章基本上可揉合一般社會人士與青年的權利、需要、抱負及期望，達致提供一套青年發展準則的目標。我盼望青年約章的頒佈，加上本局的動議辯論，會加強大眾認識青年人的重要性。此外，為配合制訂青年約章的工作，現在也許已是適當時機，提醒本港的青年，他們有何公民權利和責任，而最佳的辦法，莫過於首先將投票年齡降至 18 歲。青年是否有信心參與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視乎我們是否對他們表示信任，如果我們希望加強青年人參與社會事務，就不應拒絕給予他們這種重要權利，為促成這個目的，本人稍後將另行向憲制事務司提交意見。

教育與就業

教育是另外一個甚受年青人關注的問題。無論這看法是對是錯，香港大多數人相信，要找到一份優薪工作，生活過得美滿，必須先接受專上教育；因此，年青人都極之渴望繼續升學。政府計劃大大擴充專上教育，對於滿足這方面的需求大有幫助。然而，我們知道實際上在競爭劇烈的環境下，教育同樣會使年青人感到沮喪和失敗。就業方面亦復如是，學生畢業以後如找不到學以致用的工作，也一樣會感到受挫。

學術機構大都有一個強烈的自然傾向，就是竭力追求學術上超卓的地位，這是高尚的目標，但必須先有適當資質的學生，以及充裕的資源以配合。實際上，由於專上學院學額增多，就讀學生的水準可能會因而下降。我促請學術界決策人在訂定學術水平時，注意學生的能力與局限。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學生發展自我，因此，假若學生遇到挫折和感到無法應付，便難以達致目標。

我們亦很被一個信念所吸引，就是只要有多畢業生，便隨處有更佳的職位，人力短缺問題便得以解決。可是，事實卻大謬不然。施政報告指出只是某些行業嚴重短缺勞工；就專上教育的層面來說，所缺乏的主要是專業人材，例如會計、社工助理、護士和職業治療員等。為了滿足這些需求，當局應作好課程策劃與加強承認曾受培訓的人員，這兩方面不僅必需，而且也無可避免。我們也該指出，政府和受資助的機構是其中數行人手短缺的專業人才的大僱主，倘若這些合資格的人士供不應求，將會嚴重窒礙醫療、福利與康復服務的改善、發展和擴充。

我促請政府以積極堅定的立場，向本港的專上院校提供意見。最低的學術標準，應訂於學生可達致的水平，發展或擴充課程時，必須考慮到社會的需要。目前的學生就業和其他輔導服務並不足夠，須大幅增強，以充份配合急劇增加的學生人數所需。完成這些工作後，香港所需的，並非多間在學術成就上可媲美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學府，而是要確保投資於教育事業上的鉅額公帑，真正惠及本港的青年，令他們充滿自信和樂於為社會作出貢獻，此外並確保他們在適當引導下，擔任社會所需的工作崗位。

結論

副主席先生，這次辯論乃一適當場合，讓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各類應予以優先處理的需要。俟該等需要獲得普遍接納，我深信政府當能覓取資源，以應付所需的開支。過去我們在這方面表現卓越。據我所知，本港商界確然關心僱員福利的問題。然而，有關收支和成本計算的問題，在下次財政預算案辯論中處理，也許更為恰當。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李華明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總督衛奕信爵士在施政報告提出的三項轉變，即本港立法機關的民主進程、香港與中國關係的發展，以及本港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經歷的轉變。

這些轉變都會產生深遠影響，影響肯定跨越一九九七年。由於時間有限，我在此將會集中講第三項轉變，就是本港在社會及經濟方面正在經歷的轉變。我在匯點的同僚狄志遠議員將於稍後談及首兩項關鍵性轉變，即立法局的民主進程及中港關係，但我們兩人均認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高瞻遠矚是相當重要。

舉例來說，機場及海港計劃規模龐大，倘若該計劃獨佔資源，對其他服務做成影響，以致政府的對抗污染計劃停滯不前，或在本港人口迅速老化之時仍然繼續忽視老人福利，那末，即使本港在二〇一〇年可能已擁有一個設置兩條跑道、規模一流的國際機場，但與現今的情況相比，香港實質上可能大不如前。

在提供老人和退休人士福利方面，具備遠見更加重要。本港人口急劇老化，至二〇〇六年，老年人口將佔整體人口 13%，在一九八六年，這百分率是 8%。這些統計數字令人感到震驚。剛公布的一九九一年人口調查結果似乎證實上述令人憂慮的發展趨勢。

我所代表的選區（即九龍東）的情況更為嚴重，在一九九〇年，年齡在 60 歲以上的老人佔觀塘人口 13.9%，較本港全個年齡人口同樣 60 歲以上的百分率 12.8% 高出 1.1%。在老人房屋問題尤其嚴重。我希望藉此機會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其對觀塘區的資源分配。除對加速重建舊屋邨的步伐多加關注外，政府應增加資源以應付該區單身老人或老年夫婦的住屋需求。

本港需要設立某種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看到經濟處於「較低」發展水平的地區例如泰國和澳門，亦正在推行其社會保障計劃，各適其式，無懼有關計劃可能「對經濟增長造成掣肘」，至於此「掣肘」之說，其實是本港既得利益人士拒絕任何社會保障建議慣用的藉口。我強烈呼籲政府重新考慮此問題。

本港資源的確有限，我們必須權衡輕重作出取捨、妥協和讓步。民主派人士並非只抱著單純理想而行事的極端份子。我們會權衡輕重作取捨，必須以理由充份的分析和公平的論點為根據及雙方抱有互諒互讓的精神，此外，亦只能按照正確的判斷對症下藥。就此點來說，我必須指出，我認為衛奕信爵士對本港社會經濟問題的若干判斷並不全面和有所偏差。他所要求的讓步在若干情況下只涉及單方面。

以通貨膨脹問題為例，總督一如去年，繼續將導致通脹的主要成因歸咎於勞工短缺。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的第 46 段，我引用他的說話：「如果我們不設法消除某些不利於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障礙，通脹率顯然會有繼續處於過高水平的危險」。我們均有同樣憂慮。不過，他跟著只對其中一項主要障礙進行分析：「人口老化導致勞工供應減少」，而他建議的唯一解決方法似乎就是輸入更多外地勞工，這論點很明顯只傾向一方。

如果通貨膨脹是由成本推動，減輕通貨膨脹的辦法是減低勞工成本及／或提高生產效力。我們不能要求工人在提出增薪時要有所抑制，同時要求僱主致力投資及改良可提高成本效益的技術，不應只著眼於以最低廉的勞工成本，在短期內賺取最高利潤。就技術水平而言，香港在許多方面已經落後於新加坡、南韓及台灣。科技的落後必然會導致生產成本上升。政府不應只把問題歸咎工人，亦應同樣責備目光短淺的企業家，對香港的長遠發展缺乏使命感，但同時對於沒有在推動技術投資方面制訂一套連貫的工業策略，政府應難辭其咎。

但凡有人提出向富人加徵稅項的建議，富裕人士均例必提出抗議。此種反應其實並不稀奇，因為能夠自願放棄少許財富的人，為數實在不多。政府正著手研究對物業開徵資產增值稅，很多地產發展商及地產代理公司立即提出異議，包括這裏一些立法局同僚，但我認為，資產增值稅可令物業投機炒賣的利潤下降，因而可冷卻過熱的物業市道，抑制物業價格及減低租金升幅，更可以增加庫房收入，這未嘗不是好事。倘若物業投機者認為開徵資產增值稅後再無利可圖，他們大可另謀高就，「改行」去也。香港物業市場很可能因而轉趨有條有理，最終用家及具遠見的物業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公司均會受惠。

現時香港市民普遍擔心，港口和機場發展計劃將會動用其他急需提供的社會服務項目的資源。就以環境改善來講，令我很關注的費用達 20 億港元的改善排污系統計劃延遲推行，以及逐步淘汰貨車使用柴油的環境保護計劃將被擱置。根據科學指標提供的數據，工廠密集的觀塘區是全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我呼籲政府當局，應提出具體計劃及作出確實的財政承擔，使有關提供更清潔、更衛生環境的承諾得以履行。

對於本港承擔港口和機場發展計劃經費的能力，政府似乎甚具信心。總督在其施政報告中表示，在一九九二至九七年這六年間，機場核心計劃每年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 2% 左右。容我引述總督所言：「這個數字僅略高於地下鐵路在興建期間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率」。不過，我想提出在八十年代初期地下鐵路施工的高峰期間，本港通脹率急升至 15% 以上，總督在施政報告的一番話不會令我們安心。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本港經濟實質增長率平均約為 8%，但在過去兩年，經濟增長率已減慢至不足 3%，最樂觀的未來估計，亦僅為 4% 至 5% 左右。就通脹壓力和其對政府沉重財政壓力而言，一項在九十年代佔本港生產總值 2% 的工程計劃肯定會較其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所產生

壓力更大。總督在施政報告所作的簡單比較，對輕減我們的憂慮是絕對沒有幫助。我們仍待政府證明其在解決本港通貨膨脹問題上的決心及對謀求均衡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一定承諾。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麥列菲菲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我要感謝總督提出這份施政報告，他在報告中界定了當局與政府的區分。這項界定甚有作用，因為只有當局，不足以構成政府，我們身為立法局議員，也是政府的一部份。因此，使政府得以運作，我們是責無旁貸。在目前的架構下，我們必須在掣肘下工作，因為政府並非是一個多黨結構，沒有反對黨有一天掌權而可顯示其管治能力的情況出現。我們的政府並非西方式有對手的民主架構。我們必須記着，身為中國人，我們生下來便負上社會義務，同時亦享有個人權利。

談到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我對其願意與工會討論（這類型的組織不可以說是中國所鼓勵成立的）、與其傳統上視為無產階級剝削者的大企業討論、與其一向視為死敵的殖民地政府討論，都感到困惑。如果中國願意在處理香港問題上作出這許多激進的破例，又何妨再作一次破例，與立法局討論呢？不論各位同寅以何種途徑晉身立法局，我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我們都視為香港為家，希望在九七年以後仍然在這裡生活。因此，我們都有最強烈的動機，要使香港繼續維持下來，而且要切切實實維持得好。在處理立法局問題上，中國要面對的，是本港的立法機構，不是機構內個別成員。關於香港與英國的關係，我只有一點要指出，而提出這一點時，我感到極其遺憾，因為這點是與總督有關。毫無疑問，我們現時的總督是位非常仁慈而盡心盡力的總督，值得我們尊敬和贊許，但我不確知他是否能夠，又是否願意在現時的任期屆滿後繼續留任。我誠懇希望他願意，也能繼續做下去。如不可能的話，我認為英國政府若能徵詢港人意見而委任下屆總督，將會是意義重大的表現。這樣一來，代表了香港最終都爭取到平等對待的地位。

總督描述了公務人員與本局成員更緊密合作的方法。這種工作關係不但合乎需要，也很明智。不過，更重要的，是有需要增強公務員行列，使其茁壯。我們應該多着重個人的本身條件，不是年資。高層的職位，應該公開接受外界競爭。其實這情況正在各大學及公營部門中實行。我們推行的減縮，應該以使當局更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辦事更有效率為目標。我們應該更廣泛地轉放權力。負責政策事務的司級人員不應因例如出席這類會議而致事務羈身，反而應該運用更多時間訂立政策、推行政策以及監察政策推行的效果。目前公務人員的陣容現已太龐大了，而且顯得難於操縱。我們應該予以精簡及把若干項服務脫離政府編制。

當局必須作出更多的預先計劃，不應限於應付危機才決定處理的方法，或者就壓力團體的影響而作出反應。最近當局的許多重大決定，聊舉兩例來說，如擴充高等教育及港口與機場計劃等，都是應付危機而作出的。這是個瞬息萬變而複雜的年代，我們需要一個更為積極，更能洞悉先機的當局。

剛過去的一天半至兩天的時間內，本局成員曾提出各式各樣的要求，其中許多都是互相矛盾的。有人要求更多的服務，卻不要加稅；有人要求提高某些界別人口的工資，但不要通脹；勞工界和專業人士都各自要求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又反對輸入勞工，而與此同時卻全都要求經濟有所增長。在未來的數個月裡，我們必須協助當局找尋資助各項發展的方法。由於財政與人力都不是用之不竭，我們必須按緩急先後的次序作出實事求是的決定。

我們訂立政策、決定先後次序時，都需要翔實的資料，以開展工作。收集和分析資料是個久被忽略的環節，使我們深受煩擾。我們應該重新致力運用以及發展當前的資訊科技。

身爲學術界的一員，我將有很多機會談及有關教育的事項。身爲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一員以及社會工作訓練及人力策劃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s on Social Work Training and Manpower)的主席，我將會在這些委員會上發言。身爲公立醫院的醫生和醫管局的成員，我將努力尋求改善醫療服務。因此，今天我不打算討論這些問題。

不過，我想談談一個和我們關係至深的問題。當局對有組織罪行的問題，長久以來，持着樂觀的態度。當局對付三合會的政策以一停一進爲特色，許多時製造了虛假的安全感。公眾人士對九七前後的改變，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政治轉變與可能喪失個人自由方面，而遺忘了另一種情況，那便是治安不靖。最近公佈的警方統計數字把我們的注意力再一次帶到這方面。使人擔憂的，不是鼠竊案件、隨時隨地可發生的街頭罪案或者盜劫案。更醜惡的，是租用越境而來的槍械做案、販毒以及走私。以上每一類案件，都涉及組織技巧和專業化的執行工作。罪案受害人調查報告有誤導之嫌，因爲並未把沒有特別指定受害人的罪案包括在內。舉例來說，販毒和與三合會有關的罪行都屬這一類。再者，該項罪案受害人調查只包括個人和住宅，但不包括商業機構在內。

在我們的社會裡，引致有組織罪案衍生的因素甚多。

- (1) 犯罪次文化的存在；
- (2) 家庭組織的鬆散；
- (3) 經濟繁榮；
- (4) 傳統上使人遠離暴力與罪行的社會價值觀趨於淡薄；
- (5) 使用毒品及酒精的情況加劇；
- (6) 由於本港經濟結構的改變，要求更高的技能，使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士逐漸失去功用；
- (7) 執法能力下降。

我們常常談到本港與華南地區的經濟聯繫，並且喜形於色，卻忽略了罪犯也同樣可以建立這種聯繫。華南地區已成為從金三角偷運鴉片和海洛英的重要渠道。事實上，我最近出席世界衛生組織會議時，知道這個問題已愈來愈引起關注。中國方面對槍械的限制寬鬆，尤其是於軍隊須自行尋求額外資金，以及因軍械買賣旁落而致收入減少的時候，這情況更變本加厲。在文化大革命紛亂日子裡成長而被遺忘的一代，發覺自己遭經濟上的轉變摒出局外，他們愈來愈受到誘惑，轉到犯罪活動上。此外，也許與我們想像的情況相反，中國內地施行的管制已日漸轉弱，經濟卻迅速增長。

三合會活動和有組織罪案已伸張爪牙，肆虐本港社會的廣闊部份，包括交通事業、建造業、學校、酒店、娛樂場所、卡拉OK酒吧、以及在旺角、油麻地、銅鑼灣及新界各地的店舖。三合會會員的人數亦有所增加，根據最近提出的一份報告，自一九八七年後期以來，新義安的會員人數增加了35%。

販毒現已成了大事業，販毒頭頭是財政巨子。舉例說，《經濟學人》最近估計從美國可卡因買賣而得的利潤，每年幾達50億美元，較整個沙地阿拉伯的經濟還要高出一些。使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流入毒販手中，以致損害經濟進展的基礎和境內的平靜，實在沒有更攻心計的事了。本港在打擊這方面所作出的行動，實在少得可憐。販毒（追討得益）條例施行迄今已有兩年，所充公的款項只不過400萬元，扣押的款項則有340,000,000元。我們仍然期待當局把另一個販毒頭子或有組織罪案首領繩之於法。

總督稱有組織罪案白紙條例草案是一條嚴峻的法例，但這條法例有可能因人權法案而派不上用場。有組織罪案條例草案是按美國黨派影響貪污組織而起草的，我不大肯定這方面的情況是否適用於本港，因為在美國方面，「有組織罪案」演變成很獨特的罪行，是指大規模的黨派，組織龐大，歷史悠久，依靠政治貪污而不受法律制裁。如果當局認為這情況與本港有相同之處，則我們要加強終審法院的組織。保證其不受本地勢力的影響。

總督的施政報告和警方的罪案統計數字發表後不久，當局竟然預算減縮警察方面的開支，我感到難以理解而又事帶諷刺。如果我們要攻進有組織罪案的核心，我們不但需要更多街頭巡邏，更重要的是有更多幹練的情報人員，保證提庭審訊的人士都會入罪。

局內同寅將須作出一項困難的決定，選擇是否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個人權利，堅持直到審訊完結時一直假定被告清白，認定每個人必須獲得保障而不受常被形容為代表極權的警察騷擾。如果是這樣，要把被告定罪的過程會更複雜。反過來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賦予警察更廣泛的權力，容許他們有懷疑即可拘捕可疑人物，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以搜集證據，減少他們入屋和搜查的限制呢？雖然我們不接受死刑，我們是不是可容許與中國更緊密合作呢？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文世昌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在總督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港府多方面的政策，惟獨對文化及廣播政策卻隻字不提，使本人感到失望，尤其替文康廣播司感到不值。事實上，香港在九十年代工商業及資訊發達，市民的精神生活應與這些發展同步並進。隨着一九九七的臨近，言論自由及創作自由備受大眾關注，文化藝術上的認同對香港極為重要。

我們香港人應該有自己的文化藝術政策，有一個負責闡釋、執行及關注文化政策的機構，確保更適當地運用資源。政府固然不應干預藝術創作的自由，但對在推動、支援、訓練、教育各方面作出承擔，才能夠使文化事業有長足的發展。現時，「演藝發展局」(Council for the Performing Arts)只能對部份演藝團體及個別節目申請在財政上作出撥款，一個全面推動及協調全港藝術政策，包括長期備受忽視的視覺藝術、電影藝術、文字等的「藝術發展局」(Arts Council)應該應運而生，以配合邁向廿一世紀的文化發展。我希望文康廣播司對這個建議有一個全面而又實質的回應。

本人另一個極為關注的政策 — 廣播政策，在今次總督施政報告中，亦未有提及。事實上，香港處於急劇發展的資訊年代，立法確定公營電視的角色已經迫在眉睫，香港電台今後何去何從？行政局通過香港電台獨立於政府行政架構之外後，諮詢中國政府時會否大難不死，更是我們關注的課題。香港電台如何在商業社會中定位？它能否平衡資訊、教育、娛樂三種功能？它能否在改善效率追求質素時，可以發揮平衡與補充兩個商營電視台的作用，增加社會大眾對時事的理解，對資訊的掌握，對藝術文化的認知？

在為市民提供多元化及通過適合各種不同需要的廣播服務原則下，政府應考慮到傳媒事業不應被個別集團壟斷，使相互競爭帶來進步與改善？當然，政府亦應關注廣播事業的服務質素。未來，政府要處理關於廣播政策的問題極多，例如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的關係、收費電視對免費電視的影響，均是文康廣播科需要向本局交代的課題。本人在此誠懇呼籲政府應該拿出決心和誠意，檢討現行廣播決策機構的缺失，擴大民間對傳媒政策的參與，抗衡現存的壟斷情況，建立一個真正開放，真正屬於全港市民的廣播媒介，發揮資訊民主化的積極功能。

總督在施政報告第 50 段提到「儘管受到嚴重的財政限制，仍會繼續推行全面控制污染的計劃」。但最受市民關注，而又被本局議員多次提及的污水排放計劃卻因財政問題而無限期擱置。海港污水問題不單是視覺上、嗅覺上的污染，令居民生活質素下降，還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本港每天產生 200 多萬噸污水及工業廢水，每日足以注滿 1000 個符合奧運會標準的泳池。其中，只有 10% 的污水在排放前是經過生物處理，40% 局部處理，50% 完全沒有處理。如政府的排放污水計劃繼續拖下去，不出三、五載，香港便變為臭港，使「東方之珠」這個美譽蒙塵，使香港人在國際旅遊界蒙羞。本人強調環保，是市民的基本權利，政府的基本承擔，是一種更長遠的基建發展。明顯地，政府在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上，過份放在機場及港口建設計劃為主。而另一種基建 — 環境保護卻不知道放在那一個位置。希望港府能下定決心，堅決推行污水排放計劃。灣仔海傍的海水，含氧量常低於 50%，低於水質標準。假如總督閣下能一到銅鑼灣避風塘參觀，便會發現漆黑如墨的避風塘發出惡臭，一個極富潛質的旅遊點，使遊客望而卻步，在總督施政報告

中，提到未來五年，在環境保護方面會使用約 80 億元的經費，平均每年用 16 億元。但以本港人口生產總值約六、七千億計算，平均每年使用在環保的費用只是人口生產總值的 0.25%，與其他國家比較，日本的環保開支是人口生產總值的 3%，西德是 4.5%，連中國大陸也達 0.6%。香港的環保開支與經濟成就，實在太過不成比例。

社會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認為環保的費用會增加廠家的生產成本，於是認為環保對經濟有損。其實，我們一定要考慮到這個問題在經濟上的社會成本計算，才有真確的答案。如果我們忽視環境保護，以致環境被破壞，市民生活質素下降，健康大受影響，我們將要付出在醫療及重建環境的社會成本將會非常龐大。事實上，環保與經濟發展並不如有些人所謂互相排斥的。在外國影響環境的報告。"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是非常普及的，亦即是說在一件設施、工程計劃進行前，先進行調查評估對有關環境做成的影響，使社會成本減低。我們必須了解到經濟發展是可以分作長期及短期的。假如我們只重視短期利益，而忽略了長期方面，長遠來說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很多國家如澳洲及美國都開始看到推廣環保後湧現了不少環保研究。不少新產品、新設計都因此出現，廢料回收工業更發展為有利可圖的生意。故經濟成長不一定與環保互相排斥。因此，政府更加應該在環境保護方面加把勁，並加強教育社會人士認識環保的重要性，就不會發出好像昨天聽到的一些謬論。

在經濟方面，香港正處於經濟的轉型期，由勞工密集轉變為技術密集。在這個過程，政府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是使工人得到機會接受培訓，使他們能夠轉業；另一方面是給予廠商支援，使他們從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過渡到以技術為主。因此，政府不要單是抱着不干預政策一成不變，視之為金科玉律，在適當的時間，增加科技研究的經費。在施政報告中，只有提及到一個新的工業技術發展局的成立，其餘的政策均沒有提及。我希望重申，基建發展包括港口機場是「硬件」，技術、研究、人才培訓是「軟件」。沒有「軟件」，就算有硬件，一副電腦也不能運作。一九八四年太平山學會建議政府成立「科學園」。今日再次聽到科技大學校長建議港府應於該校與將軍澳第三個工業邨之間興建一個小型科學園區，研究及改進本港的工業科學技術。我個人盼望這個計劃不是空中樓閣，可以馬到功成。

最後，本人希望在醫療政策方面，總督不要單注重「硬件」的發展，而忽略了「軟件」的配合。例如東區醫院，建築巍峨宏偉，設計嘆為觀止。但若因護士或醫療人員人手不足而要延遲服務，就實在太可惜了。本人曾親身到柴灣診所，看見每朝均有很多老人家飽受日曬雨淋之苦，晨早在輪候醫療服務，亦知道急症室在東區極不足夠。因此東區醫院能夠準時投入服務是非常重要的，亦是整體東區市民多年來翹首以望的事情，希望總督不要又一次使我們失望。

潘國濂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我很高興見到總督在施政報告裏用相當大的篇幅談論中港關係的重要性。中港關係自從中英為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以來，基於種種原因，並未達到充分和諧，而且有時可以說是特別緊張。香港是個很小的地方，缺乏天然資源，人口非常擠迫。香港唯一處於

有利地位的，是接近中國這個龐大的資源和市場。其實香港的工商業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所以，單從經濟方面考慮，香港的生存是不可能與中國分開。

在政治上，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決定了香港的政治前途，基本法的頒布，更加肯定了香港將來的政治架構。至於決定了的政治方案是否可以接受，則要看個人意願。那些決定不在這個政治環境下生活的人，或要「買保險」的人，亦應該有很多日子去為自己部署。但是留下的人仍然是佔絕大多數。作為一個政府，應該為這些人的長遠利益着想，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將來基本法的基礎上，製造一個可以使他們有安定生活的政治環境。在這個大前提下，我認為跟中國對抗及採取不合作態度，並無好處。

在這個政治、經濟都不能脫離與中國合作的情況下，當世界政治氣氛變得更和諧的時候，很多香港人很不了解為甚麼中港關係經常表現得如此緊張。沉默的大多數香港人，不明白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基礎上，與中國現今政權對抗，對香港整體利益有何好處，對小市民將來的生活會帶來甚麼保障，對工商業有甚麼裨益。當東歐及蘇聯進入新政治環境之際，在香港資本主義下成長的香港人，不免對中國有所期望，但這並不等於希望中國大亂，或者希望中國像東歐、蘇聯般解體分裂。因為香港人知道，對中國人民來說，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更自私地說，大部分香港人會認為在現在的政治經濟基礎上，一個波動的中國不會對香港有好處。所以我認為我們處理中港關係問題上的主導思想，應該是合作而非對抗。

我對於英國首相能與中國在有關新機場問題上取得協議，簽訂諒解備忘錄表示欣慰。諒解備忘錄充分表現在香港主權交回中國的過渡期內，雙方應有的合作精神。

其實政府應該很清楚的告訴香港人，在現今政治經濟環境裏，如果沒有中國方面的合作，根本不可能推行大型基建，沒有大型基建項目，香港經濟、市民生活便停滯不前，香港亦會在世界貿易上失去它的競爭力。無論是政府或是私人企業的大型基建，不可能不向國際財團籌集資金，這些財團除了要求政治穩定之外，還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可以回收資金或貸款。在還有不足六年的過渡期內，沒有中國的同意或認可，根本不可能提供這些財團所需要的保證，籌集資金便不會成功。

當然，合作並不等於事事都要同意中方的意見，如果有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及將來基本法的地方，我們應該據理力爭。不過我相信大部分的歧見會是基於雙方不同的理解、觀點和角度。我相信通過理智和善意的溝通，這些歧見定能圓滿解決，而無需做成對抗的局面。

與中國誠懇地合作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是在過渡期有效管治香港，和在一九九七年後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新機場問題取得成果的基礎上，我敦促政府進一步與中國溝通和合作。

總督在施政報告亦提到香港與華南地區密切的經濟聯繫。其實自從七十年代中國開放以來，中港經濟不斷發展，今天香港與華南地區基本上已經成為千絲萬縷的一個經濟體系。這些千絲和萬縷是在沒有甚麼計劃和組織的情況下織成的，雖然政府在這方面出了很多

力，但主要仍然是香港個別工商企業努力的成果。隨着新機場諒解備忘錄的簽署，這個經濟體系應獲得更大的關注。新機場和海港設施雖然在香港興建，但是將來它們主要服務的對象還是包括香港在內的華南地區。我建議政府的經濟策略，應以香港作為華南經濟體系的一部分為主導思想，而不應以香港為一個獨立經濟體系來制訂計劃。今天在與廣東購買食水已經多年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聽到政府要緊急購水，甚至要制水；今天廣東缺電非常嚴重，影響香港在廣東企業和工廠生產；今天我們見貨車在邊境大排長龍，馬路因貨車而交通擠塞，但邊境仍未能 24 小時開放以便貨車往來；今天香港商人在廣東開設工廠，並聘用了 300 萬工人，但我們並無計劃去提高這些工人的生產力和工業質素。

我認為有需要，而且現在就是一個適當的時候，與中國組織一個包括香港及華南省份在內的「華南經濟合作委員會」，討論及安排在這地區的經濟合作事宜，以進一步把我們現在不甚完整的千絲和萬縷，編織成一幅美麗的絲綢。這個委員會應由政府來倡導，有私人參與，而且是個有影響力的機構。這個委員會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已十分多，包括解決邊境問題上的各個樽頸；研究在這個半徑一百公里內珠江地帶將有四個國際機場所引起的問題；資助華南地區公路建設；把這地區的供水、供電問題納入一個完整的計劃內；利用各地的優勢作有效的工業分工，分配工業發展資源；統籌工商業和管理人員的訓練；推動國內企業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集資；協調大鵬灣港口發展與香港海港發展計劃可能產生的矛盾；和促進連接貨箱碼頭的鐵路建設，這些都是一些例子。只要香港的經濟計劃，能按照香港為華南經濟體系一部分的設想而釐定，香港的經濟前途則會更光明。

在國際區域性經濟體系相繼成立之際，香港單靠本身的力量已經是不合時宜，而且將不能在國際上競爭和立足。一九九二年西歐經濟體系更緊密運行，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形成經濟體系；東南亞協約國的經濟合作正在加強；東北亞的日本本來就是強大的經濟力量，而南北韓的經濟聯繫正有發展的趨勢，香港並不屬於這些體系，香港的經濟前途必定繫於與中國，尤其是與華南的合作。政府能在這方面促進成立「華南經濟合作委員會」，或類似有影響力的機構，將香港帶入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經濟領域，10 年、20 年後的香港人，將會感謝政府今天在這方面的努力。

說到 10 年後的香港，可以肯定的是絕大部分香港人仍會留下來。我們要為這些人創造一個繁榮和安定的香港。這樣的香港有賴於一個有效管治的政府，和一群勤奮、高效率和廉潔的公務員。過去幾年，政府公務員備受中英談判及政治前途不明朗的衝擊，在政府的威信一再受到挑戰之時，他們的士氣有低落的現象。新機場爭議進一步影響政府的威信，加上近年民主步伐加速，加深了對公務員的壓力。我對於紀律部門的士氣特別關心，他們是維持香港治安的主要力量，在過渡期他們所受的壓力比較大。政府應密切關注這些現象，並採取有效措施提高公務員的效率和士氣。同時香港公務員長期在殖民地架構下工作，對於中國國內的理解有限，要應付一九九七年的轉變，便要加強他們與鄰近省份和北京中央聯繫的能力。中英聯合聲明已訂明那些司級官員必須由中國籍人士擔任，在以後不足六年的日子裏，我們必須盡速培植人才，使他們有能力擔任這些職務。

我認為香港人對現在政府的要求，不單只是在一九九七年可以順利過渡，而且在一九九七年後有一群能幹的，和全心全力為香港服務的公務員。政府要充分的提出證明：它正在滿足香港人在這方面的要求。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唐英年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唇齒相依，是今年《施政報告》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從客觀的政治環境看，我們確需要面對和接受現實。所以本人相當同意報告中所強調：「越接近九七，便越有需要與中國更緊密地磋商和合作」。

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中國便會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倒數這個大日子，只有五年多時間，中港雙方實有必要從速建立正常夥伴關係，我們不妨多主動與國內溝通，交流意見，達到雙方互諒互助，一國兩制才可成功執行。

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大原則我們當然要堅持，但刻意抗拒與宗主國作適當合作，實無疑扼殺自己有限的政治空間，置 600 萬港人利益於不顧。

無可否認，在政治舞台上，香港確有先天性的局限，但經濟上，我們則可以自由創造一個對廣大市民最有利的金融經濟領域。

《施政報告》對明年經濟前景相當樂觀，完全是建基於今年回升的貿易表現。

不過，坦白說，本人就無這般樂觀了。我認為港人眼光必須放遠，單看一、兩年走勢，未免過於狹窄和短視。九四、九五或者九七年後的經濟又如何呢？報告中，我看不見有任何新的經濟發展策略。單一個新機場，是否就可以取代一切呢？如沒有出色的貿易配合，請問宏偉的機場又有何用呢？

現時，我只可用「荆棘滿途」這四個字來形容今日香港貿易前景。

近幾年，全球經濟放緩，世界性保護主義浪潮抬頭，尤以美國為首，已向香港進行攻擊。

去年，本港人造纖維毛衫被美國裁定要繳付 5.86% 反傾銷附加稅之後，港製人造纖維毛衫輸美出口總額即比前年下跌 40%。近期進行的行政檢討，將又可能提高附加稅，歐洲共市指控中港傾銷小型彩色電視機，再加上被墨西哥裁定傾銷牛仔布類似傾銷指控，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嚴重打擊港人就業機會和商人投資意欲和競爭力。

雖然我們工商界長期不斷游說政府，支持撥款成立自由貿易基金，來對抗保護主義氾濫，可惜政府一直用拖延逃避現實和花言巧語的手法，拒絕協助本港商人抵抗這等不公平的指控。

中美貿易近期更磨拳擦掌，本來和香港無關的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美國引用 301 條款貿易法案，指摘中國歧視美出口貨等問題，一旦制裁成功，香港所蒙受的經濟打擊和損失，遠比中國更甚。

可惜上述種種危機和隱憂，施政報告中竟隻字不提，這種坐視不理，讓本港工商經濟自生自滅的態度，令我非常不滿。

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場，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過去一直相當成功，加上貿易發展局的扶助，不斷向海外推廣本港產品，不過，這種優勢，並不等於有足夠對抗保護主義的實力。時移勢易，不干預政策在今日九十年代亦已失去效用。我們需要切實重新檢討整個經濟發展策略，政府應嘗試擔當一個更積極、更進取的角色。

另一方面，低經濟增長，高通脹，正是目前本港最棘手的問題。而這個惡性循環若仍不被正視，恐怕通脹將更趨嚴重，經濟增長繼續維持在低水平。

通貨膨脹，是一非常複雜問題，勞工短缺，間接稅增加，日常消費用品暴升，公用事業政策的漏洞等，都是導致通脹高企的原因。而短期內，當新機場全面動工，大量資金投入，估計有可能進一步扯高通脹率。

報告中只提出引入輸入外地勞工來打擊通脹，本人認為是不足夠的。

我更要強調，輸入外地勞工政策，必須在吸納所有本地資源，在有需要的時候，才可作有選擇性、有限量的輸入，因為本地工人是我們社會一份子，理應享受社會繁榮的成果，工人權益不可被剝削。

無可否認，勞工短缺確存在於香港。勞動力增長下降，教育獲提升，步入經濟轉型期等，願意投身藍領的年青人，買少見少；以製造業為例，八九年仍有 80 多萬工人，但到今年中，則只剩 68 萬，跌幅達 18%；所以我不反對利用輸入勞工來改善勞動市場的供求不平衡。

事實上，很多先進國家，亦面對同樣問題；我們鄰近國家新加坡，所輸入的勞工佔全國勞動人口的 11%，而我們則只不過佔市場的 0.6% 吧。新加坡今年經濟增長 8%，通脹率只 4%，工資增幅一成以上，這可反映出，勞動力得到補充，對整體生產和競爭力都有很大裨益。

多年來，新加坡政府鼓吹多生育計劃，以提高勞動人口，但我相信這個論調在香港，恐怕就無市場了。長遠發展，積極培訓管理及技術人材，加強自動化生產程序，改良產品質素，都是政府和我們工商界必須共同合作努力的目標。

整份報告，最令我雀躍的，就是工業技術發展局終於可於明年初成立了，此乃我們工業界苦候多年的好消息。

香港雖是全球第 11 大出口地區，但高科技遠遠落後於亞洲三小龍，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港府的工業政策，一向被批評缺乏長遠眼光、拒絕承擔責任，而香港大部份工廠，都是中小型，沒有條件去從事研究和發展，所謂不進則退，我期望工業技術發展局可為我們帶來一片新景象。

不過，從報告中了解到，發展局只擔當一個向政府提供意見的諮詢角色，實有欠理想。本人認為應加強其行政權力，使擁有獨立的決策權，才可發揮效用。經費的多寡，亦是它今後成敗的關鍵，其他三小龍每年獲總產值約 2% 的資助，香港不應比之更少，否則徒勞無功，本港工業今後再難有起色。

副主席先生，民主自由固然重要，積極發展經濟更是必需。香港與中國息息相關，香港的成功，有助於推動中國政治、經濟改革開放，我們攜手合作，足以互補不足。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狄志遠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我的匯點同僚李華明議員剛才就香港內部的社會經濟長遠發展提出了我們的看法。接著我將以過渡九七的視野，討論一下香港的憲制發展、中港關係和新市鎮發展的問題。

憲制發展

隨著立法局議席的逐步增加和引入了一定比例的直接選舉成份，今日的立法機關，無論從組成結構和政治角色角度看，與往屆立法局都截然不同。政府今後的各項政策制訂無可避免地需要與本局加強磋商協調，充份重視本局意見 — 特別是直選議員所反映的廣大地區民意。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與本局建立「衷誠合作的夥伴關係」，以「共同承擔責任，維持良好的管治」，對此，匯點表示贊同。為了在過渡期維持香港政府事務的有效運作，政府當局與立法機關加強合作，負起責任，實屬必要。不過，在強調夥伴關係重要性的同時，我們也須要看到，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發展大方向，按將來基本法政制原則的規定，應是各司其職、相互制衡。立法局議員今日和未來的政治角色已非常清楚，就是應該逐步致力把立法局發展成為一個完全獨立、有足夠機構性能力去監察制衡行政當局。因此，夥伴關係的意義應清楚界定，不應成為把行政立法之間不同職能、不同角色予以含混的借口。過去把行政立法兩局非官方議員混淆在一起，行政立法不分的情況必須予以糾正。唯有行政立法分權制衡，夥伴關係才具有實在的意義。

從更高的層次去看總督提出的夥伴關係問題。這種關係不應局限於立法局。我們認為，更確切的提法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夥伴關係。立法局作為一個代議機關，是反映社會民意的一個主要渠道，但也應注意到，目前香港政制的一項特色，是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各政策範圍及地區性的諮詢組織，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有必要使它們的構成和運作方式，盡量向社會開放，增加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並吸納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而不只一個狹窄範圍的人士參與有關的組織。在考慮行政立法之間的夥伴關係時，也要注意建立立法局與擁有行政權力的法定政策諮詢委員會之間的聯繫，很可惜這點施政報告完全欠缺交代。

總督透露，政府現正檢討整個選舉制度，並設立一個獨立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我們歡迎有關選舉制度的檢討，並希望在此提醒政府當局，在進行檢討時須充份聽取本局議員

的意見，以及檢討範圍不應只針對直接選舉，也應包括功能組別選舉。檢討也應延及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的角色及其組成。我們建議取消所有委任議席。就選民投票年齡問題，既然 18 歲已是目前香港社會承認的法定成年年齡，則投票年齡也應與此看齊。

與中國的關係

香港到九七年便要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因此，中港關係的重要性是不庸置疑的。我們一向肯定，穩定的中港關係對香港的前途極為必要，不過這種關係當然不能建立在犧牲香港的根本利益之上，這既有違「一國兩制」的互利互容精神，對於中國長遠利益來說也沒有好處。

總督在其施政報告中只強調政府層面的中港接觸，這顯然流於狹隘。中港關係絕對不應局限於中英兩國政府或中港兩地政府之間的關係，香港的民間及立法局都應該是關係發展的推動者。最近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有關終審庭的協議受到社會廣泛批評，正好說明中英雙方秘密外交去處理中港關係的局限性。固然，在目前香港仍屬英國管治的現實下，中英商討香港事無可避免，但若要其商討符合港人意願，則日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遇到重大敏感問題，應諮詢香港社會及本局的意見。同樣道理，英國外長、總督與中國政府有關官員舉行定期會議的結果，也應定期向本局匯報。須要明白，沒有港人廣泛的認同和支持，任何中英或中港政府之間達成對香港的安排，都容易引起港人的不滿，使有關安排難以順利執行，同時亦有礙中港關係的良好發展。

施政報告強調香港與廣東的互惠關係。不過，目前兩地的合作機制只局限於治安、環境等事項。我們建議政府應考慮成立一個粵港合作協調委員會，專責推動兩地的經濟合作和社會發展計劃。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的一項重要意義，是民族性的回歸和認同。為了更好地去準備這個發展，我們建議公民教育委員會積極推動民族教育活動，以及在所有學校引進民族教育的課程。我們年青的一代，有需要加深了解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狀況，有需要認識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內容。認識不等於盲目的接受，但若缺乏對中國的認識，則無從談得上去面對九七和過渡到九七。

新市鎮發展

接着我會以新界北為例，談談新市鎮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社區問題。

新界北（包括大埔和北區）被納為新市鎮發展已有 10 年時間，期間區內人口升幅超過一倍。政府通過大型房屋建設，把人口從市區遷徙至新市鎮，令全港人口分佈較為平均，值得支持。不過，在落實計劃時，各項社區建設未有配合人口增長的需要，為新市鎮居民的生活帶來不少困擾。

醫療服務

在醫療方面，新界北至今仍未有較全面的急症醫院，地區醫院更有待九十年代末期才設立，導致居民長時間忍受醫療服務嚴重不足的困境。除了醫院服務外，其他急症室和專科門診等服務的提供都不足。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同時影響及其他地區，大埔和北區居民需要長途跋涉到鄰近地區使用有關的服務，對兩區的居民都做成不便。我們促請政府提早落實計劃有關北區的各項醫療設施。

對於政府稍後發表的醫療政策綠皮書，我們期望政府對本港的醫療服務進行整體的檢討，包括公共醫療服務的角色、治療與預防性的醫療服務、醫療成本收費等。政策的執行是牽涉資源分配的，必須全盤考慮。在起草有關的綠皮書時，政府應充份諮詢業內人士及立法局議員。

交通服務

我們不時收到大埔及北區居民投訴交通服務不足，現時的火車服務缺乏市民監察，因而收費偏高及服務水準不佳。另一方面，由於「交通協調政策」的限制，巴士服務也不能作更大的擴展，市民並沒有多大選擇的餘地。

雖然我們贊成以集體運輸為主，但是目前香港集體運輸運作模式，值得商榷的地方實在很多。火車服務根據法例規定必須按商業原則經營 — 即是必須賺錢 — 因而加價不受任何監管。與此同時，另一種的集體運輸服務 — 巴士卻受到多方面限制，有關當局卻說這是合理運用資源。我們從來不反對合理分配資源，但是目前這種壟斷的資源分配的方式，完全沒有給市民作為一個消費者任何影響決策的權力。全面檢討集體運輸服務提供的方式和加強市民的參與，是必要的一環。

教育

香港的教育一向佔社會服務開支的最大項，約為政府總支出的 17% 至 18%。可是，這筆龐大經費的使用與分配，卻並不理想。過去 10 年，大專經費佔整體教育支出由 5% 上升至 27%；同時間，小學經費所佔的比例由 34% 下降至 24%。事實上，過去幾年政府的改善中、小學教育質素計劃，也只是集中在中學方面，而忽視小學教育的投資。

忽視小學教育除了對整體教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外，對新市鎮的影響尤為嚴重。由於新市鎮的人口結構問題，小學教育質素的改善是我們面對的首要工作，這亦間接有助減輕新市鎮的青少年問題。

我們呼籲政府盡快提出改善小學教育的具體方案，及增加小學教育的撥款。我們建議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應提出小學開設學位教席，及對教育學院進行適當的改組，使其可開辦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涂謹申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在今日的辯論中，我會就下列幾方面提出我與港同盟的意見。

治安

首先是治安問題。雖然本港的罪案數字整體上沒有增加，我們的罪案亦仍然遠低於西方工業國的大都市，但我們對於本港社會安定的情況，切不可視之為理所當然。暴力罪案（尤其持械劫案）增加，犯罪份子對在灣仔區執行任務的警員公然挑釁、黑社會壟斷很多行業均令市民擔心。我促請政府採取下列方法改善治安：

- (1) 加強警隊人力，提高士氣，派遣更多警務人員在街上巡邏及添置先進的巡邏配備。
- (2) 加強中港合作，合力堵截犯罪份子及槍械流入香港。
- (3) 鼓勵市民舉報罪案及加強警民合作，加強保護報案者及證人的安全，例如房屋署應彈性處理調遷曾舉報罪案而受到滋擾的市民；簡化報案程序，檢討標準口供表格的效果並擴大其應用範圍；推動鄰舍守望計劃。
- (4) 加強偵查軟性毒品的售賣、黑社會滲透學校及利用青少年犯罪的活動、及非法使用及偽造信用咭的案件。
- (5) 繼續以打擊黑社會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活動作為首要目標。
- (6) 考慮重設反黑組，調派在這方面富經驗的警務人員負責反黑工作。

另一方面，市民亦開始擔心越南船民營的秩序會否因英國與越南對於遣返船民的協議有所進展而失控。因此，政府應進一步在這方面加強保安。

越南船民

越南船民的問題已困擾了香港市民十多年，耗費了超過 40 億元的公帑。英國與越南剛簽訂的遣返協議，似乎為解決船民問題提供了一絲曙光。但事實上港人仍須進一步尋求國際合作以解決船民問題，特別是促使英國和美國為船民問題負上更多的責任。

在遣返協議簽署後，英國仍應進一步確保協議獲得落實，經甄別為非難民的，應在有秩序下遣送回國。另一方面，英國亦必須為船民開支負上更大責任。英國政府過往負擔船民的開支少於總開支的一成，但我們支持英國政府中東戰事的軍費，一捐便是 2 億 3,000 萬元。我懇請政府要求英國政府在船民滯港期間，負擔其滯港的大部份費用，否則本局將考慮在駐港英軍的費用中扣除。

除此以外，美國亦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不是阻撓船民問題的解決。越南船民問題很大程度上由美國一手做成，但美國卻一再反對香港實施當然遣返的政策，既不肯大量收容滯港船民，又唱高調不讓被甄別為非難民的越南船民遣離香港，結果只會是香港繼續負擔這個沉重的包袱。我懇請美國政府採取合作態度，不再反對本港實施當然遣返政策。

法治和人權

跟着本人要討論法治和人權問題，要保持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必須在目前及九七年後維持法治及司法獨立，確保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包括產業）得到充分法律保障。（一）一個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而有國際司法聲望的終審庭必須盡快成立，以累積案例，展示法律的確定性及法庭的獨立性，讓港人及外地投資者相信香港的法治可延續下去。（二）切實執行及落實人權法，包括立即主動修訂與人權法有所抵觸的法律，減少法律的不確性。（三）成立有調解以至仲裁功能的人權委員會。（四）全面推廣及普及人權教育與知識，包括執法人員在內。（五）港府承諾不會將人權法通用於六條法例的凍結期延長。（六）盡快修訂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的法律。

另一方面，最近一名前立法局議員作為被告，所遭受執法人員的對待，亦引發市民對執法人員會否濫用執法程序的討論，政府實有必要對執法人員的訓令作全面檢討。

此外，將大陸非法入境工作的年輕初犯者送往監獄服刑 15 個月或以上，我認為是完全違反人權的做法。當局應立刻採取行動，取消這實際上已變成強制執行的刑罰。

房屋

至於房屋方面，總督在施政報告內有關房屋的論述，過於簡化，只交代了半數人口入住房委會公屋的現況及房委會至二〇〇一年興建 40 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對市民深表關注的房屋問題，例如樓宇炒賣、與市民負擔能力脫節的樓價、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舊區重建的收樓賠償及住客的安置、私人大廈管理法的修訂及出售公屋質素欠佳及反應欠理想，卻一概沒有討論。

整體房屋策略而言，本人贊成李永達議員的論點，應採用公屋及居屋混合為主導的模式，並以之作為調節私人樓宇價格，使有真正需要住屋人士能負擔在私人物業市場置業或租住。

對於過劇的炒樓活動，我建議下列的具體措施：

- (1) 進一步有效地監管樓花買賣秩序和限制內部認購。
- (2) 徵收買賣合約印花稅，加重炒家的交易成本。
- (3) 加緊追查炒樓利得稅。
- (4) 嚴肅地考慮開徵房地產增值稅。
- (5) 與銀行商討採取較為審慎的樓宇信貸政策。
- (6) 取消居屋及出售公屋與私人樓宇價格掛鈎的政策。

- (7) 長遠來說，增加土地供應，包括靈活地批准修改土地用途和適當地放寬地積比率等。

大廈管理

香港有半數的人口居住於私人大廈，因此做好大廈管理的工作，對改善環境、衛生及治安都有幫助。很多市民對最近完成諮詢的大廈管理法例草案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當局能真正有決心地改善不公平的公契條款和大廈管理的工作。我謹進一步提出改善的方向：

- (1) 取消原條例中的 2A 條款，將大型屋邨的管理權交回業主，配合大廈管理公司的發牌制度，以保障小業主的權益及保證管理的質素。
- (2) 將草案中要求三分之二業主業權通過才能收回管理權降低到二分之一。
- (3) 設立「大廈事務管理專員」，專責私人樓宇管理事務，集合政府部門中與大廈管理有關的專業人員，更有效率地落實大廈管理的政策。
- (4) 投入更大的資源協助業主立案法團做好管理的工作。
- (5) 成立大廈管理審裁處，以有效率和廉宜的方法去仲裁業主、住戶及管理公司之間的糾紛。
- (6) 檢討及改善現有的標準公契條款，進一步保障小業主的權益。

市區重建

市區重建的工作對環境及規劃的改善非常重要，但從近期土地發展公司強制收購重建區內的土地的程序和個案，亦引發下列須要注意的問題：

- (1) 被強制收購土地的小業主，能否合理地分享土地重建價值所帶來的利潤。
- (2)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中沒有要求妥善安置受影響的住戶。
- (3) 長遠來說，土地發展公司應培養其專業工作隊伍，而不應只依靠地產商作為主要的專業技術支援。
- (4) 土地發展公司應以發行債券集資，而非大部份依靠與其合作的地產商的資金支持，以避免太受地產商的影響，淪為地產商使用強制收購業權的工具。
- (5) 土地發展公司董事局的成員應有較多市民的代表，並應實行類似立法局的利益申報制度。另一方面，當局應立即修改業主重建收樓時須給予住客的賠償額，因這方面的法律已過時，與現實情況脫節。

西九龍填海

作為九龍西區的直選議員，我希望政府能夠確保西九龍填海及其後的有關工程不會嚴重影響居民，尤其在環境方面。

加速完成「西北九龍污水處理及排放系統」是當務之急，務求於填海工程連接昂船洲前完成，以減低海水污染。

另一方面，市民擔心政府因工程效率，會近乎無條件地放棄一些基本的環境標準和要求，例如容許 24 小時施工。

此外，西九龍填海所得土地除機場運輸幹線重要之外，亦可以為擠迫和原來規劃甚為混亂的西九龍區帶來改善的機會，希望政府盡早公佈填海所得土地的規劃藍圖，公開諮詢。

投票年齡

剛才聽到劉慧卿議員提及九七之後的制度很多問題。我希望能看到九七後的情況。有人說，我是本局最年青的議員，所以我很有可能目睹香港是否 50 年不變。我贊成應給予年青新一代更多承擔社會責任的機會，而給予他們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 投票權是他們開始承擔的第一步，因此本人贊成將投票年齡降低至 18 歲。

本人謹此陳辭，對施政報告不足的地方表示失望。

黃秉槐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三星期前，政府當局向我們匯報有關工程事宜的政策。範圍包括基礎建設、建屋、環境保護方法、成立工業技術發展局、大幅增加專上學院科技課程學額、研究及發展計劃，以及簡介在健康服務方面使用電腦的情況。一如去年，上述事項佔施政報告篇幅的 15%。

然而，當局並沒有向我們匯報有關科技、電信或能源方面的政策。我們亦不知悉本港的基礎設施將具何種靈活安排，以配合主要科技發展；在決定主要工程的時間表和範疇時，成本效益分析所佔的比重；在減罪、醫院服務、未來選舉及加強與中國關係各方面採用高科技的政策；就環境保護而言，在何種程度上使用無污染高科技以及廢物管理的一般政策。「資訊科技」一辭並沒有在施政報告中出現。為何一年一度的政府施政報告對科技問題着墨不多？

今天，我將集中討論基建和環境方面的若干問題，以及高科技政策的某些不足之處。其他方面的問題則會留待在未來一年會期的辯論和質詢中提出。

基礎建設

我希望進行基建時，成本效益和靈活安排會是優先考慮項目。

我和香港大部份市民一般，很高興知悉一般基建計劃不再受機場問題困擾。各方面的工程進展報告，特別是機場核心工程的進展報告，令人鼓舞。此外，政府當局在發放資料方面更趨開放，令我尤其感到欣慰。我們得知會獲得評核政府建議所需的各項資料，情況發展令人至感振奮。我希望現時能審閱有關訂定機場核心計劃時間表和工程範疇時所依據的成本效益分析。有關決定表面看來令人驚訝。

簡言之，我希望基建工程能合乎經濟效益，我亦打算利用政府開放資料的政策，索取所需的資料。

對於科技發展，我亦非常關注。施政報告有兩節談及基建計劃，概要分類為機場、鐵路、道路、橋樑、隧道及環境工程，這些工程都是建設本港未來的一部份。

現時出現一種反常現象。每年往來機場的旅客達數百萬人次；火車、巴士及其他交通工具則達數千架次。每秒經機場出入本港的文件包裹多達數十億。機場核心計劃有否提及這方面的設施？隻字不提。機場電信設施所涉及的繁複科技遠遠超逾各項鐵路、隧道、橋樑及道路計劃。那麼，為何沒將電信設施納入計劃內？相信我知道原因何在。因為有關設施廉宜得多，而政府亦沒有這方面的專門知識。那麼，機場電信政策由誰人制訂？會否留待私營機構自行擬訂？此舉會否引致協調問題？將來可否作出靈活安排？決策科沒有聘請這方面的合適專家，我質疑此舉是否合乎成本效益。

策劃過程必須靈活變通。我們現時進行的龐大工程最少維持 50 年。靠汽油發動的飛機使用四、五十年後被噴射機取代，噴射機使用至今已達四、五十年。下一步將會有什麼發展？在未來 50 年間，石油可能供不應求、異常昂貴或因污染環境而不被使用。在此期間，飛機降落輔助設施、雷達及航空交通控制可能會有今天聞所未聞的革命性改革。我希望當局規劃時，會作出靈活安排，使可能出現的科技發展得以發揮效用。若要實施上述措施，目前可能須化費一些金錢，但將來若要在沒預留容納新設施的機場或繁忙道路或鐵路系統增加設施，費用會昂貴得多。

我們必須重視成本效益及靈活安排。

在結束討論基建問題前，我想談及廣為爭議的輸入勞工問題。許多人推斷謂龐大基建計劃導致有需要輸入勞工。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挖泥、填海、築路等工程大都依賴重型機械。其他行業，例如建築業及飲食業始需要輸入外地勞工。我促請政府在大量輸入勞工前，先行全面研究向其他行業剩餘勞工提供重新訓練的可行性。

環境問題

和社會其他方面的工作相比，環境保護更有賴政府制訂政策及採取鼓勵措施，俾能取得成效。環境保護並不是富裕社會的必然產品。

我覺察到大部份污染問題由工程工序引起，而解決措施往往亦有賴工程技術。我所屬的學會成立了一個環境事務組，促請政府制訂更全面的措施。我很高興知道政府已循此方向邁出第一步，與廣東當局達成協議，共同保護環境。然而，我們始終必須正視事實，明白到香港和其他國家處於同一地球，為此我們不單需要一項節省能源政策，同時亦需要一項整體能源政策，使這一代的做法在國際上能廣為人接受。

在本地層面上，我們需要一項量化政策。施政報告簡略提及節約用紙問題。我想以此為例，說明為何有需要制訂廢物管理政策。節省用紙至為重要，因為造紙所需的樹木，數目日漸減少，而棄置的廢紙則經常會發出溫室氣體及佔用寶貴的墳土區。然而，紙張有其用途，該用途必須貫徹。你大可另找一種物品取代紙張或將廢紙循環再用，或將之棄置。涉及的問題是：在何種程度上，政府可以電子數據紀錄來取代紙張？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逐步以告示板或可棄置磁碟來取代報章？是否有方法確保分類廣告只限給有需要人士閱讀？核數師何時能只依賴數據磁碟來履行職務？上述所提的問題均有賴工程技術來制定解決措施。那些措施不能自行實施，須有人採取主動，只有政府才能透過鼓勵措施採取主動。

這例子亦可適用於廢物管理政策。所需的政策是：有多少廢物能從根本上加以杜絕，有多少廢物能循環再用及多少廢物須棄置？

高科技問題

基本的問題是：為何今年的施政報告對科技事宜着墨不多？為何政府對高科技的發展諱莫如深？兩星期前，庫務司被問及政府可否協助電子業。庫務司的答覆其中提及政府沒有這方面的專門知識。決策科是否根本沒有專才，可就高科技事宜提供撰寫施政報告所需的資料？

去年此時，潘宗光議員在本局發表施政報告辯論演辭時曾指出：「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專才核心，始可以將國際上引進的科技加以運用。在委聘外國顧問公司提供服務之前，本港內部必須首先擁有勝任和認識該等服務的人才，因為我們一定要有本地的專才闡釋國際專家所提出的意見，才可以將此等意見加以利用。」

用於聘請外國顧問的公帑，數目顯然不菲，然而決策科並未能就高科技事宜提供撰寫一年一度施政報告所需的專家意見。這不禁令人質疑決策科是否具有本地專才，能闡釋所獲的國際專家意見。

基本而言，當局可採取兩種途徑，使掌握高科技的政策更趨完善。其一是與本地專家合作。在澳洲，當局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利用澳洲工程師及工業學會的資源，制訂澳洲國家科技政策。政府可否效法這做法，在缺乏政府專家自行制訂政策的領域內設立相類的工作小組？

我過往曾主張，日後亦會繼續主張，四個範疇的司級官員應對其負責的事項具有專業資格。該四個範疇分別為資訊科技，包括電信、工業科技、環境及規劃以及公共工程。上述原則現時只在最後一個範疇應用，即使如此，政府至今仍沒有作出培育人才的安排，以便當現職人員退任時能有繼任人。此外，我相信教育統籌司或其副手應具備高科技某些分科的專業資格。

這些建議與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的部長制度概念並無抵觸。部長制度概念是決策科應由立法機關成員，而非由公務員統領。我知悉有些人支持這項概念，我無意對此加以評論。我只想指出，本局現時亦嚴重缺乏具科技資歷的議員。科技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但在立法和政策層面上均監管不足。

無論當局採取何種措施，只有當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注入專家意見，我們始能期望本港由卓越人士領導，穩步邁向未來。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八時

副主席（譯文）：現在已屆八時，根據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立法局現在應該休會。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如果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以便本局可完成今內事務。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黃宜弘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施政報告的引言中指出香港現正經歷三項關鍵性的轉變，而這三項轉變同時帶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在香港與中國踏入更密切和更重要的新階段中，適當地處理一九九七年的過渡安排。

我非常高興看到總督在施政報告第三章《與中國的關係》中，特別重視在各層面與對等的中國官員建立融洽和有效的夥伴關係，提出要用耐性和謹慎態度，聽取中方的意見，消除雙方的歧見，加強彼此的溝通，這些理智和積極的想法，無疑可以進一步加強中、港的合作關係。

作為中華總商會的立法局代表，我以親中為驕傲；作為一個熟悉香港的商人，我支持香港必須奉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模式。在九七回歸之後，我深信一國兩制的運作是實際可行的，也符合香港的客觀現實。在未來六年的過渡期裏，政府應該主動在各方面做好回歸

銜接的準備工作，而立法局中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不同政治團體的 50 多位議員，不管立場如何，政見是否存有差異，都應該按照在香港憲制下所賦予的職份，共同為穩定社會，建立回歸信心作出貢獻。

正如總督所言，我們要與中國建立融洽的夥伴關係，所以我認為立法局議員有責任為穩定香港，謀求香港的長遠利益，對主權的順利過渡作出積極和建設性的貢獻。

綜觀九一年總督的施政報告，只屬於綱領式和原則性的文告，比較重要的還算是揭示了過渡期的施政方針和基本態度。在許多政策性的問題上，總督都不及具體剖析，甚至把一些比較重要的社會政策略而不談，令不少市民感到可惜。

若干現正醞釀實施的重要政策雖然沒有在總督施政報告出現，但是這些社會各界人士所熟悉關心的問題是不能迴避的，我希望能就個人所見，提供以下七點可供參考的觀點：

(一) 遏抑通脹

通貨膨脹是本港近年面對的一個棘手的難題，高通脹率近年持續上升，縱然總督解釋政府已通過一些方法來遏止通脹，收效仍然是微弱的。現時通脹率高企，約為 12%，對香港整體經濟和市民的生活都直接構成嚴重的打擊。

對付通脹並非束手無策的，除了總督所說的凍結公營部門的收費，控制公務員的薪酬增幅，緊縮政府部門的開支等等之外，政府應考慮改用更多的住宅用地，通過合理的樓價來遏抑通脹，這是立竿見影的辦法。

因為由其他物價帶動通脹上升的現象遠遠不及由樓價帶動那麼劇烈，只要政府能穩定樓價，通貨膨脹應該可以受到控制。

(二) 輸入勞工

由於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年代，形成某些行業出現勞工嚴重短缺的現象，不但局限了本港的經濟擴展，也刺激通脹劇升。為了達到抑制通脹的目的，短暫性的輸入勞工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我們不應任意擴大這項計劃，視輸入勞工為緩和通脹的獨步單方。畢竟勞工短缺的現象必須全面研究成因，找出治本的方法，對香港的整體經濟和勞工階級的利益才有幫助。

具體而言，在國民生產總值上升至 6.5% (現時是 3.8% 至 4.5%)，通脹率回落到 8% 之前，香港可以放寬輸入勞工；但是數目要隨本地生產總值和通脹率的變化而調整。

實施的辦法可以考慮增加大陸移民數目，縮減政府部門人手 (維持公務員數目在 155000 之間)，使人力回流到私營機構中等等。

輸入勞工不應視為解決勞工短缺的永久和唯一方式，為長遠計，政府應通過理工學院和職業訓練局提供更多實用性的職能訓練計劃，撥出更多資源培育零售業、酒店業方面的勞動人才，以擺脫勞工短缺這個不利經濟發展的障礙。

(三) 中央公積金

總督施政報告對中央公積金計劃略而不談，只提出要考慮改善長期服務金計劃，使 45 歲以下僱員服務滿五年後便有資格在解僱時領取長期服務金。

中央公積金與長期服務金的性質不同。一直以來，勞工階層對設立中央公積金計劃多持贊成意見，而且不斷敦促政府研究細則，盡早推行。

站在保障勞工階層（即受薪人士）的利益立場看，公積金制度的精神是值得欣賞的，不過我要鄭重指出，由中央統籌管理的公積金計劃會產生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其中至為關鍵的是管理一筆數目驚人的公積金，中央統籌的工作應由誰負責呢？負責機構的可信性如何呢？對供款人是否有足夠的保障呢？

現時私人機構中公積金的數目已經接近 800 億元，假如中央公積金通過成立，將涉及數以千億元計的巨款。管理一筆數目如此龐大的款項而缺乏足可信託的「中央機構」，缺乏嚴密的監管制度，對供款的受薪人士是否毫無保障？這是政府、資方、勞方都要徹底考慮的問題。

再者，香港不存在勞資尖銳對立的先天性因素，香港過往在工商業上的成績，實在建立在勞資的諒解合作的良好關係上，所以無論是任何形式的公積金或長期服務金，必須兼顧勞資雙方的利益而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才可以鞏固香港勞資的共濟精神。

(四) 銷售稅

自從八八年三月，財政司翟克誠在預算案中拋出徵收銷售稅的建議後，政府對推行銷售稅的興趣似乎並無低減。總督在施政報告中雖然沒有舊事重提，但政府的諮詢工作仍持續進行，意味着銷售稅計劃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性。

中華總商會對政府開徵銷售稅的建議持反對立場，主要理由是：

- (i) 現有稅制長久以來證明足夠應付實際財政支出，無刻意改變的需要；
- (ii) 增加中、下收入階層市民的負擔，加深社會貧富懸殊程度；
- (iii) 刺激物價全面上漲，使通貨膨脹率升幅劇增，打擊民生，導致社會內部矛盾激化；

- (iv) 為多徵 30 億元（政府估計）而動用大量人力，花費巨額行政開支，得的少，失的多。同時也加添零售業經營者的沉重工作負擔及經營成本加重的困擾；
- (v) 打擊旅遊業（損害香港享有「購物天堂」的美譽）；
- (vi) 助長黑市買賣活動，反令政府稅收減少。

香港現正處於主權移交的過渡時期，社會所要接受的轉變已經不少，若再因擴大徵收銷售稅的措施而引發危機，例如社會動亂或暴亂，過渡時期香港能否再經得起這類衝擊？值得政府在作出決定時仔細考慮。

(五) 遺產稅

政府在徵收遺產稅方面動輒耗用巨額行政費用，經濟效益甚低；政府與遺產繼承人訴訟案延續十年八載的，比比皆是，勝訴所徵得的稅款往往不能彌補行政費用的支銷，形成浪費公帑。

加上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裏，產值變動幅度甚大，股票市場曾數次大幅下跌，對遺產值的計算造成極大的麻煩。況且，稅局真正的對象 — 大富豪對遺產多作事前的安排，稅局無法染指，故此，徵收遺產稅愈來愈變得吃力而不討好，在稅制檢討時應該作全面性的檢討。

(六) 房屋政策

關於房屋政策，施政報告強調一個原則：我們必須有進一步的經濟增長，才有能力增加撥款。

單從房委會本身的經濟增長角度看，出售公屋計劃無疑是一個具體的辦法。可惜這計劃受到一些人士猛烈抨擊，住戶認購比率偏低，令人失望。

房委會實施新措施以鼓勵更多市民自置居所這個基本目標應該是正確的，在這個正確的目標之下，由本人擔任主席的房委會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將於短期內召開會議，檢討整個公屋出售計劃的細則和前景。

我認為房委會在推行任何一項計劃時，需要貫徹執行的是確保房委會在財政上有償債能力的原則，才能繼續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質素良好的居住單位。

在私人置業方面，我建議政府考慮為初次置業自住的人士提供低息按揭優惠，協助和鼓勵有住屋需要的夾心階層人士自置物業，因為這項優惠只適用於首次置業人士，所以不會有濫用的情況出現。

「居者有其屋」的精神假如能從居屋擴展到私人樓宇，就可以照顧中等收入人士的住屋需求了。

(七) 積極不干預政策

香港在近 30 年的經濟發展，成功的因素主要是政府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廠家、商戶和投資人士在毫無政治壓力之下全心全意發展行內業務，建立業務自主的運作基礎，也構成香港工商界百花齊放的繁盛面貌。這種積極不干預的政策所帶來的具體收益是政府和投資者所共同珍惜的。

可惜的是各種政策近年不斷變質，政府積極干預的行業愈來愈多，政府干預行內的運作，是好是壞？應該讓歷史來證明，不過我相信一些政府的干預會對行內產生明顯的不良影響。

政府干預行內運作往往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論據缺乏實質和廣泛的支持。就某些行業的改制為例，實際上我們聽不到行內有非要改制不可的聲音，政府要介入干預至少也要提得出有支持力的論調。

干預本身已經不是好事，詞窮理屈的干預就更加難令人信服。

總結

香港現時的確存在着許多大大小小，不容易解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問題，需要社會各階層人士攜手合作，一起解決。我衷心希望香港各界人士在未來的日子裏，能夠真正站在港人長遠利益的立場上，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馮智活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

(一) 本人先就環境保護方面發言

香港的環境污染情況嚴重，政府近年已在改善環境方面下了工夫，但只是避免香港陷於過度污染而矣。雖然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致力改善環境仍是當前急務」及「對政府來說，改善環境仍然是九十年代一項須優先應付的重大挑戰」。可是政府的決心，並未由事實來證明。現時本港每天排出 200 萬噸污水，其中一半是在未經處理情況下流入海中。總督於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曾承諾一個耗資 140 億元的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亦須加緊進行」。卻有消息傳出，謂這項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須無限期擱置！希望這消息是不正確的。去年五月環境保護署署長曾指出政府計劃在未來 10 年投資約 200 億元，提供處理和收集污水及垃圾的設施。但總督現在說未來五年撥出 80 億元，而不是 100 億

元，即是 200 億元的半數，是否預算有所縮減呢？原定於今年劃為水質管制區的維多利亞港、西部緩衝區及東部緩衝區，也因經濟問題而要延遲至九四年才實施。兩年前政府計劃在未來 10 年動用 50 億元來改善污水收集系統，至今年五月當局只是指定 16.92 億元在用作未來四年改善污水收集系統，而不是 25 億元，即是 50 億元的一半。此外，環保署也未能按原定計劃增聘職員，以致工作未能按原定計劃開展。懇請政府堅守當初的承諾及目標，不要延遲各項改善工程。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說得很對：「要有清潔安全的環境，便需我們大家作出身體力行的承擔。香港的生活質素有賴大家認真肩負對環境的責任」。不錯，保護環境必須有市民的參與及支持。可惜政府習以為常的把重要而又是客觀中立的研究報告，不公開讓市民參閱，例如，在爛角嘴興建新發電站的顧問研究報告，以至關乎如何改善沙田濾水廠貯存氯氣這麼細規模計劃的顧問報告等。

不公開資料只會減低市民參與的興緻，增加市民對政府的猜忌，絕不是一個民主開放的政府所應做的事。

此外，政府對環保缺乏遠見，至今本港還未有全面的環保政策，以致政府並未考慮能源的生產及節約，減少廢物、循環再用、保護自然生態等。例如：政府為了本港急劇增多的垃圾，而要不斷找尋地方設立垃圾堆填區，而不是想方法減少垃圾。現時的環境污染問題諮詢委員會實在應改名為「環境諮詢委員會」，擴大職權範圍，包括釐定政策等。能源方面現時只由私營公司不斷提出要求加建發電廠，而不是由政府有計劃地按本港實況去發展不同類型的能源。政府最近成立「能源效率諮詢委員會」，惜未能顧及全面能源政策。政府實應設立「能源委員會」及相應的部門，及早計劃本港未來龐大的能源需求及推行有關的工作。

大亞灣核電站正是本港缺乏能源政策下的怪胎。港府未能有效地監管私營機構在外投資，雖然將來港人使用該站七成電力，但卻無法監督該設施的安全標準及將來的電力收費。港人極憂慮該核電站的安全。亡羊補牢之法是自行聘請核電安全顧問公司來監督核電站的工程及日後的運作。當有不正常的輻射由核電站外洩的時候，安置在本港的輻射監察站，要待輻射物體隨風飄至才可測度到，這時候，可能遲了。政府可否請求廣東核電投資公司允准將他們在核電站四週的監察站，直接與本地聯繫，這樣，本港天文台可以即時收到核電站的輻射洩漏情況。但是，本港居民仍然未能夠保證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天文台獲知的不正常輻漏外洩，政府可能因某些因素，遲遲不公布或者永遠不公布一些不規則的輻射情況。另外，市民至今仍未獲知政府詳盡緊急應變計劃中各項細節及是否有實效。

至於環保教育方面，政府必須加強。施政報告有提及學校「可以」更着重學生認識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政府實應把「可以」轉為「必須」，在中學及小學課程中列環保為學科之一。至於向市民灌輸環保知識方面，政府方面應該加把勁，並且資助民間環保團體的教育活動。

郊野公園是港府引以爲榮的德政之一。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也曾提及郊野公園可保存現有清潔的面貌。我們擔心私人發展商正向郊野公園打主意，例如最近有私人公司計劃申請郊野公園用地來興建哥爾夫球場。希望政府堅持設立郊野公園的原意，避免郊野公園續漸被蠶食。

（二）稅制

近年來通脹厲害，小市民受影響最大。而本港貧富懸殊情況嚴重。近兩年的通脹率約爲 10%，但個人免稅額上一年度沒有增加，今年度只增加 5%，遠不及通脹率，基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政府應在下年度增加個人免稅額至不少於 57,000 元，而以後每年應該調整至不低於通脹率。反觀公司利得稅稅率 10 年來不斷下降，在過去三年均未有調整，下年度利得稅稅率應增加一個百分點。另外，政府應徵收資產增值稅，並擋置銷售稅的建議。這樣可減輕基層市民生活的壓力，而同時政府也可以擴闊稅基。

（三）治安

近日治安情況令人擔憂，在公共屋邨，例如大埔廣福邨、粉嶺長華邨等，爆竊案、搶劫案明顯上升，犯案者多爲青少年。除了增加警方人手和提高警員士氣之外，政府應及早注視青少年問題，在未有外展社工的地區，例如大埔、北區等等，從速加設，並且應該增加老師對學生的比例，以減輕老師的工作量，使其有更多時間、精神關心個別學生。

副主席先生，本人希望政府在本港過渡期，仍然切實關心環保及民生問題，不要將問題推延，本人對今年施政報告並不滿意，希望在下一年我們有一份有承擔、有遠見、更具民主精神，和更照顧基層市民生活的施政報告。

楊森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在這個時間，我相信大家對姓楊的人士比較歡迎！

港同盟在立法局內的 13 位議員，已先後發言，我謹將他們的發言，來作一個簡單的概括。

我亦在這裏就其他立法局議員所發表的意見作出簡短回應，分開三方面來概括：（一）中港關係、（二）憲政發展（三）民生問題。

（一）中港關係

施政報告指出，中港關係是一種夥伴關係，但總督沒有清楚解釋這關係的性質，甚至沒指出中國政府直至現在還沒有承認立法局，這似乎是總督一廂情願的講法、一個良好的願望。但從最近中英聯絡小組達成有關終審庭的協議，和較早前通過的新機場諒解備忘錄來看，中港關係其實只是中英關係的從屬。事實上，香港本身在中英兩個政府的地位是頗低的。

在英國政府來說，香港只是中英政府談判的籌碼。英國政府始終爲自己的利益着想，在遇到中英矛盾時，英國政府就自然放棄港人的利益，而依從中國政府的意願。上述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和終審庭的協議，便是好例子。

在中國政府來說，中國政府對中英聯合聲明甚至基本法，也沒有充份的尊重，使人體會到中國政府對法治的尊重，是缺乏誠意。事實上，未到九七年，中國政府經已對本港的自治作出了相當的干預。這種發展若果繼續維持，甚至惡化下去，本港於九七年後的高度自治，就的確使人擔心不已。

港同盟認爲在過渡期間中港之間，是應該多作溝通，但本港事務的決策權，是應該由港府行使，這一點中英聯合聲明是有清楚界定的。而港府就本港事務作出決策時，便應充份諮詢市民的意見。從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和終審庭協議來看，中英政府根本沒有將港人放在眼內，很多重要的決策，不單市民毫不知情，就算立法局議員和行政局議員都被蒙在鼓裏。

有立法局同事似乎指出港同盟很喜歡和中國對抗，我想在此作出澄清，港同盟的成員基本上愛中國、愛香港、愛民主。我們的血液中沒有特別要跟中國政府對抗，但當中國政府作出的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侵犯香港人人權，阻止香港民主發展，港同盟便會勇於挺身而出，爲保障香港市民講說話。

(二) 憲政發展

施政報告對九一選舉的實質意義和結果，隻字不提，港同盟深感遺憾。九一選舉是本港史無前例的選舉，亦是一次成功的選舉。整個過程是和平、有秩序和冷靜地進行，投票率亦打破了過往的紀錄。但可惜，總督在施政報告中，並沒有正面評價九一選舉的成績，反而只是用了迂迴的態度來談到九五年是否增加直選議席的問題。

港同盟認爲九五年立法局議席，至少應有一半是由直選產生。立法局以外議會的委任制，應該全部取消。

九五年立法局的功能議席會增加，而選舉團亦會出現。立法局議員須就這些發展，作充份的討論，而港府亦應公開諮詢市民的意見。

有立法局議員指今次九月直選形同一場反中國、反北京的運動，我對這說法表示驚訝，對這種不尊重民意及不負責的說法表示遺憾。最近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對今次九月選舉的結果，有 43% 的人表示增強了他們對本港前途的信心。只有 10% 認爲這結果削弱了他們的信心。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尊重港人的選擇和意願，承認立法局的地位，否則只會打擊港人對前途的信心。

至於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關係，港同盟認爲這是一種互相協調和制衡的關係。所謂夥伴應是一種平等而非主僕的關係。立法局是代表民意，監察政府的施政；而行政局是協助總督執行政務。兩者的角色有別，故此，兩者之間不應出現從屬的關係。

爲了貫徹行政局和立法局互相協調和制衡的原則，港同盟提出了立法局設立常設委員會制度的建議。這建議亦獲大多數議員贊成，這個制度可使立法局議員的工作更有制度化，能代表民意，和可以發揮立法局監察行政局和政府部門工作的效用，令到港府不濫用權力，更能向市民大眾負責和交代。

(三) 民生方面

現時本港的經濟，正處於通脹高企和低增長的局面。庫務司經已清楚指出，對港府部門的開支作出緊縮。港同盟很關心通脹和經濟低增長對市民，特別是普羅大眾的生活影響。

本港通脹高企，經已連續三年，但港府竟然苦無良策，至今仍未提出有效的措施來打擊通脹。施政報告及一些立法局議員將通脹原因，似乎完全歸咎於勞工短缺，故此建議放寬輸入外地勞工。港同盟不接受這種分析和建議。因爲通脹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而勞工短缺只是原因之一。

爲了打擊通脹，港同盟促請港府提出有效的措施，並建議港府考慮下列建議：

- (1) 增加土地供應，紓緩市場對房屋需求所產生的壓力；
- (2) 打擊炒樓；
- (3) 凍結港府服務收費；
- (4) 檢討公共事業利潤管制計劃；
- (5) 提高生產力，如資助科技研究，爲那些因香港經濟轉型而產生的剩餘勞工提供再訓練的機會。

我很高興有不少立法局同僚亦支持上述的建議，並指出削減公共開支不但不能有效地打擊通脹，還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增長。

在社會服務方面，港同盟很關心社會服務的私營化和對民生的影響。隨着社會服務私營化的發展，例如公共房屋和居屋售價、醫療服務收回成本的政策，教育直接資助計劃等，市民迫得付出更多費用才可接受社會服務。港同盟向香港政府提出一個警告，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普羅市民生活的壓力反會更重！若果港府不加強檢討社會服務的私營化，結果本港社會的安定在過渡期可能會出現問題！

令人遺憾的是在社會服務方面，施政報告由社會福利白皮書的支援、發展、預防和補救的全面計劃倒退至只集中於「對處境不利和易受傷害的人士」。這明顯是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精神的倒退。施政報告內有關復康服務的部份，我們在這裏暫不評論，我們會密切注視未來復康服務綠皮書工作的發展，因爲他們應受到公平的對待。

隨着本港人口老化，施政報告隻字不提老人退休保障的計劃，港同盟深表不滿。港同盟認爲設立一種強制性的供款退休計劃是急不容緩的。

隨着經濟的發展，本港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港同盟認為污染環境的人應對環境的改善負上更大的責任。

船民方面，港府和英國政府應加強對美國的游說，使美國能改善與越南的關係，取消對越南的經濟制裁及不反對當然遣返政策。我們的主席李柱銘正為此事前往美國進行游說工作，亦希望英國政府能呼應。

總括來說：整份報告書並沒有提出具體有效措施來改善建基於中英聯合聲明的中港關係、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市民生活的改善等問題。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並對施政報告表示不滿。

楊孝華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英諺有云：「最後才發笑的人，總是笑得最具深意」。雖然最後才發言的人，並不一定說得最為精采，然而，根據今天的議程和發言次序來看，我這個壓軸的發言者，在決定今天會議何時結束，或以平素戲稱議員為學生的一些傳播界朋友所用的術語來說，在決定今日何時下課方面，卻有無上的權威。

楊孝華議員致辭的譯文：

輸入勞工

副主席先生，總督於本月初在立法局發表施政報告時所提及的事項，大概以輸入勞工問題惹起的爭議最多。儘管如此，我卻認為這個問題和總督強調本港於接近九七年期間有必要與中國互相合作的問題，是政府當局不懼非議，明知不會討好所有港人，而仍然敢擔直陳所需對策的兩個施政環節。

輸入勞工殊非一項陌生的政策，因為本港事實上由六十年代開始，便以不同形式，透過從中國來港的移民，迅速從外引入所需的人力資源。香港一直靠賴不斷增長的人口，經常為勞工隊伍注入新血及增強生產力，始能維持今日的繁榮。

我們或許需要克服「勞工」一詞的缺點，使其含義不致局限於一群身穿工服及在工廠幹活的工人。香港的現實情況是，在總勞動人口中，服務行業員工人數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而製造業員工數目所佔的比例卻日趨下降。這是經濟結構上出現的一項轉變，亦是我願意採用「輸入符合資格員工」一辭的理由，因為使人手匱乏的行業能夠繼續獲得快速發展，才是我們真正想要達到的目標。

舉例來說，在我所代表的旅遊界中，現時已有若干個行業面臨不同程度的人手短缺問題，而需要在外地招聘有經驗的員工補缺。酒店業就是其中一個實例，目前已有一些酒店

需要以所謂培訓計劃的名義，從中國方面聘請人手。我們何不使其名正言順，將此種辦法合法化？以航空業而言，不單在傳統上習慣從海外招聘機倉服務員的人才，而且在例如飛機工程等方面，亦有聘用從外地招請的優良機械技工，以解決因本地人才外流而出現的問題。

副主席先生，只要本港能夠提供必需的保障，訂立和實行法定最低工資，使本地工人的利益受到保護，以及避免本港一些就業機會不穩的行業輸入勞工，我認為在有控制的情況下實行放寬輸入勞工計劃，為本港勞工隊伍輸進必需的生力軍，將會對香港的經濟有所裨益。

話雖如此，我們只可將輸入員工的政策視作一項短期或中期的治標辦法，而不應以其作為一項能夠根治問題的長遠措施。長期的解決辦法應是自行培育本地技術人員，為本港日益蓬勃的經濟提供所需人才。關於這方面，我懇請當局在實行緊縮政府開支之際，不要削減如職業訓練局一類機構的經費，因為這些機構的工作是協助重新訓練不能找回本行職業的工人，或教授剛完成學業的青年謀生技能，使他們可以加入發展迅速的服務行業工作。

問題的根源不僅在於技術人手供應方面，而且在於預測未來數年退出勞動市場的確實人數。導致工人流失的原因，部份是因為學生畢業後比前有更多機會繼續進修，而部份則由於每年均有數以萬計的人士離港移民。雖然本港已於數年前與中國訂定協議，限制從中國移居香港的單程旅客人數，使此類人士的每年或每日入境限額約較昔日減縮一半，政府目前也許可以探討一些可行的辦法，重新增收從中國來港的移民，但必須確保本港有權參與為現時大約每日 75 個未定用途配額釐定甄選準則及資格的工作，或甚至在實際的甄選程序中具有一定的決定權。此方面所增加的人口，大概只及本港流失人口的半數，對本地的社會基建設施不致造成太大壓力，而且與單純輸入勞工的辦法相比，也許會引起較少的爭論。

機場

副主席先生，自從中英兩國簽訂諒解備忘錄後，新機場計劃已有迅速的進展，實在值得欣喜。鑑於此項計劃一方面對增進港人未來幸福有莫大的幫助，另一方面卻對本港的財力資源產生頗大影響，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竭盡所能，不斷告知本局及廣大市民有關此項計劃的進度。香港有機會能夠從零開始，為興建一個可用 50 年的機場進行規劃，情況誠屬特殊，因為這個特別緣故，當局極有需要取得所有可能使用此項設施的公司及機構提供有充份資料作為根據的意見。

機場並非只為供應航空公司的使用而設，在芸芸機場使用者中，更為重要和數目更多的反而是航機乘客；顧客多經機場進出港境的酒店業；需要派員前往機場迎送旅客的旅遊代理公司及旅行社；運輸業機構；及甚至那些有意競投機場內專利店舖的零售商等。我希望即將公布的新機場諮詢委員會成員，不僅包括生活受到新機場影響的人士，或對新機場財政問題關注的人士，而且會包括新機場的使用者，使他們在該委員會中有足夠的代表，為其個別不同的利益發言。正如一句中國俗語所說：「羊毛出在羊身上」，機場的興建費用，最終還是出於機場使用者身上，因此，及早使他們有權就此方面表達意見，始算公平。

新機場預期要到一九九七年始可落成，但根據所有預測資料顯示，儘管深圳機場已於近日啓用，啓德機場的使用量仍會於九七年前達到飽和。因此，在規劃新機場的同時，我們切勿忽視一項不可或缺的需要，就是必需維修和改善啓德機場的設施。航空業和旅遊業均屬競爭非常激烈的行業，在亞洲區內很多鄰近香港的地方，均欲取替本港地位，使自己成為亞洲的航空樞紐及主要旅遊點。如果本港在啓德機場接近退役前的幾年，不能跟隨實際情況的發展，以配合機場設施方面的需求增長，本港便會損失部份生意，而這些生意一旦失去，不易再爭回來。

通貨膨脹

副主席先生，總督表示通貨膨脹是一個備受關注的主要問題。這是何等輕描淡寫！香港在過往也會多次出現兩位數字的通脹情況，但我記得上次出現此種情況時，很多本港貿易夥伴和競爭對手均陷於相同或甚至更惡劣的處境。另一句中國俗語云：「水漲船高」，恰可作為該次情況的寫照。當時的通脹問題對本港並無大礙，因為香港和其他地區都差不多處於同一境況，彼此的錢財均以較快的速度及較大的金額互相流轉。然而，根據普通常識來看，倘若只見船高而不見水漲，則肯定有地方出現問題。或許該艘船隻已擱淺於礁石之上，需待撞毀後才能墜回水面。

儘管勞工短缺被指為導致通脹的一個結構性障礙，但卻非造成通脹的唯一原因。雖然有可能遭受昨天發言的陳坤耀教授反駁，但另一個原因也許與貨幣政策有關；本港的貨幣是透過聯繫匯率制度與美元掛鉤，只要美國的利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本港要以利率政策來打擊通脹的自主能力便會受到牽制。不過，聯繫匯率制度涉及非常政治性的實質考慮因素，因此，這可能是香港換取穩定所需付出的代價。

施政報告甚少提及住屋及住屋費用是導致通脹的一個主要因素，這或許是由於通脹指數大部份是根據居住公共房屋人士的消費制訂，此等人士由於在公屋居住，可以不受私人樓宇價格過高的影響，免卻大部份中產階級人士在這方面所受的痛苦。私人物業市場現時出現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許多根本連售價較低廉的舊樓單位也負擔不起的人士，卻被迫將一切都用作按揭，以購買價錢昂貴得多的新樓單位。銀行的貸款態度是導致此種現象的原因。對於一些新的物業，銀行的貸款政策有時顯得極其慷慨，但一旦到評估舊物業的價值和最高貸款限額時，卻顯得過份保守。在其他發展國家中，新、舊物業之間的按揭貸款有所差距顯然絕非罕見，但相比之下，我認為香港在此方面的差距較之其他許多地方要大。

副主席先生，施政報告裏面提到需要建立夥伴關係，以應付憲制發展改變的挑戰，以及與中國關係方面的挑戰。除此之外，施政報告提到的第三項轉變，此即經濟轉變，亦可透過建立夥伴關係予以應付。這方面所指的是政府與私人機構之間的夥伴關係。我希望當局可以透過現時與銀行在利率運作方面所建立的一種近乎夥伴關係，說服有關的夥伴設法解決投機及容易賺錢所引起的房屋通脹問題。

夥伴關係

首席議員在提出這次動議時表示，公務員必須學習接受批評的聲音。我認為本局全體議員也有需要學習以適當的音調作出批評。我們不能像一群（跛腳）鴨子或公雞般亂叫亂鳴，或像號角手自吹自擂的喇叭聲，也不可以政黨或其他名義使戰鼓擂鳴，或如無知稚童一樣喧嘩叫鬧，當然，更不可像獨唱表演一般只有一種聲音。本局議員之間亦應建立夥伴關係，從而可望藉此達到音調和諧的大合唱。我希望政府當局就此次辯論作出回應時，將不會使我們覺得在昨今兩天所發表的演辭，只是「對牛彈琴」而矣。

於此，我謹就施政報告的發表，向總督致以謝意，並感謝仍然留在席上的議員，包括尚未入睡及即使入睡，卻未有鼾聲大作的議員。

律政司（譯文）：副主席先生，作為今天最後發言的人，我會確保我的演辭短之又短。我謹動議押後此項辯論。

押後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休會及下次會議

副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八時四十七分結束。

